

# 炎黄春秋

第 **11** 期  
2008 年

**杜润生谈包产到户的高层争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吴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值得纪念的光绪皇帝**



## 目 录

### 求实篇

- 1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 …徐庆全 杜明明
- 6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 ……吴 江
- 1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朱 良
- 17 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个人回顾…李锐口述 王建勋整理

### 亲历记

- 19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李洪林
- 26 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 ……袁 鹰
- 30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阎长贵
- 33 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 ……张颂甲

### 春秋笔

- 39 中国的地震预警史 ……钱 钢
- 46 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与前景 ……思 源

### 治方杯征文

- 53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难历程 ……李维民

### 一家言

- 59 舆论监督对防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谷 翔
- 62 闻陆铿辞世感言 ……施 亮

### 品书斋

- 64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后语 ……叶维丽
- 67 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袁小伦

### 古今谈

- 71 值得纪念的光绪皇帝 ……王也扬

### 海外事

- 73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下篇）…赵启强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行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5.80元

#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

● 本刊记者 徐庆全 杜明明

## 胡耀邦与农业改革

记者：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您担任副主任，您算是又回到农口了。中央调您有什么考虑吗？

杜润生：农委刚成立时，我是副主任之一，另外两个人是张平化、张秀山，后来又加上李瑞山、何康，其他委员多是兼职。

为什么调我回归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主席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你们知道，1955年，我犯了所谓的“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方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四川的农民开始了自发的群众性的包产到户，在万里和赵紫阳的支持下，对既往的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划



杜润生

时代的冲击。当时，中央怎么看？你们农委对此的看法又如何？

杜润生：华国锋和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的李先念都很重视农业，他们办了几件好事。如：让农民休养生息，贫困地区减免了各种税收，进口了将近200亿公斤粮食；重视“社队企业”，同意增加农业和农用工业投资，搞水利、化肥、机械等。这对农村群众情绪的转变是有帮助的。但唯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我刚到农委工作时，也面临着如何看这

一问题的局面。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对我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也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农委的工作是不是就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遵从当时中央的总体意见，拒绝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的确应该支持农民这一伟大的创举。

杜润生：农委的确是两难的境地。农委是国务院的机构，自然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有志之士的意见，则对农委支持农民的行动提供了依据。比方说当时胡耀邦的意见。

记者：胡耀邦当时有什么意见？



杜润生：农委要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体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华国锋和李先念召集开会，我和水利部长钱正英参加。结果很容易地争取到几十亿元投资，主要是搞水利。会后起草了一个文件，重点讲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解决粮食问题。先念看后表示同意，但让我去征求胡耀邦的意见，当时耀邦任党中央的秘书长。

耀邦看过文件，提议重视多种经营，不要只强调水利，不要“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要加上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说，“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成为历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历代朝廷都提出“重本抑末”。人多地少不免过度开发坡地、林地、湖面，环境会造成破坏。这个问题关系重大，需要另行讨论，发出专门文件。此次所发文件只能就水利投资问题做文章，看来水利也不能忽视，现时要靠它提高单产。

耀邦同志同意给文件加点内容，转给中央政策研究室修改后发出。这时他很兴奋，说：要立志从现在起，改弦更张，首先把“农业”内涵说明白。

记者：由于胡耀邦在拨乱反正中的重要贡献，在全党威信很高，现在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他的意见分量很重的。

杜润生：是的。这期间，胡耀邦对植草造林、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和经济作物、发展小工业，不断提倡，不断宣传，不赞成投资大搞水利。因此水利部门对此有些意见，并引起李先念的不满。一方面，我对耀邦说：灌溉和防洪不能不搞，问题是如何搞。另一方面，我提醒水利部门同志：新搞大水库要慎重，北方水库不出几十年变成泥沙库，要搞科学论证。当前应重视改善和提高现有设施的效益，实行有偿用水，节约用水。现在看来，耀邦同志对过多的水库设施提出质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至今，这仍然是一个待明确的大问题。

我借机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责任制”问题，这是保证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我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

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性的重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是个思想很开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同一时间，内蒙古的书记周惠也请中央同意把土地借给农民，让他们包种。我批复周让小农经济恢复是不利的。内蒙古不能借地，后来就搞“口粮田”。1979年6月，农业部张根生、余国耀等人去内蒙古、甘肃、宁夏考察，回来向李先念汇报，谈到这个问题。我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他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渡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但没有说禁止。

## 包产到户的酝酿

记者：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是进行过农村改革的县。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我们看到许多谈包产到户过程的记载，很少有人提及这次会议。您能讲讲吗？

杜润生：这次会议就是由我主持召开的，当然可以讲的。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这几个省县都有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那么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开个会来讨论一下。

会议由我主持，我的开场白很简短，这次会议主要是集中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记者：从时间上看，这次座谈会召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间，正处在政策大转变的时期。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地主摘帽，“右派”甄别，干部落实政策，经济方面提出三年调整方针，同时准备经济体制改革。许多认识问题很不一致，会上是不是争吵很厉害？

杜润生：是啊，当时的确是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明，大家思想准备又不足，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会上有人提出：阶级、阶级斗争还讲不讲，阶级路线还要不要，学大寨还搞不搞？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为避免分散精力，仍按会前的决定集中讨论

责任制问题,希望以此为突破口,带动其他。

对于生产责任制的讨论,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制度安排?“包产到户”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包产到组,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曾提到“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会议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力、农具、土地、牲畜“四固定”,常年包到组。有的主张不能固定到组,认为那就是分队,是“三级所有”变成“四级所有”。有的认为不固定到组是行不通的,怎么联系产量?

记者:你们在会上进行争论的同时,社会上也在争论,当时《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张浩来信,对包产到户提出指责。

杜润生:张浩来信能成为一个事件,当然代表一种倾向了,但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还是由于王任重的批示。张浩是甘肃的干部,他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情况,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王任重批示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批示,正好在会议期间,于1979年3月15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因而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

记者:这对你们会议的讨论有影响吗?

杜润生:有影响,但不大。我们还是照样进行自己的讨论。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年初,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多种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的试点,群众说到组不如到户。包产到户在全县很快就推广开来,已占生产队总数的11%。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

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吉林省农工部部长史林琪、广东省农工部部长杜瑞芝,都极力主张对包产到户“开个口子”放开一点,尊重群

众的选择。也有人怕口子一开就控制不住了。会议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向要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

记者:这次会议中讨论的内容,你们是不是都及时地上报中央?中央对此怎么看?

杜润生:在会议期间,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华从农村形势讲起,党的三中全会文件是正确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现在既有“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也有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问题”。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一个十几人的小会讲了2个小时,按常规是不多见的。3月22日,王任重又到会讲话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好的。

记者:看来,他们两位的态度还是好的,提倡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杜润生:但是,在当年,包产到户是个触及体制的问题,即使允许讨论,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明确肯定,是很难的。因此,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记者: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了,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杜润生:是啊,最后,华国锋有个意见就更好了,他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时我做了发言,说一些重大问题会议讨论不充分,只能求同存异。《纪要》按华国锋、王任重的讲话精神修改,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责任制形式不搞“一刀切”。但春耕大忙在即，搞了责任制的不再动了，“包产到户”也不同于单干，要纠正不可上纲，更不可搞批斗。

## 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

记者：七省三县座谈会是“文革”后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从结果来看，满意的解决尚需时日，但思想已经解冻，禁区已经打开。

杜润生：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对林业政策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他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记者：既然七省三县座谈会把禁区打开了，进一步突破也就指日可待了。

杜润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争论还是很激烈的，要松口是很不容易的。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这是继七省三县座谈会后的又一个重要会议。

王任重在会上讲话，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会议开始，分组进行讨论，让大家放开思想。我安排周日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群众评价：组比队好，户比组好。一些地方，特别是占1/4比例的后进地区，迫切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周日礼讲了两个多小时。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华东小组几乎等于围攻安徽，让我很为难。周日礼对我说：安徽包产到户，是万里书记主张试验的，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不能不让

人家讲话；你们试验结果有利生产，就继续试。其他小组也争论激烈，赞成任重讲话的人占多数。轮到我在大会讲话，我讲了对包产到户要允许地方试验。

记者：那您的讲话就和王任重的形成了两个声音了。中央怎么看？

杜润生：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决策，就是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会前，王任重将他和我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认为王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但指出任重和我两人讲话的精神应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任重把先念所讲“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已经试验过了还要试验什么”这句话，加到我的讲话里，把“准许地方试验”一句勾掉了。王任重要求两个讲话一起送中央批转。

记者：这就有点僵持了，您怎么办？

杜润生：我的确有些为难。怎么办？我和刚从四川省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赵紫阳商量，怎么处理。他说：国外发达国家都搞家庭农场，解决农业问题很成功。他在省里工作的时候，是搞包产到组，没有更多地支持包产到户，用扩大自留地的办法，满足农民的这种要求。他认为：包产到户这类问题，可以让大家试，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们有意意见，文件还要发，可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把问题淡化了。好在会议纪要中仍保留了：对自发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我的讲话修改稿，未经校正，被一位同志拿走，发表在《农村工作通讯》上，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我应该负责。

记者：王任重后来调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是不是因为他不支持包产到户？

杜润生：恐怕不完全是。其实，王任重这个人



聪明干练,好读书,对新事物敏感,工作能抓住重点。在不少问题上他是属于思想开朗、能倾听不同意见的人。在农村问题的许多方面,我们也有共同语言,相处和谐,但对包产到户,却存在难以消除的分歧。不过他允许和他争论,不歧视我们这些观点不同的人,平等对待,一如往昔。

1979年,有一个时期王任重在上海养病,把张平化叫去,说:包产到户,你们为什么不纠正?张赶紧回来传达,让农委纠正。

我说:七省三县会议的文件,是中央通过的,讲了群众要包产到户,不要批,不要斗。

张说:但不能放任自流,不做工作。

我说:做工作可以嘛,但不宜硬纠。

还有一次,是在甘肃召集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王任重在会上又提反对包产到户,宣扬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报纸上也发表了。甘肃省委书记宋平本来是赞成包产到户的,据说此时又有了变化。

以后,王任重调离农业部,任中宣部部长。离任时,我俩恳谈了两个小时,最后他表示:作为过渡形式,他同意包产到户,前提还是应坚持集体化。他的认识此时已有变化,但已离开农口。

记者:当时,包产到户虽然没有在全国推开,但是,安徽、四川、内蒙、甘肃等地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是切实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创举,为什么有些人要反对?

杜润生: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意见,很大因素是忠于毛泽东思想。先念同志是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人之一。我和他相处是在中南地区期间,他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长,一度兼任武汉市市长。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帮助邓子恢搞些具体工作。武汉市“三反”中搞出贺横夫大案,贺自己承认运集桐油出口,不但偷税,而且掺假以水充油,使国家损失无法计算。贺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过去和我地下党有联系。原地下党一位同志向我反映,此案不实。我着手调查,确实存在逼供事实。旋即向李汇报,他立即派人调查,证实水油不相溶,掺水于油是不可能的,而偷漏税也莫须有。他摸摸脑袋说:我们受骗了。从而举一反三,纠正了不少冤案。他敢于实事求是,敢于纠错,用人放手,南下干部对他多有尊敬赞赏之声。来北京后,我找他解决农村出现的一些难题,他无尽可能予以解决。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但和

任重一样就是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和我们谈不拢,记得有一次写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请他署名,他打电话来说:要写得平稳些,包产到户,不能说毛主席错了,邓子恢是正确的。

80年代,有一次他约我谈武汉市一个老案子(纪凯夫事件)。然后转到闲谈,他表示不赞同耀邦否定水利的讲话。

他问我:包产到户真的增产那么多吗?

我说:确实。包产到户是农村家庭经营,农民就靠种几亩地养家糊口,不能偷懒;加上环境变了,政府随着国家工业化,能为农民提供化肥、农药,信用社给贷款,苛捐杂税减少,又是和平环境,劳力富余,多产多留,政府实行价格保护,增产不奇怪;光水利建设,国家出了多少钱,还能白费?

他说:你把我说服了,我是老观念,只记得“小农经济跳不了三尺高”。

记者:看来,李先念也不是像外面所传的那样,一直是反对包产到户的。

杜润生:是的,他的观念后来还是转变了嘛。

记者:中央领导人有这样的意见,也势必影响到下面,因而,下面的一些人反对包产到户也就不奇怪了。

杜润生:这种情况应该分开来看。下面很多同志持不赞成态度,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仍然不合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的。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其中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把原草案“不许”改成“不要”(因为大家已按照早已发出的草案学习过文件,这个不大的修改变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记者:可是,后来的实践在推动着你们这些决策者,当时是形势逼人强嘛,恐怕不变也得变呀。

杜润生:你们说得很对,当年形势的发展在逼迫人们思考、决策。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 杜晋)

#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

● 吴 江

中国今天似乎人人都在谈民主,谈政治体制改革,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但究竟什么是政治体制,看来并不是人人都弄懂了的。所谓政治体制,就是权力集中的一种形式,并由此组成政府。权力的集中有专制的集中与民主的集中之分。在世界上,从十七十八世纪起,民主政体代替专制政体而起,国家现代化开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权力的集中,



其形式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组成的政府。

自从民主代替专制,又有民主与自由之争。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于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民主与个人自由孰重,是要民主还是要个人自由,一直争论不休,直至今日。其集中表现就是从批判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杰出代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始。卢梭在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理论是:每个人都是主权者,都应当获得应有的权利,包括自由和平等;但他同时认为,由于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应当组织起来,即组成为国家,国家由普选产生,每个人把自己主权交给国家,构成共同意志,即“公意”或“总意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民主决定”),每个人都要服从“公意”。所以“公意说”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但卢梭同时指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仍有他做人的自由权利”,因此他主张将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反对有行政权的人拥有无限权利。为了防止行政权盗窃人民的意志和自由权力,他提出必须由人民经常监督行政者,例如定期召开人民会议审查行政权是否执行适当,有没有权力私用或违反“公意”的行为,否则应予撤换。这里要说,关于民主政治的这种理念并非自卢梭始,在卢梭前一位荷兰著名启蒙学者斯宾诺莎(17世纪人)就提出这种观点,认为“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他的观点更为极端,认为人民应当将自己的天赋之权完全转让给国家,这样国家就有唯一绝对政治权,每个人必须服从,而且“国家统治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这就是向专制政治妥协了。注意:卢梭等人没有从同时代人孟德斯鸠那里吸取他的分权制衡思想,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思想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



渐确立起来的。

但也就是从 18 世纪开始,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了批判,认为民主与个人自由是相冲突的。这种批判的触发点,就是法国大革命迫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因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雅各宾专政和“暴政”,革命党内部也互相残杀;而卢梭的思想则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卢梭死于法国大革命前十多年)。这种批判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和平主义者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就《社会契约论》所说的一段话,我且把它抄录在下面:“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习气,而且通过‘总意志’(即‘公意’)说,使领袖和他的民众能够有一种神秘的等同,这是用不着靠投票箱那样世俗的器具去证实的。他的哲学有许多东西是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辩护时尽可能利用的。他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是罗伯斯比尔的执政,俄国和德国(尤其是后者)的独裁统治一部分也是卢梭学说的结果。”(《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大家可能想不到,在我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倡科学与民主之后,也有人(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同样对民主主义者卢梭发起批判,其观点基本与罗素相同,认为民主必然产生“多数暴政”,也就是说它也是站在民主与自由相冲突因此否认民主价值的立场上的。

西方学者关于民主与自由之争,一派认为民主是通往个人自由之路,一派认为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权可能产生“多数暴政”,因此企图通过民主道路来保证个人主权和个人自由不受侵犯只能是一种幻想。后一种思潮的影响曾很大,例如,当美国于 1776 年从殖民地获得解放并发表《独立宣言》之后,迟迟没有正式成立国家,直到 1789 年才成立中央政府,选出总统并制定宪法,这就和上述思潮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他们主张无产阶级获得胜利、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之后,国家和民主应当消亡,他们不承认有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之说,认为人民如果有了自由,民主国家也就不需要存在了;他们将作为国家形式的民主,与个人自由同样看成互不相容。其实这也是一种空想。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没有提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完

整的学说来,而以无确切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让人任意操弄,结果伤害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这未免是一件憾事。

在我国,听说目前也有自由主义派,不过并不涉及国家问题。在国家问题上,我们几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主义者,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几个世纪的历史事实(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证明,我们能预想到的社会确实还不能超越民主,确实不能不以民主政治来代替专制政治。从民主和自由的关系来说,民主(国家)不仅包含一定程度的自由(从专制解放出来的自由),而且是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自由程度的扩大依靠民主的进步和完善。即使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民主和自由的统一是国家问题上不可避免的立脚点。

## 二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民主和民主的集中本身了。民主是国家的主体,它承认国家的“公意”是人民主权的集中,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人民管理自己的国家,主要运用选举制,经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织代表大会(或议会),因此产生国家权力机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以及各种监察机构和权力制衡机构等。国家首脑有的经全民直选产生。以上是就一般而论,民主的实施和民主的集中的形式因各国不同条件和历史传统而千差万别,民主无统一的形式或统一的路径可言。但是民主确实能够显现人民捍卫自己主权的能力。

对待民主,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注意,第一,民主政体代替专制政体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民主政治本身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东西,例如,民主虽然承认保护少数人的主权和意志,但它毕竟依多数人的意志做出决定,选举是比较公正的,但选举的结果并不是完全公正的。因为社会总是分别为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别,如果选举因种种原因(包括掌握的资源不同)被欺骗被操弄,选后又无有效的权力制衡力量,则确实有可能出现“多数暴政”,他们自诩为民主国家,但对内专制,对外侵略,无恶不作。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所在多有,如希特勒也是经多数人选举

上台的。一位美国政论家揭露美国民主的虚伪，说美国统治者是“对内讲自由，对外搞法西斯”，而美国的人权组织只是充当颠覆别人国家的工具而已。

第二，民主的道路、民主的模式以及民主的操作方式，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包括同类国家在内。在历史上，一定的民主政体取代专制政体而起，因各国的历史条件与传统不同，往往各走各的路，有的激进，有的渐进，有的迈大步，有的迈小步，或民主与专制此起彼伏，不断磨合，或互相交叉，互相包容，或复辟与反复辟往复循环，等等。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民主代替皇权，一直是一条妥协的、改良的路，直到1837年开始的维多利亚时代才稍有些头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采取激进的方式，催生出的民主政权长期处于动乱、暴政和专制复辟当中，到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下来，有人统计，其间经过了三个民主政府，三个皇室政权，两个帝国，一个法西斯政权，这些政权又都是以暴力告终。所以法国的民主革命最为人所诟病，被看做是“多数暴政”的样板。如前所述，首倡“主权在民”的法国著名民主主义者卢梭也因此不断遭受批判。我们的近邻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天皇仍一直拥有最高权力。立国不久的移民国家美国，好像天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它保留奴隶制的时间也最久，其民主则一直受资本霸权的支配。此外，还有一种情况不能不在此说一说，就是大国与小国实施民主的道路很不相同，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而文化素质不高的大国比起人口较少的小国来，民主改革的难度要大得多，稍有不慎，极易造成乱局。例如印度这个大国因实行多党政治被西方人誉为东方民主国家，实际上，其政局时呈乱象，国内麻烦不断；当然印度仍有它发展的特色可供我们借鉴。

根据以上种种情况，所以最近有人向我们提醒：民主改革不能靠理想主义，也不能靠照抄照搬。这确是警策不易之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当前中外都关注的问题。总的说，这种改革应有利于保障人民的主权和自由，以“法治”代

替“人治”，应有利于民生的改善与国家的富强，尤其应有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稳定。依照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改革首先要处理好集中或集权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长期是宗法等级社会，两千多年来都是一个中央集权大国。世界上有过几个大帝国，为时都不算太长。纪元前建立的罗马奴隶制大帝国和13世纪建立的奥斯曼封建制大帝国，为时都不过500年；18世纪沙皇建立的俄罗斯帝国连同后来的苏联，合起来也不过300年；还有一个1867年建立的奥匈帝国，其存在时间则只有半个世纪。惟独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已存在了两千多年之久，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早在1959年，有一位欧洲女政治家华德(R. Word)曾预言：苏联必将因民族问题而瓦解，而中国则本质上是一个辽阔而统一的国家。这实属惊人预言。其所以如此，盖因各国集权的历史条件、途径有所不同。中国众多的民族部落同处于一个大陆版图内，中心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原地区，其地土肥民稠，有较高的文化和生产力，率先进入农耕社会。先秦以来逐渐融合形成的汉族首先据中原，其他落后地区的民族纷纷向中原地区靠拢，彼此互相往来，杂居，冲撞，争夺，战争频繁，有时汉民族战胜入侵的少数民族，有时少数民族战胜汉族入主中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最后互相同化融合，以文化融合和生产力趋同为基础，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央集权制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6世纪以前，中华民族无论在文化上、在生产力上，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16世纪以后落后了，于是列强欺凌，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接踵而来，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辛亥革命后仍是如此。但即使如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未见削弱，这一点最遭外国列强之忌，外国列强因此倡“分块论”之说，认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因此欲征服之，必先分裂之。这种“分块论”由日本人首倡，他们公开论述中国只有分成“七块”或“十二块”即分成“七国”或“十二国”，才能够治理好（近期日本防卫大学和东京日语大学的教授学者们就公开发表过此类谬论，台湾的李登辉是积极应和人物之一）。无疑，对于这种“分块论”凡



我中华民族都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驳斥之。所以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有赖于国家一定的集中或集权制,无集中就无以谈国家的统一。

但是,什么样的集中,什么样的统一,才

适合国家发展的需要,要视不同时代而定,要根据时代的转换而转换。过去封建时代,基础是宗法等级制,建立的是封建专制政体,此种政体以集权为主体,无民主可言。现在时代变了,民主占上风,民主社会需要建立民主政体,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而民主政体的主体是民主。集中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但这个集中是民主本身的集中,是为民主、为实现“主权在民”服务的,同时也要实现社会平等,排除封建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和宗法性家族势力在我们的社会和政体中还到处存在着,有时还受到某些改革者的宽容和支持)。这个问题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当政后也没有解决好。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

说到这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便呼之欲出了,我们可以用八个大字来概括:发展民主,改造集中。

##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 三

根据我国国情,要先说一下将专制的集中(或过分集中,或处于指导地位的集中)改造成民主本身的集中的问题。“专制”两字不免有些刺耳,换句话说“过度集中”,这相对于民主的集中而言,还是符合共产党当政后所实行的“集中制”的实际情况的。毛泽东其实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不是说过“百年犹行秦政制”吗?两千多年后他还称颂秦始皇的专制集中制,并主张将“马克思和秦始皇结合起来”。但现在必须有所改变,因为过度集中或专制使国家落后,人民受难。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首先要使“集中”民主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早已有了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置,而我国宪法庄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就是民主的集中。但这在相当程度上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我们又规定,共产党是国家无可争议的领导力量。这样,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和党的领导在权力运用上形成矛盾,以至形成积重难返的“以党代政”,而党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少数人乃至个人之手,因此甚至出现

如“文革”时期个人专权,即个人拥有像帝王一样的无限权力这种历史倒退现象。这个问题使我们的政治体制严重扭曲。我们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并探寻是否有哪怕是权宜的妥协的但至少可使政体有些民主气息的办法,或者将党的领导方式加以改变,以便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不仅有其名而且有其实。

首先应当指出,这对矛盾是由历史形成的,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解放,并进行社会改造使民族和人民有捍卫自己主权的可能。这个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在人民中间获得了极大的信任和极高的声誉,其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是必然的,无可替代的。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也成为不怀好意的外国列强的眼中钉,他们为了削弱和支配中国,百般污蔑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们“亡我之心不死”。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限度或局限性,党的领导也不例外。历史条件变了,特别是已建立了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这种条件下,党的领导虽不可少,但其怎么领导,领导的思维与领导方式必须改变。主要的是,党不能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形成以党代政,党的领导只能渗透于其中,以自己的正确主张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说服(而不是指令)人民代表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循此逻辑,可以选择的合理办法,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人民代表中的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置党组进行工作,依法行政,依理服人,依此实现领导,而不是直接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的行政机构同样设置党组以进行工作,但是国家最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则不设党组,而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以保持两机构的独立性,使其不受任何外力影响而独立执行职责。

这里要说明,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置党组以具体实行党的领导,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一主张是开国初期由一位革命前辈(同时也是一位老法学家)董必武所提出,可惜当时我们一切“学苏联”,走上了“以党代政”这条路,设置党组之议未被采纳。现在重提此议谨供当政者参考,我想也是可以的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是立法机构。代表大

会中设置的党组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保障我们的国家最终摆脱“人治”或“党治”,而实行“法治”,使之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而“法治”属于民主范畴。党本身的活动也必须限制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任何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都不能“无法无天”独行其是,他们的违法行为和平民一样都要受国家监督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处理。在这方面党不能拥有任何特权。

私意以为,采取上述办法,并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只是改变党的领导思维与领导方式,使党的领导居于第二线,突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这种党的领导思维与领导方式的转变,可能促使党政适当分开,也可能为增强党内民主提供条件,并有利于精简党的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是集中人民主权的机关,它的职责是代行人民主权,所以,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人民代表及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各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服务于人民的,称之为“公务员”,其性质与“服务员”、“公仆”相等。现在“官员”的名称流行,“公务员”即“官”,而“官”者,牧民之谓也,自视高居于人民之上。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虽然各国皆有“官员”称谓,但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避免这种称谓,共产党人更不应以称“官”为荣。

#### 四

其次,谈到发展民主。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发展民主就是使集中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而民主又重在实行真正的选举。在既有的领导格局下,民主可以重渐进,迈小步,以小步积大步,应避免足以造成政局动荡的“激进民主”或“过度民主”。在这方面,我们的关切点主要是以下四项:

1. 发展党内民主,这是第一位。由于党在国家中的特殊领导地位,发展党内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关键一步,等于是一架民主的发动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七千多万人的大党,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长期战争时期,党内生活难免受军事化影响,在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和平时期,党内生活须经重大的改造,民主化提上日程。



所谓党内民主,除了党内应有真正的选举,并依照党章和宪法保障党员的自由权利(所谓党内“思想统一”只是对党章和党的决议而言,并非消灭党员个人的思想自由,思想天生是自由的)以外,重要的是依法治党。依法治党有二:一是党的活动应限制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二是党自身的政治生活应有法律性的规范,以约束党员的活动,如严格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制止“个人说了算”,防止有权势的领导人任意整人等。过去党内曾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规定”,那是“文化大革命”后痛定思痛的产物,但只是原则性规定,而无具体执行的条例及细则,因此不足以称“法”。如拿任意整人来说,这是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恶习。这种现象在战争时期有些情况下难以完全避免,但和平时期必须制定法律严加制止。必须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必要时进行法庭式的公开审理。试想,如果党内没有法律制止权势者任意整人,冤案频发,“莫须有”罪名随意制造,致使党内外《乌盆记》唱个不停,则必使党无宁日,党心离散。试问上世纪70年代末如果不平反大量冤假借案,改革开放搞得起来吗?总之,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记取,制定党法,此其时矣!特别当此腐败横行、卖官买官等丑行在党内恶性发作之际,“清党”之举亦属情理中事。

2. 改善党际关系。中国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共产党主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因为依宪法共产党在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多党合作以共产党为主导是理所当然的,但各党应是独立的,这是政治学常识,否则就无所谓“政治协商,互相监督”。在历史上,多党合作曾处于不稳定不规范的状态,至今多党合作仍被淹没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为了改善党际关系,作为发展民主的重要一环,当务之急是将“政治协商”和“互相监督”两者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定章程,条条分明,有可操作性。有关国家人事安排,则可考虑开国初期的合作模式,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及专业人士经选举或协商担任政府领导实职。

3. 民主重在选举,无选举就无所谓民主。中国共产党当政,中国开始有选举制度。但无可讳言,除某些基层选举外,许多领域的选举,包括人

民代表的选举,多以“内定选举”或“指名选举”,辅之以“协商选定”。近年来有些地方开始采取“差额选举”,效果明显,但举办者总不免战战兢兢。总之,中国要有真民主,必须有真选举。中国之大,国情之特殊,选举制只能逐步、逐区、逐级推开,既不能冒进,也不能畏首畏尾。世界上,以民主组成的国家一般采取代表选举制。我国民主有一大特点,即代表制选举和基层直选相结合。直选产生基层群众自治,包括农村居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都有法律和特定的组织法保证。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城乡居民自治,已基本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直选的范围正在逐步扩大。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已有61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和8万多个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全国已有85%的村建立了民主选举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基层起步,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特征,可说是丰富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

4. 在中国这个大国,中央直辖市、省、县以及各个民族自治区的地位十分重要,为保持国家统一,这些地区直属中央管辖。但中央与地方应当适当分权。尤其对民族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应当懂得,由于现代化的推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提高,必将唤起其民族觉醒和民族自尊,因此会珍惜其民族自治权。为保障国家统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似应考虑设置较高层次的机构专事处理民族问题。各直辖市、省、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则应由民主提名、民主选举产生。其主要领导人可考虑由自下而上提名和上级委派候选人相结合,而以差额选举产生之,然后报上级领导批准。为慎重起见,地方民主建设可仿效设置经济特区的办法设置政治特区作为试验区。

本文到此结束。最后还想特别提到一点:本文强调“改造集中”,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过去“过度集中”的弊病,为此必须有适应我国国情的分权及权力制衡制度。这个问题这里未专门涉及,但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应有之题,应当专门加以研究。

(2008年7月)

(责任编辑 杜晋)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对外政策的调整

● 朱 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内政策开始了根本的调整。中央没有就过去的对外政策做过较全面的总结,但是,对外政策是不可能不做重大调整的。

## 对外政策为什么必须调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14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以苏联(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5个独立国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于1957年曾宣称:“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经过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也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苏决裂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的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顶峰。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世界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我们公开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就违背了中国倡议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9年4月林彪《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了列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还引了毛主席的指示:“关于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九大通过的党章还写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奋斗目标。1969年中苏之间的紧张

关系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和美国都调整了对外战略。1973年毛主席同美国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一条线”战略,即“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毛主席又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了“三个世界”的思想,作为“一条线”的理论根据。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强调了“三个世界”的对外战略。同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六整版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文章指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依据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必然要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理论”,断言“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叛徒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它的集中程度是美国所无法企及的”。文章的主要结论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当前,战争的因素正在明显地增长,世界战争可以推迟,但是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在愈演愈烈的美苏两霸的争夺中,美帝国主义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个争夺中处于攻势,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第二世界(注: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为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打击主要的敌人,要按照列宁的教导,“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加快了落实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部署。

## 调整对外政策需解决哪些问题

我党没有全面总结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对外工作,但是要调整对外工作,以下几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1)我们的时代是不是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不是“战争与革命”?战争的威胁是不是迫在眉睫?这涉及到是备战还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要不要高举维护世界和平旗帜的问题。

(2)要不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不要同大国结盟,联合一个反对另一个?

(3)要不要坚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不要改变支持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革命外交路线?

(4)要不要同全世界近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恢复关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超过了我们批判的“修正主义”。

1989年4月22日,中央对胡耀邦生平有一段评价,谈他对新时期对外政策调整的努力:“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为发展我党同外国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它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做出了努力。”

## 恢复我党同“修正主义党”的关系

1978年我们已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关系。当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共产党也希望同中共恢复正常关系。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仍认为:尽管这些党有要求独立自主、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但是这些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然跟苏联跑,我们同他们没有恢复关系的基础。我们仍称这些党为“修党”。

恢复同70多个“修党”的正常关系,是从意大利党开始的。

意大利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实力最强

大的第一大党,拥有160多万党员,1000多万张选票,与意大利社会党等在一起控制了近60%的地方政府,还掌握着全国最大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时,意共发来了唁电,总书记贝林格和主席隆哥到我国驻意使馆吊唁,意共的各级党部下半旗志哀,我们都不领他的情;1978年4月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要求同我驻意大利大使进行非正式秘密会晤,我们也拒绝了。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我党发表的重要反修文章虽然只有二三十篇,但是,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有两篇,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实际上是指桑骂槐,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经中央批准,1979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应邀到罗马同意大利共产党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内部会晤,以后经过了长达一年的交换意见,1980年4月,贝林格总书记应邀访华。胡耀邦总书记去机场迎接,华国锋主席会见。胡耀邦同贝林格举行了5次深入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党关系(后来,胡耀邦在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又加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作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写入了十二大党章)。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说:“这次我们两党恢复关系,我去见马克思也好交代了。”“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过了一年,邓小平会见原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遗孀约蒂议长时,又说:“1963年我们写了篇文章,对不起陶里亚蒂同志,那篇文章丢到纸篓里去吧!”

同意共恢复了党的关系后,接着同一些对苏共有独立性的“欧洲共产主义”类型的共产党如西班牙共、法共、希腊共(国际派)、荷兰共恢复了关系,后来逐步同其他共产党都先后恢复了关系。

## 共产党能不能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

命前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曾被指责为“背叛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叛徒”。

1951年,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下统称为“社会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其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自称其历史始于1864年(即第一国际)。自1976年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任主席后,又吸收了第三世界一些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参加。社会党国际有正式成员党49个,咨询成员党17个,党员总数达到1600万,选民9000万,在19个国家处执政地位(2008年已有159个成员党,在近50个国家执政)。因此,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对促进国家关系、增进人民间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不少社会党主张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这同我国主张“一条线”战略是有分歧的。因此,1977年法国社会党邀请中共参加其代表大会,我未予置理。1978年西德社民党主席勃兰特表示愿以党的主席身份访华;1980年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访华时,表示英国工党愿与中共建立“密切关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马耳他等国社会党,也表示愿与中共建立党的关系,我们均未予置理。

1981年2月,应胡耀邦总书记邀请,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密特朗当时辞去了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准备竞选总统。我党

对密特朗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他抵京后,胡耀邦前往国宾馆拜会了代表团,又在客人离京前会见了代表团并设宴饯行。李先念副主席同代表团举行会谈。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他在谈到国际局势时指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当然美国也是一霸。能够打世界大战争的只有两家,美国和苏联。但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迟战争。”

密特朗回到法国3个月之后竞选获胜,当上了法国总统并连续担任了12年总统。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来见到我党领导人时,不止一次地感谢中共在总统竞选前邀请密特朗访华,给他带来了获胜的好运。

邀请社会党国际的领袖,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访华,是我党同社会党关系中最重要决策,他不仅在各国社会党中有很威望,在第三世界中也有很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在近十年左右时间中,对勃兰特奉行的“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苏联和东欧)和解”、支持美苏裁军谈判等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对国际形势缓和有幻想,对苏联有幻想。中共和西德社民党的国际事务主要负责人,经过一年半的接触、相互访问,才达成了勃兰特访华的协议。

1984年5月,勃兰特应我党邀请率团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胡耀邦最重要的讲话是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他首先赞扬勃兰特“多年来为缓和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接着讲:“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胡耀邦这样说,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过去关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点。邓小平1985年3月同日本外宾谈话



时说：“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这个谈话实际上肯定了胡耀邦的观点，中央后来又概括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胡耀邦在欢迎宴会上还讲到，中共愿同其他国家社会党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他说：“中国人民将同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持不懈地为缓和国际局势、制止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而努力”，“在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我们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与合作。”“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胡耀邦还说，中共在同社会党的交往中，恪守“四项原则”。这就把我们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扩大到适用于其他各类政党。

勃兰特来华前，对我党将如何接待他一行，多少有点捉摸不定。在事先拿到胡耀邦的祝酒词稿后，他迅速对自己的祝酒词和会谈稿作了相应的修改，做出了积极、友好的反应。

邓小平礼节性会见并宴请勃兰特一行，使勃兰特甚为兴奋，称这是给他的荣誉，表示要从邓小平的智慧中汲取一些精华。

勃兰特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两党的接触和联系不断深入发展，中共同其他各国社会党的来往，大大加快了。1985年10月我党应勃兰特当面向赵紫阳发出的邀请，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二次裁军与发展会议，开始了同社会党国际的联系。

## 坚持五项原则，革命不能输出

中共十二大对调整支持革命的外交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支持世界革命，这在三十多年前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抗美援朝、支持越

南抗法抗美，并且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苏大论战时，我们批判苏共不支持革命，说马列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帝。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公开地支持东南亚国家的武装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出发，继续实行支持革命的政策。

作为共产党，当然应该同情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但是，支持外国共产党反对政府的武装斗争，是同国与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同邻国友好关系有矛盾的。1975年7月，毛泽东主席对泰国总理克立说：“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拉扎克（马来西亚总理）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不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1978年，我们对泰国总理江萨重申了毛主席关于“国家是国家关系，党是党的关系”的论点，“我们反对苏联，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它背叛了马列主义，我们不能背叛马列主义。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报告讲对外政策时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用以指导自己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报告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十二大公开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后，我们加快了调整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调整工作包括不再邀请这些党的领导人参加国宴，不再上天安门观礼，停止播发有关这些党的活动的新闻，撤销在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

停止军事援助，逐步减少直到终止经济援助，撤销这些党的在华机构，人员回国或转到第三国，愿留中国的可以留下，不再按党宾对待，年老体弱的可在中国养老，但都要遵守中国法律，不从事反对其本国政府的活动。

整个调整工作过程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尽量稳妥、逐步地进行，给有关党充分时间转变思想和政策。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对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对我们过去支持这些党照搬中国的经验，搞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说明各国革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会损坏社会主义形象，对有关共产党形象也不好。

东南亚有关国家政府对我们调整工作的每一个动作都密切关注，并且能够理解。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改善、加强。

## 党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外本着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思想很活跃，不少人对苏联是不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一条线”、“三个世界”战略有不同看法，并且向中央写信提出了意见。

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对会议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提出了四点“体会”。他说：第一点体会，我们平常说的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是指苏联所奉行的政策，不是指它的社会制度。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第二点体会，苏修集团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不能含糊，但是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是不是它要搞“亡我之战”，侵略我们呢？苏联要把我国占领，我看500万军队不行，至少得1000万军队。苏联人民对我友好之心未灭，相当一部分干部，也是希望同我友好的。有此两条，我觉得苏联要打我们，

搞大规模的反华战争，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难上加难。第三点体会，对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必须放开手做工作。第四点体会，对苏联和东欧等国家要很好地区别，对他们也是很可以做工作的。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强调：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我们要立足于它对华，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对中国威胁唯一的危险来自苏联，来自社会帝国主义，所以我们采取“一条线”的思想，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按照列宁的教导，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1981年3月，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外工作讲话中提出，我们对外政策应该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方针”，为此“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还提到，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霸权主义实质上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1981年3月起，政治局常委李先念（1983年起任国家主席）担任了六年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就讨论加强第三世界工作问题，并强调我们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不能以它们对苏联的关系好坏来划线，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他多次强调，外交上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要强调中美有“战略关系”；“一条线”的提法不要再讲了，“一边倒”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不好。李先念为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做了很多工作。徐向前元帅在1982年7月，再次表示不同意“一条线”的战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提法。

1982年8月10日，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奉命启程去莫斯科，向苏联提出：改善两国关系要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经过了一年两个月的谈判，8月15日，中美达成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协议。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下转18页）

# 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个人回顾

● 李锐口述 王建勋整理



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回顾往事,自然离不开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四个人的作为,因为改革开放的成败是同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关键人物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历史上是被毛泽东同志器重的。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江西,邓小平就因追随毛泽东而挨过整,被撤职。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地位的不断上升和稳固,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就更受到重用。1949 年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邓小平是积极的。但在经济建设等方面,他基本站在刘少奇、周恩来一边。文革伊始,“打倒刘邓”。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对邓小平则是打而不倒,并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起用了邓小平。一年后,由于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革”,再次被打倒。

1978 年,冲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先锋人物是胡耀邦、赵紫阳等人。耀邦首先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批“两个凡是”,发动真理标准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就把毛泽东的文革,并把他的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基本否定,毛泽东晚年织就的意识形态网络也被撕开了一条缝儿。那时,批“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陈云是赞成的,邓小平坚决站在胡耀邦一边。

1980 年,邓小平接受了李维汉关于要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见,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长文。可惜刚起步,又被胡乔木利用波兰发生的团结工会事件腰斩。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有时候有些“谈不拢”。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是坚定的,如成立“特区”等等,这是壮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经济”。这是原则性分歧。在意识形态上,邓小平“不问姓资姓社”,“不管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不被既往的正统理论所限制,敢于突破,这是有极大功劳的,而陈云仍没有完全跳出旧框框。1989 年,中顾委发了个“一号文件”,是陈云谈学习哲学问题的,刊载了陈云同赵紫阳、胡启立、李瑞环 1987 年以后的谈话。陈云说:“列宁《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

邓小平多年领导过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赵紫阳和万里,启用他们三人是完全正确的。上世纪 80 年代中,对这“三驾马车”,邓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给予积极肯定。

除开一些小事情外,胡、赵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赞成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但邓、陈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尽一致的看法。又有几个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间穿梭,经常送材料,他们看不起胡耀邦,对赵紫阳也有意见。如 1983 年,陈云要批胡耀邦,就是这几个人从中兴风作浪,后被邓小平制止了。以后这几个人又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前者只搞了 28 天,被胡、赵联手制止。



1989年风波,中顾委的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赞同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处理学运。后来批斗了我们几个月,准备开除我们的党籍,是陈云把我们四个人保下来了。陈云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1992年春天,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挽救了我国改革开放可能夭折的危机局面。现在,邓、陈两位老人已不在了,“左王”的干扰也不存在了,这是一种便于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形势。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中共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做过总结。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们总的说,取得极大成功,但也有教训需要总结。邓小平同志功绩赫赫,但他也不是神,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所以,我建议也做一个历史问题决议。这样,我党我国进一步全面改革开放的路就更好走了。

经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但代价也大,单位能耗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且呈难以遏制的势头,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结,如此下去,

(上接16页)策”为题,强调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在1984年5月18日欢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马尔科维奇一行的宴会上,胡耀邦作《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质》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独立自主’就是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

我国在新时期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经历了很长的复杂过程。

1983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

会使中国共产党沦为一个利益集团,构成新兴的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近几年来,党中央领导陆续提出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正确的治国方针,这些善良的愿望明显优于30年前的“四个坚持”,但要真正落实,前提是不能再走专制的老路了,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了,不能再犹豫不决了。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我建议首先从开放言论自由、实行舆论监督,和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收入、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入手。为了早一天启动20年前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以法治国,实施宪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开时,连续三次上书中央,敦促开启这一战略举措。现借此文,再次呼吁,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的合法性计,为中共的兴旺发达计,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计,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责任编辑 杜 晋)

讲话中,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第二个转变是对外政策,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邀请访华。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宣布了中国和苏联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至199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危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89年6月起,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制裁,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所谓“人权”问题,越来越成为遏制、西化、分化中国的武器。

(作者系中共中央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

#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 李洪林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退休以前的职业是所谓“理论工作者”。在当代中国,被称作“理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其他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都要冠以本科的帽子,只有研究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才算是“理论工作者”或“理论家”。

在共产党当政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享有特权,是君临一切科学、裁判各种是非的普遍真理。它直接为当局的政治服务,因此“理论工作”便有一种特殊的地位。

但是同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因为直接为政治服务,所以便有特殊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犯“政治错误”。这比“思想错误”严重得多。“思想错误”只是“认识”问题,“政治错误”便是“立场问题”了。

## 我怎样用理论为政治服务

我上大学时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后因工作暴露,遭国民党追捕,1948年进入解放区。

我一到解放区就做理论工作,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研究和宣传。那时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解放全人类的学说,共产党就是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大公无私的政党。作为这个党的一分子,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并且热爱自己的事业。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1959年春天。

这个时期,我是无条件地相信党,我的理论工作就是全心全意为党的政策做出理论上的说明,从马恩列斯毛那里找出根据,证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那种疯狂的大跃进,我也是坐在办公室里鼓气煽风的“理论家”之一。我最尖端的作品是1959年给《红旗》杂志写的一篇社

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个题目便已说明一切。1958年为了钢产量翻一番(从535万吨升为1070万吨),发动9000万人上山,砍光森林烧炭,砸了铁锅炼“钢”,庄稼熟了烂在地里没人收,还叫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已经斫丧了国家元气,弄得人困马乏并且开始挨饿。在这种困境下,1959年中共中央又订出个1800万吨的钢指标,这在当时是绝对不能实现的空想。然而胡乔木还叫我写出上述这样一篇“鼓劲”的《红旗》社论。我在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从未到下面走走,哪里知道生产第一线的艰辛!所以接到这个任务,丝毫也未感到有什么不对,而是兴致勃勃地在稿纸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辩证关系”演绎得头头是道。虽然这篇文稿又经胡乔木修改之后才作为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的社论发表出去为害全国,但我毕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来都心中有愧。

## 反映真实情况,却犯了错误

作为理论工作者,为政治服务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调查研究。我当时工作单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实际上是直接为毛泽东服务的一个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陈伯达,副主任是胡绳和田家英,他们都是毛的大秘书。这个单位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中共中央的职能部门,没有行政性的任务,也没有下级对口单位,只接办毛所交代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当时它编印一个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况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动态》,由我负责编辑。有一次中央办公厅转来一个材料,是武汉华中工学院一个学生张治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此信全面批

评了“三面红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况,并对毛略有微词。信写的很恳切,希望中央能够纠正这些错误。

我因脱离实际,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而这封信所陈述的严重情况,和公开报道的“大好形势”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视。我觉得必须让毛和中央看到这封信。尤其毛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这个材料他不会置之不理。于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动态》1959年第14期(7月下半月)上。谁知那时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这一期《思想界动态》送到庐山,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而毛借机发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期《动态》来到庐山,正好撞到枪口上。

我因刊登张治水这封信,被指控为“配合”彭德怀反对三面红旗,“向党进攻”。所以我经历了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了。

### 现实使我更加右倾

1960年和1961年,我分别在北京和河北的农村中度过。党把我“下放”,是为了改造我的右倾,不料我却被可怕的现实教育得更加右倾了。我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在人民公社的囚笼里痛苦地备受煎熬。这还不说,1962年春天我参加田家英领导的湖南调查,使我和党那时的政治路线离得越发遥远了。

田家英是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命,到他们两人在湖南的老家做农村调查的。我被分在宁乡调查组,去一个炭子冲大队,这是刘少奇的老家,其特点是饿死的人最多。尚未饿死的人也不过是苟延残喘,在死亡线上艰难地挣扎着。所有的农民,可以说都是家徒四壁。我们在一家农民的锅里看到的“饭”是米糠煮青杏,所谓“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谷壳,并不是碾米时的副产品米糠。他的小孩子们围着桌子,仔细找寻稻壳中偶然遗留下的谷粒,剥出一颗生米粒,连忙放在嘴里,像含一粒糖果一样慢慢咀嚼。看了这些可怜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冲大队的调查报告是我执笔的。对我右

倾的批判言犹在耳,但我已顾不上这些指控,而是如实地把这种人间惨状都写了出来。我认为,这是真正为政治服务,只有让党了解这种可怕的情况,才能改变政策,得到人民的谅解。

田家英很欣赏这篇调查报告,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他也亲自看到的。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田把调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兴,能让毛直接看到这些第一手材料。

谁知我又错了。毛泽东看了调查报告以后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责备独自承担了,从而使我躲过一劫。但我的思想却开始彷徨了,说实话倒是“犯错误”,究竟怎样才算政治正确呢?换句话说,党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要怎样才能跟得上,怎样才能不犯错误呢?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猛烈批判“三风”(“黑暗风”,认为形势不好;“单干风”,认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风”,认为反右倾反错了),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让我明白了,党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 理论和政治的蜜月结束了

事实上自从中共建国以来,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届十中全会不过是“三面红旗”失败之后,拒不认错,反而重申左的方针,决心更加坚定沿着这条绝路走下去罢了。

我作为这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下乡以前,从未接触实际,只在办公室里,紧跟党的步伐,按照党的要求写这写那,因此“理论”和“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可是一旦接触实际,“理论”和“政治”的蜜月就结束了,从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让我感到彷徨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从《共产党宣言》问世起,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人无不信奉一条天经地义,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要改造社会,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私有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公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

然而我在农村做的两次调查,却无情地使我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上述原理了。

1961年我在河北省新城县孙家漫撒大队,



1962年我在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大队，都做了该大队从土改后到公社化以后历年的粮食产量调查，可惜这两份调查材料都已遗失，但是那结论当时把我们调查组惊得目瞪口呆的景象，至今都历历在目，因为那历年产量表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但是这些调查并不是上边交办的任务，而只是我们私下“业余”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也没有往上送。但它已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社会主义路线的信念。

我实在没有能力为这种政治服务。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我宣布“洗手不干了”，正式提出要求调动工作。至于想到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去做什么工作，根本也没想过，只求不再做理论工作了。结果，“洗手不干”之说挨了批评，据说只有土匪强盗改邪归正，才称为“洗手不干”，怎能党的理论工作和强盗相比呢？至于调动工作，也不批准，还得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干下去。我虽然心情忧郁，但党员个人必须服从组织，这一点我还是牢记并且认真履行的。不过此后的“工作”已无“理论”可言，上班只是应卯而已。至于十年浩劫期间，连“工作”都谈不到，更不可能和“理论”沾边了。

## 《理论风云》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也是我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东山再起”的时候。回顾一生，“参加革命”逾六十年，只有这短暂的几年，才不曾虚掷年华，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然而这几年也是在风霜雨雪中度过的。

那时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备中共党史展览。不过在党史上，我的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官方早已有了框架，况且党史和国史的档案都深藏在中央档案馆倚山而建的钢

筋水泥库房里，原子弹都炸不开，中央委员都不能随便进去，普通人更无从问津了。在它解密之前，谁能知道真相？

我的兼职是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那倒是个美差，因为它是一座平步青云的天梯。但是能不能平步青云，要看你“党性”如何而定。我的“党性”本来就不够格，况且后来又和胡乔木闹翻了，自然不是“通天”的材料。而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写文章，自己命题自己写，最惬意了。

那两三年，是我写作最密集的时候，经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给我热情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就好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另一方面，这些文章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和中伤。

1985年，三联书店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第一辑是我的文集《理论风云》，收录了这个期间我发表的文章。因为这些文章和它的作者早就受到最高层的“关注”，所以此书刚一出版，就被陈云办公室从三联书店要去五本。后来传出来的权威评语是：“没有理论，只有风云。”

这句评语倒也中肯。这本文集确实谈不上有什么“理论”，因为所谈都是常识，并无创见，只不过别人尚未说出来的时候，我把它说出来罢了。而在当时，要想说出常识，就得突破禁区，说出常识以后，又须防备暗箭。其所以只须防备暗箭，不抵御明枪，是因为我的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



《理论风云》1985年初版(左),1986年再版(右),1987年查禁



李洪林速写像

少民速写  
2007 S.F.O.

## 提出“现代迷信”

1978年春,我写了一篇《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文章是批评毛的错误的。社长胡绩伟和副总编辑王若水主张发表,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成,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正好,这一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复刊,找我约稿,我就把它改写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了他们。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我把它叫“现代迷信”。胡耀邦很欣赏这篇文章,要《中国青年》杂志作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发表了。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很恼火,但又抓不住文章的辫子,所以就找些别的理由,什么“没有突出华主席”呀,等等,把这一期《中国青年》给查禁了。但这期杂志已经发行了很多,还有人把它拆开,一页一页贴到“西单墙”,所以“现代迷信”就成为流行词汇之一了。

这一期《中国青年》出版之后,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忽然有一个身材矮小,十分瘦弱的青年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找我。他是从云南来的,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我看他的两只手腕。

天哪!他的两个手腕整整一圈没有完整的皮肤,因为在狱中长期戴着收得很紧的手铐,勒得手腕子整个溃烂了!溃烂治好之后,皮肤再也不能复生,就落下像手镯一样可怕的伤疤。说它像手镯,因为是环形的,但那面积比手镯还大。

我摸着他那没有知觉的伤疤,问他为什么被折磨成这样。他告诉我:是“现行反革命罪”,因为他“攻击毛主席”。

我又问他,现在怎么又放出来了呢?

他手里拿着一本《中国青年》复刊号,告诉我说,他的“罪行”和《中国青年》上那篇“评论员文章”的观点一样。他在狱中读到这篇文章,就据理申诉,他的罪名果然被推翻了,人也就放出来了。他一放出来就到北京找《中国青年》杂志表示感谢,并要求见见文章作者。杂志编辑部告诉他,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所以就找到历史博物馆来了。

可惜我当时实在是太忙了,没能和他多谈谈心,他也还有别的事情,又匆匆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他瘦弱的身体现在可健壮些?

来没有人公开和我论战,而都是背地里向上诬告。不论突破禁区还是防备暗箭,都是一种战斗,它可以说是在当代中国仅有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风云际会中产生,又在“反对自由化”的风雪交加中遭到禁锢,所以取名“理论风云”。这本书第一版卖光了之后,三联书店又重新进行装帧设计印刷了第二版,但是不久就“奉命”收回,化为纸浆了。对于这种现代化的“焚书”(实际是“煮书”),我曾有意循法律途径讨个公道,为此询问三联领导人:封杀此书的命令来自何处?封杀的理由为何?均遭避而不答,使我打算起诉都找不着被告人。然而我又不能把三联书店告上法庭,因为正是由于三联的关爱,这本书才能面世,我怎能恩将仇报呢?想当初三联敢于在我落难之时出版此书,已属石破天惊,如今被迫收回,显然有难言之隐。我不忍强人所难,只得作罢。

被目为离经叛道的《理论风云》,可以说是完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被我用来作为论据批判“左祸”的,有些还是毛泽东的“思想”。这也正是官方始终拿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对它开展正面批判的原因。如果用“左”和“右”来衡量的话,官方认为它太右,而我现在却认为它有许多地方都太左了。这本书创见虽然没有,倒有三点新鲜之处:一是把毛泽东还原为人,直呼其名。二是介绍所选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所引发的明争暗斗。三是选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写的两篇党气熏人的文章,以反省自己曾为极左的路线涂脂抹粉并曾充当党棍蛮不讲理批判别人的劣迹。

多么好的青年，居然被摧残成这样！

## 不敢忘记受难者的嘱托

打从1978年起，我就不断收到报刊编辑部转给我的读者来信。因为我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的频率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来信的内容都是“左毒”受害者希望我帮他们伸冤的。我对这千里之外伸过来的求救之手，不敢有丝毫怠慢，因为每一封信都寄来一颗受难者期待的心，他们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黑龙江一个人，他1959年因为给彭德怀鸣不平而被判重刑，给我写信时仍在狱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了，所以请我搭救。

我一边看他的信一边掉眼泪，因为我母亲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她早已卧床不起，自知来日无多，每天看着床头的马蹄表，等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写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给黑龙江省委。一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来信告诉我，他已出狱回家，和老母团聚了。狱方告诉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给他平反的。这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悦的是我一封信促成二百多个冤案受害人重见天日。

《人民日报》在1980年把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发言《领袖和人民》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一下子传遍全国，结果许多因为所谓“恶毒攻击罪”而被判重刑入狱的“左毒”受害者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我写信，要求我帮助他们伸冤。从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实他们直接反对的不过是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报》转给我的。他们在监狱里或劳改场，没有通信自由，都是通过千辛万苦偷偷写下，又通过千辛万苦辗转带到监外投递到邮局的。那些由于躲避搜查而时时藏匿的破旧信封，被揉得乱七八糟的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寄托着他们多么殷切的希望！我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文章和会议发言竟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过去我虽然也常接到读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转寄，如今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经定案并在服刑的“反革命罪

犯”，显然不是我这种普通干部转一转申诉信就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简要地介绍一下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即现在有不少人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仍在服刑。然后把那些申诉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邓小平阅后批了几个字：“请胡耀邦同志处理。”胡耀邦雷厉风行，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一次，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入狱者，一律平反，并限期报告处理结果。几个月后，结果出来了，全国有二百多桩这类冤案都平反了。其实这事的处理过程，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胡耀邦有一次到宣传部来，才告诉了我，并且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几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么大的作用，真觉得不虚此生。当然，这也幸亏是邓小平亲眼看到这封信并且批给胡耀邦处理，胡耀邦又明确指示平反并且限期报告结果，所以才如此顺利地把那样多的人解救出来了。否则，凭我一介书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 《读书无禁区》的故事

在《理论风云》中余音袅袅久而未衰的当推《读书无禁区》。直到去年《读书》杂志撤换主编，人们还在谈论这篇文章。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做《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隙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



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为《读书》杂志经过《读书无禁区》这场风浪,名气更大了,读者更喜爱了,所以这个口号已经成为《读书》杂志的标帜。一回顾《读书》,就要谈到这篇文章,所以有一次这个杂志多少周年纪念时(我已忘记年份,好像是二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决定拍一个专题节目,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编入这个节目,中央台到我家来见过面,准备拍一些电视访谈。我倒是自知之明,我这个著名的“自由化分子”,“六四”后蹲过铁窗的人物,能在党的电视台上露面吗?难道中国的政局真要解冻吗?

果然,对我的“电视访谈”最后泡汤了。结果电视播出的画面只有别人在谈《读书无禁区》,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不能露面。那原因当然是一露面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这也算是我那本《理论风云》中余音萦绕最久的一则故事吧,前后经过了二十多年!

此段回忆写罢,偶然上网搜索一下“读书无禁区”,看看这个词是否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一点痕迹。结果“百度”搜出一万三千条,“GOOGLE”搜出二万七千条,第一条就是“水木清华”在2000年1月9日“读书心得版·精华区”上贴出的《读书无禁区》原文。转贴者在原文前面写道:“现在来读这篇二十年前发表的宣言级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又在原文末尾写了一

句读后感:“我把琴盖合上,此曲已成绝唱。”

在流行风尚转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个世纪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实在出乎意外。那位从未谋面的读者“感慨良多”,我这个作者回想起自己坎坷的命运,尤其感慨良多。网上许多条目写的都是“犹记《读书无禁区》”,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犹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还能被人“犹记”多久,但仅从我所能看到的这些点滴来说,已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被人“犹记”更加珍贵呢?

## 后记

“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这副对联,是我从自己的理论活动中得到的经验教训。我做了一辈子理论工作,现在既说不清“理论”的定义,也说不清“政治”的定义。但我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却有一点重要心得,这就是:理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

不管理论的定义是什么,它应该是探求真理的。真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稳定的,不会随着人的意向而变化。而政治则以人的立场和意向为转移。政治总是和政权分不开的。随着掌权者的更替,政治风向也就变了。即使掌权者没有换,他的意向变了,政治风向也要变化。作为理论工作者,只能本着科学良知,执着于真理的追求,而不应当“为政治服务”。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谁也脱离不了政治,理论也不是处在真空当中。但是理论追求的是真理,而政治追求的是权力。在政治角斗场上,是强者胜,而强者未必“真善美”,也可能是“假恶丑”。特别在曲折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策略上常常需要兵不厌诈,纵横捭阖,声东击西,变幻无常,理论怎能跟得上呢?即使能够跟上,这种“理论”也就不成其为理论了。

因此,要处理好理论和政治的关系,唯一的办法是超脱于政治之外。理论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应该把政治本身也作为一个客体进行观察和研究,而不应当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例如《孙子兵法》就把最为变化无常的战争作为客体进行研究,探求那纷纭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中,最不可取的是为现实的政治“量体裁衣”,用理论给当权的政治进行包装。这种做法,即使从执政者本身的利益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了错误将失去纠正的机会。

这样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而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理论研究不是设计政治方案。政治设计可以有步骤,有妥协,有过渡。因为各个政治主体的立场不同,力量强弱也不同,彼此的诉求都不相同,要找到一个结合点十分不易,很难痛痛快快,常常是拖泥带水。这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讲理论就要抛开一切利害得失,剥去所有外衣和偶然因素,把问题说透。讲理论只问真不真,不必考虑谁看了会怎样,尤其不能考虑当权者看了会怎样。事实上你即使想打动当权者,也是把问题说得越透,越有可能打动他的心。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曾有短暂的时间活跃于理论界,这也是我这一生中仅有的几年,此后即销声匿迹。其实平心静气想想,这也是

很自然的事情。我在理论园地里耕耘的时代已经过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也总能涌现出它所需要的人才。封锁资源,箝制思想,固然会扼杀人才,造就奴才,但也会磨练出人才。在网上和书报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犀利的政治评论,深刻的思想探讨,以及资料丰富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它们的作者当中也有“宿儒”,但更多的是后起之秀,这正是理论界的希望之所在。

面对理论园地的新气象,我得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已经大大落后了。所以这些年已经不大写什么东西。偶尔和友人相聚,除了翻翻陈年老账之外,也谈不出什么新的见解。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有些新的想法,但是由于功底不深,讲不出多少道理。去年座谈谢韬文章时随便说了几句,不料被贴到网上,有的地方还不太准确。既然如此,索性结合个人理论活动的经历,把那些粗浅的想法写出来,算是对自己的“思想史”做个反省吧。

(作者系离休干部)

(本文摘自作者《往事回忆》)

广 告

##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 110 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 3003 米,井底水温 62℃,出井水温 56℃,日出水量达 1200 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种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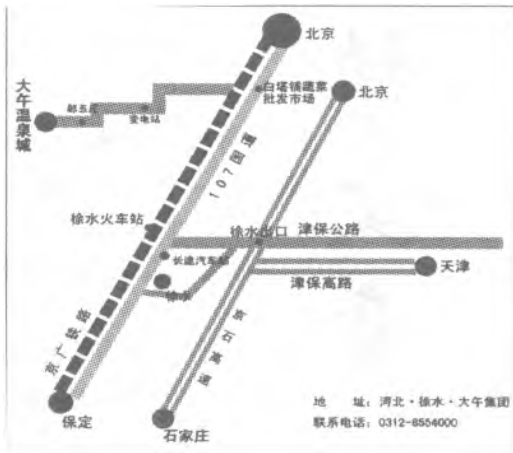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 60 元,温泉佳宾馆标间 280 元(含温泉门票 48 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 107 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 5 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 5 公里、距保定市 25 公里。保定市 12 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 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

● 袁 鹰

今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考察人民日报社,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提出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营造良好舆论



三面红旗宣传画

环境。锦涛同志说:“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二十四个字,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人,不论职位高低,都该牢牢记住,时时引以为戒。

我作为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的一名编辑,感受尤深。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所担负的舆论导向,不论是“利党利国利民”还是“误党误国误民”,影响和威力都特别巨大而深远,尤其是后者,造成的危害和恶果,常常无法预料。中年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文革”大乱开始之时,跟着那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出的“五·一六通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以前所未有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一篇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举起“文革”黑旗的社论,其实同报社编辑部毫无关系,是陈伯达率领进驻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工作组带来的),开始了大疯狂的十年黑暗历史。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被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党羽所控制,后来又增加《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被篡夺了党中央领导大权的“中央文革”严密控制的“两报一刊”,十年中“误党误国误民”的舆论导向,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现在倘若去翻翻那十年的报纸合订本,从内容到版面,常会让你心惊肉跳。这些年来,已经有不少文章和出版物,详细揭露,记录在案,将来一定还会陆续出现。历史上凡是危害人民、危害国家的事实,无论用什么借口、什么方法去掩饰或者曲解,都是不得人心的。

这类大事暂且按下不表。我在这里仅就五十年代后期头脑发热的年代自己所写的发热文章,作为错误舆论引导一例,呈现于读者之前。

如今,若是同一些中青年人士讲起五十年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年代,讲起全民大炼钢铁、全民写民歌、亩产万斤稻、农村吃饭不要钱这类事,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以为是编造中国版的《天方夜谭》,不相信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对年过花甲古稀的老年人,肯定会引起一连串辛酸苦涩的记忆,难以忘怀。那几年,来自中央的一个号召接着一个号召,一个口号接着一个口号,从上到下,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头脑发热,狂潮汹涌。不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善良,愿望如何美好,结果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全民族的空前灾难,三四千万人饿死,工厂不冒烟,商店货架没有存货,全民饥饿,浮肿消瘦,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国家主席刘少奇引用他湖南家乡人民的一句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纠正当时来自最高领导人、流传甚广的“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错误估计,是符合实际状况的总结。也许这样的“倒三七”估计还是轻了些,因为那几年并未遇到特大的水旱灾害,而是由于领导人头脑发热,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又听不得不同意见,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策,形成了几乎遍及全国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谎报风、命令风和种种违反了多年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做法,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作为党的喉舌,报纸在那几年起了相当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人民日报》的元老之一、曾任总编辑的李庄后来做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典型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刘少奇同志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过:这几年的教训,中央要负一半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责任。这个批评相当严厉,也符合事实,并不过分。那个时期特别是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上几乎天天都会出现让读者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新闻、通讯、言论和标题。从要闻版、工业版、农业版直到文艺副刊,都是如此。随便举个例子:1958年8月22日河北徐水县制定了一份《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人民日报》为此在第二天发表了长篇报道,其中就有这样的字句,“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这里所说的“仙境”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许多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到1958年竟然似乎指日可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那时也时常能见到。

在这样如火如荼的气氛下,《人民日报》副刊自然不敢后人,尽力配合,发表了不少热气腾腾的稿件,精心安排了不少擂鼓呐喊助威的版面,我在新近出版的拙著《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中有所述及,此处不赘。使我后来常常成为一块心病、长怀愧疚之情的,是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散文、杂文、随笔和诗歌,不遗余力参与了这类发热浮夸的大合唱。五十年过去

了,总觉得对善良的读者欠了一笔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对他们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甚至强词夺理的假话,做了许多不符合实际、过分夸张的叙述,描写了许多虚幻的彩色泡沫。

现在摘录一些当年的文字,作为例证,请今天的读者审视一下我干过些什么傻事,写过些什么发热的文章。用另一种字体排,并不是因为它们如何重要,而是因为它们如何可笑。

1958年秋天,我和文艺部一位同事去四川组织宣传“大跃进”的副刊稿件,在川东万县地区,看到大巴山人民大炼钢铁的热烈场面,写了一篇题为《巴山铁水》的散文,其中写道:

大巴山最早迎接上山来的,是一群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又细心的人。不管赤日炎炎,还是连天阴雨,他们总背着口袋,拿着钉锤,到处敲敲打打,寻找矿苗,你道他们都是勘探专家么?不,他们大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同矿山打交道,有许多人从来也没看过铁矿是啥样子。忠县有位乡党总支书记,背着口袋上山找矿,看见有点异样的石头,就采一块,这样采了一口袋,背下山来找人辨认。忠县洋渡乡金台农业社的监察主任老谭,在金台山找到一处矿苗,挖了四天,就没有了。老谭心里发急,全乡都在等着他的消息哩!他回家吃了一顿饭,又进入一片没有人烟的老山密林,下几百丈到沟底,上几百丈到对山,他就在这里找了七八天,饿了就吃麦粑粑,渴了就喝河沟水,老虎就在附近咻咻吼,他也不管,终于在一个深岩洞里找到矿……

找到了铁,山上便响彻了火药爆炸声和钻头的震击声,直上直下的山壁上便出现了蜿蜒的羊肠小路,便出现川流不息的挑运矿石的队伍。于是,两三个月里,小高炉、土高炉便一个个、一群群地出现了。

我们曾在奉节县深山里一个炼铁厂里住过一夜。那里,有一个二十一立方公尺的高炉,现在正在日夜赶建另一个同它一样大的高炉。那里,焦炭要从十多公里外运来,没有公路,就用人挑,用兽力车运,反正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工人们有时连着干十多二十个小时,有一个翻砂工人告诉我,他已经连着干了十六个小时了,可是一点不觉得累。……



河北省徐水县在大跃进时代修建的土高炉

大巴山里的深夜，并不安静。除了高炉在歌唱，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电话铃声，这是地委或者县委在召集电话会议，这是区里、乡里在询问今天的出铁数字；这是钢铁指挥部在调动队伍，从这个区去支援那个区，这是每一个前沿阵地的指挥员在向上级报捷……

全民大炼钢铁的1958年，不仅农村，连北京各个机关都参加了，几乎每个机关后院，都是日夜炉火熊熊。我的爱人将家里的旧铁锅、旧菜刀、蜂窝煤炉以至旧缝纫机搜罗在一起，坐一辆三轮车送到机关去。那些东西就是铁制品，有的还淬了钢，不知扔到土高炉里能炼出什么。

沸腾的1958年过去，1959年又是一个“大跃进”的年头。我写了一篇《第十个春天》，其中有这样的字句：

我们刚送走了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辉煌胜利的一九五八年。一九五八年，是我们历史上空前灿烂的一年。……这一年，我们的工农业主要产品钢、煤、机床、粮食、棉花的产量，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增长，而是百分之几十地增长。我们创造了世界罕有的速度。这一年，在亚洲东部广阔的土地上，出现了一轮初升的太阳——人民公社，只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我国广大的农村除了个别地区以外，遍地树起了人民公社的鲜艳夺目的红旗。这一年，六千万人参加了炼钢的行列，热火朝天，餐风饮露，响亮地完成了党中央的伟大号召，提前把一〇七〇万吨钢拿到手。这一年，我们在每个战线上都有火箭一样的

速度向前飞跃。这一年，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风格大大发扬……

在另外几篇文章里，这一类的语句，比比皆是：

当严寒的风雪呼啸着的季节，人们就说过：大跃进的年代没有冬天。果然，在工厂、矿山，人们丝毫没有停过脚步，在农村，积肥备耕的战鼓敲个不歇，就这样热热闹闹地迎来了又送走了今年的第一季度。如今，春潮汹涌，万马奔腾，红旗招展，群情振奋，上下一心，左右逢源，正形成一个轰轰烈烈大搞增产节约的局面。（《春潮汹涌》，1959年4月）

最近一个时期，光从报纸上看，确实确实显示了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跃进高潮的无限美妙的景色，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也使人心潮起伏，振奋不已。

看吧，甘肃决心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广东澄海县争取十年内亩产二千七百三十五斤；河南舞阳县先锋社三年治山规划，四十天就完成。……这些只是随手拈来的几个例子，如果仔细看看报纸，真是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不仅是眼睛上，而且是思想上、心理上，每天都感到赶不上新形势了。

张张报纸上都是“大跃进”、“比干劲”、“快马加鞭”、“力争上游”的字样。这一片千军万马奋勇前进的脚步声，合成了一曲庄严雄壮的交响乐；这一片气势磅礴的干劲，组成了规模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图景……

（《好大喜功和小试锋芒》，1959年春节）

1958年秋天，报上几乎天天都有“放高产卫星”的报道。天津郊区某大队亩产十万斤水稻的“卫星”震惊全国，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们文艺部全体人员由部主任袁水拍带领乘火车去参观这个“新生事物”，只见那块高产田密不通风，为防止过密造成腐烂，在田埂上放了多架吹风机，向稻田里吹风。大家看了，嘴上说“这倒是新鲜事”，心里却都认为是弄虚作假。我爱人的机关也组织干部去天津参观这个大队，同去的有一位同事的老母亲，老人家一看就直说“完全是骗人，根本不可能的”。

其实那几年我出差到外地,也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大跃进”年代给老百姓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说大话的浮夸风更是比比皆是。1959年5月,我陪同朝鲜新闻代表团访问四川,在成都郊区某县一个生产大队部,朝鲜同志看到门口高悬“××红专大学”招牌,十分诧异地问:“这是大学?”摇头表示不明白,他们心里一定想到这怎么能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者平壤的金日成大学是一回事?我当然知道那只是一间向社员作政治宣传、传播农业技术的屋子,根本不是什么大学。至于百货公司没有多少商品,橱窗空空,想买点特产都找不到,更是随处可见。1960年到浙江富阳八一大队,正遇中秋节,大队食堂给我们的菜就是一碗煮芋头,这已经是照顾我们“北京客人”的佳肴了。第二年春天到京郊怀柔县汤河口,大队食堂中午每人只吃到两只窝头和一碗盐水煮大葱,食堂优待我们,每人给一大碗堆尖的大葱,而我们三个人一起只吃了小半碗。看到老百姓家徒四壁,面有菜色,小孩个个骨瘦如柴,我们心里都很难受,但是,一写到笔下,就必定走了样。上面这类虚张声势、空洞浮夸的文字,在那几年的文章里时时可见,它们都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杂志上,有的还在版面占有显著地位,当时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自以为努力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为“三面红旗”擂鼓助威。今天再来摘录的时候,却只有脸红心跳,有点像一个小偷。小偷乘你不备,摸了你的钱包、手表,我们这种从事报纸工作的人,却是依仗读者对报纸刊物的信任,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读者说了那么多大话、空话、假话,还以为是在向他们介绍大好形势,鼓舞人们的斗志,歌颂群众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用现在时髦话是“高唱主旋律”。冷静想一想,却是加入了刘少奇同志批评的“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的行列,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对他们犯有罪责。《人民日报》和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刊物,历来在群众心目中都占有很高的位置,中国老百姓有相信党报党刊的传统,凡是报上说的,大多都被认为是党的声音。党的号召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

然而,读者毕竟不是傻子,不是随随便便就听凭愚弄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大白话,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从亲身实践中

明白报上讲的并不全是事实,甚至完全不是事实,就不再轻信盲从了。1958年冬天,我有一次从武汉回北京,在火车硬席卧铺车厢,听到下铺两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乘客在议论。火车夜过河南大地,铁路两旁一片红光闪闪,大约连夜摆开大炼钢铁的战场。这两位乘客从窗外的情景,谈到近日在省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那里各行各业大炼钢铁的通讯,以内行的口吻很不以为然,认为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一位摇摇头说:“报上总是吹,吹把蚂蚁都能吹成大象。”另一位说:“碰到这种文章,我只有一个办法:不看,也不信。”前一位又说:“你不信,有人信呀,这不明明是害人吗?”过了一会,他又叹口气说:“其实也不能全怪报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的大事,报纸自己能做得了主吗?”我躺在上铺,静听他们的尖锐批评,面红耳赤,不敢发一言,那个尴尬场面,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撇开报纸上常见的那些按宣传需要编写的所谓“读者热烈反应”、“大家一致认为”……这才是人民群众对那个发热年代舆论导向最真实的反应、最公允的评价,短短几句话,抵得上万语千言。

(作者系《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李 晨)

## 本刊扩版调价启事

应作者和读者要求,从2009年1月起,本刊篇幅从84页增加到92页。由于扩版和纸价大幅上涨,自2009年1月起,本刊定价从5.80元提高到6.90元,全年82.8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91年—95年)库存不多,欲购从速。本书系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合计137元。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电话:010-68532048。

炎黄春秋杂志社



#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 阎长贵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央政治局，这为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的江青提供了呼风唤雨的平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执牛耳者是江青。陈伯达是傀儡，是“刘盆子”。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独裁”和“专政”，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当年的红卫兵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作为当事人，也都这样或那样地谈过这个事情。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页）穆欣对陈伯达自称“刘盆子”做了明确的解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让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江青当家，他这个组长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59页）

关于江青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专政”，穆欣还有更全面、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

是江青眼中的“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就得耐着性子等候，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不停，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江青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得意时，胡侃神聊，一不如意，佛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她讲话发言时，不怕别人震耳欲聋，可是，她却不许别人出大声……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二版第368—369页）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实确实是江青说了算，“一言九鼎”。我们工作人员也看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指示可执行可不执行，而对江青的话和指示那可是说一不二，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江青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小组成员对江青毕恭毕敬。

1966年8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月30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疾言厉色，经常像训小孩那样训他。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

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一个革命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如果说江青对陶铸都这样,那她对陈伯达就更是这样。兹举几例。

王力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1967年1月4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对此,毛泽东1月8日肯定,到2月10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那一天(按指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1967年1月4日),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借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王力反思录》第976—977页)

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楼(江青住的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唉……”长叹一声。“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这个尖刻、辛辣的数落,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的一个致命弱点,即好推脱责任。

我还碰到一件事情,就是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在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沮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心头一震,赶忙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对陈伯达用“熊样”这样不雅又伤人自尊的语

言。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也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冷嘲热讽地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谈到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当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宴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宴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什么理论性强啊,水平高啊,等等。我说:“叔宴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要问江青。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我向江青报告了这件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他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他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我感到没法交代——因为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

一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宴……

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事和怪事，这就是开会不做记录。为什么？江青不让记。开会不让做记录，这也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表现之一。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开会她从不让记录。避免留下任何痕迹。”又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做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她认为，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咒天骂地，就可以大搞阴谋诡计，谁也不会记录本上留下她的罪恶言行。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他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平安无事’，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在第二次，当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一见，立刻神经过敏，怪腔怪调地责问：‘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尽管是总理的决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践踏。”（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第2版第280、385页）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反复说“小阎”（即指我）做文革小组会的记录。如第220页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江青办公室召开紧急碰头会，‘由小阎做记录’。”第234页说：“陈伯达抬头望望正在紧张地做记录的小阎。”第305页说：“好多中央文革小组会，小阎‘都做记录’。这纯粹是胡编乱造。我从来没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的会，当然也没做过记录。林青山一点也不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实际情况。”

江青为了能顺利地中央文革小组作威作福，实行“专政”，她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办公室（1966年底她指示改称“办事组”）很“关心”，很在意，以便这个办事机构能很好地为她服务。这是一个拥有近200人的机构，其成员都是按照那个年代崇尚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那日益减少其人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到1968年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倒台（实则被相继抛出）后，则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

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大人物，其职务：一个顾问、三个正副组长、一个组员，绝大多数都被剔除了（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14人，其中：顾问2人，正副组长5人，组员7人）。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忽略掉不妥当。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江青不满意曹轶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的名义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1967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在1967年8月底被抛出，他被退回马列研究院，翌年3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矫玉山，我们时间很短，1967年12月上任，到1968年1月，大概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都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差不多与我们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接替我的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也是“稳坐钓鱼台”、善始善终的一任。当我被任命为办事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还是江青的秘书。她为什么要我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就是因为她当时还信任我，其目的是要我帮她或替她控制办事机构。我因“莫须有”的“坐探”罪名投进监狱后，江青又叫她女儿接这个位置，这清楚不过地表明她要她信任的人控制这个办事机构的良苦用心。她的目的达到了。李讷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按照陈伯达的说法：“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了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陈伯达遗稿》，第109页）江青不仅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清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剩下他们五个大人物。其情况比较复杂，我不妄加评议。而她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十几个一般工作人员（我这里没把名字都列出来）投进监狱，关押多年，没有一个不是错的，没有一个不是冤案，这也是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业绩”……

（本文作者系中央办公厅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责任编辑 吴 思）



# 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

● 张颂甲

## 破题

王府井是首都北京的一条主要商业大街，这里白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夜晚灯烛通明，火树银花，完全可以与美国纽约的时报广场、法国巴黎的拉迪方斯广场和日本东京的银座相比美。

然而，二十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白天顾客还比较多，每到黄昏，沿街商店便纷纷关门谢客。入夜，整条大街除路灯外，一片漆黑。只有行色匆匆的过客，没有欢声笑语的交易。这种状况自60年代相沿至80年代初。

那是计划经济年代，王府井主要是国营商业的天下，商业职工八小时工作制是不容突破的，再加上吃“大锅饭”，职工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以致每到华灯初上时，商店和企事业单位一样同时下班。这种情况全国各城市概莫能外。难怪许多访华的外国友人诧异地问道：中国的城市为什么没有夜生活？

1984年2月，刚刚创刊一年的我国主要经济报纸《经济日报》编辑部萌发了借助舆论，改变这一落后状况的想法。报社当时就在王府井大街办公，于是想从王府井夜间购物困难为切入口，开展一次批评建议性的报道，促使王府井首先亮起来，进而推动北京市亮起来，以方便群众，繁荣商业。倡议和主持这一宣传报道的是时任副总编辑兼记者部主任的我，赞同并支持这一计划的是总编辑安岗。

**提出倡议：让王府井亮起来，延长营业时间，服务广大群众**

1984年3月15日《经济日报》一版右上方

显著位置发表了由我撰写、安岗总编辑审阅的本报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文章在介绍了王府井大街的现状后，提出“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这一呼吁。

当天的报纸同时发表了题为《王府井大部分商店晚间关门过早，广大顾客希望适当延长营业时间》的新闻，配发了本报记者在王府井实地调查的情况：从王府井南口到灯市西口一公里长的大街上，当时共有130家商店，其中26家在下午5时到6时太阳还没落山时就关上店门，78家从6时30分到7时30分先后关门停业，有21家营业到8时或9时，只有5家小门市部营业到10时，占商店总数的4%。特别是经营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服装、鞋帽、书籍和修理、服务业等92家较大的国营店铺，全部在7时30分前闭门停业。

是不是在晚7时30分以后商店就没有顾客了呢？答案是否定的。3月14日晚，本报记者在采访中看到，百货大楼规定晚8时关门，还没到点，大门就关了一半，开始送客。人们蜂拥着从半扇门往外挤，而一些还想购物的人又心急火燎地往店内拥，互相碰撞，狼狈不堪。当日8时过3分，一位家住北京站附近的大娘领着小外孙，由姑娘陪同，急匆匆地来到百货大楼，可惜晚了一步。原来，这位老大娘想给小外孙买顶帽子，吃完晚饭就奔赴王府井，先到儿童用品商店，吃了闭门羹，又急忙赶到百货大楼，没想到也关门了。

那时每到下午和晚间，在王府井吃饭也很难。记者于3月14日下午4时多来到百货大楼南边的地下餐厅，只见售货窗口高悬“面条售完”的通告，玻璃柜内只剩几盘花生米，十几张餐桌空无一人，服务员已经把店堂清扫干净，准备打烊了。



1984年3月15日《经济日报》一版版面

问这组报道是谁让发表的？事前为什么不请示？事关几百万财贸职工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你们解决得了吗？你们如此轻率地提出批评，如何收场……

安岗总编辑接电话后，立即嘱我停止发稿。对上级的命令，我们只有服从。自3月17日起，《经济日报》有关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的报道立即停止。读者不知出了何事，有的打电话询问：“这方面的报道以后还登不登？”半个月过去了，报纸始终保持缄默。

对于这一组批评报道不仅报社的上级领导有意见，北京市商业部门的某些领导也有一大堆意见。一时间，对报社的批评意见铺天盖地而来：

“八小时工作制是法定的劳动时间，为什么财贸职工要加班加点？”

“不搞夜市，可以大大节省电力消耗，符合勤俭节约精神。”

“不搞夜市，可减少一些青年的生活腐化行为，有利于培养第二代。”

“不搞夜市，不给宵小提供活动场所，可减少偷窃案件，有利于治安。”……

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批评，我们无法作答，只能啼笑皆非地倾听。

一天夜晚，本报北京记者站副站长李志贤悄悄告诉我：有人在调查主抓这个报道的张××是什么人，为什么给北京市添乱……？

### 中央支持：总书记九个字的批示改天换地

1984年初春，安岗总编辑和我商量，要我把有关情况直接反映到党中央。于是，由我执笔并署名的一份《内部情况》很快绕过了报社的领导机关，直接送进中南海。当时有同志劝我不要冒这个政治风险，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利直接

**要改变茶叶独家经营统购包销办法**  
 实行多渠道流通组织产销直接见面  
 福建省长李葆华在福州主持召开全省茶叶工作会议，会上提出：要改变茶叶独家经营统购包销办法，实行多渠道流通，组织产销直接见面。李省长指出，茶叶是福建省的传统优势产业，长期以来实行统购包销，不利于调动茶农的生产积极性，也不利于茶叶的流通和出口。会议要求各地要解放思想，打破独家经营，实行多渠道流通，组织产销直接见面，提高茶农的收入，促进茶叶生产的发展。

**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  
 王府井大街是北京的一条主要街道，也是北京的一条风景线。长期以来，王府井大街在晚上总是漆黑一片，给行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北京市商业部门决定，从即日起，王府井大街在晚上也要亮起来，让这条街道更加美丽、更加繁华。这一决定得到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和欢迎。



结合整章解决突出的业务问题

这位记者当天还看到，有些商店不到规定的营业时间便提前关门。精工牌钟表专修店不到6时半就有人提前把门看住，许出不许进；不少商店虽然开着门，但不再往货架上进货；全素斋餐馆到下午5时多就只剩一种豆制品菜了；懋隆外宾服务部、东华门供销经理门市部、王府井家具店等于下午5时或5时半关门；云峰皮鞋店、北京照相机厂修理部等在下午6时也关了门。对上述情况，报纸都做了如实报道。

这一天《经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还刊发了由摄影记者李保国、王正桂拍摄的一张王府井夜景照片，说明是：“一到晚上8时以后，王府井大街店门紧闭，行人稀少。”从中可以看出，入夜后王府井街道两侧漆黑一片。

《经济日报》的这组批评报道见报后，立即得到众多读者的共鸣和欢迎。

### 上级斥责：事关全国财贸职工的工作安排和生活问题，宣传前为何不请示？

改革和突破一些旧事物，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阻力。3月16日下午，报社编辑部接到上级领导机关国务院财贸小组主要领导同志的电话，指

向党中央总书记反映情况。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组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闻报道很快惊动了党中央,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我所写的材料,当即于3月24日批示给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段君毅同志:“可否从王府井先改起?”总书记的批示,力量无穷,对后来全国亮起来起了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这一时期对新创刊的《经济日报》表示出很大兴趣,其后不久,他亲笔为《经济日报》题写了报头,以示支持。

陈云同志专门让他的秘书朱佳木同志给报社打来电话:“这张报纸办得不错,方向明确,敢于碰硬,面对实际,很有生气。”陈云同志明确表态:“王府井搞夜市,这个宣传抓得好。”

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也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报社支持让王府井亮起来的报道。

就在王府井大街亮起来稿件停发的当天(3月17日),曾任北京市第一常务副市长,时任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张友渔同志在接见本报记者虞震、李洪波时指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商店关门过早给群众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他说:公私合营前,人们晚间在王府井大街要吃点啥、买点啥都还很便当。直到建国十周年前夕王府井大街的商店也通常在晚上9点以后关门,甚至更晚一些。二十多年过去了,首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市区人口增加多了,二是就业水平提高了,三是国际交往频繁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国客人大量拥来,内地群众来首都办事、开会、旅游的也与日俱增。白天,国内群众要上班、开会、办事,海外来客要谈生意、赴宴会、会朋友、游山玩水,只有晚上才能抽点工夫来逛马路。因为商店关门早,往往要吃“闭门羹”。为什么群众批评我们有“官商”作风?“官商”就是商店机关化,人家上班你上班,人家下班你下班。白天拥挤不堪,晚上关门大吉,这合适吗?

谈到延长营业时间的可能性时,张友渔具体建议,通过合理调配劳力,使商店的营业时间方便消费者购买,市场自然繁荣起来。至于由此增加的费用,则完全可以从延长时间而增加的收入中得到补偿。

张友渔对《经济日报》这组报道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王府井开夜市是方便全市、全国、全世界的好事,凡是方便群众有利国家的事,我们都应该努力去办。

## 宣传受挫:王府井亮起来第一天,春雨潇潇,顾客寥寥

有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过问和支持,国务院财贸小组收回成命不再干预了。报社同志以更大的热情投身报道工作中来。有关报道在停摆了半个月后,于3月30日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重新开始了。

当中央领导同志重视繁荣首都市场的信息传到了北京市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立即向北京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转发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批件,并要求有关部门迅速研究延长王府井大街等商业区营业时间问题。

在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过问下,北京各城区财贸部门和几个大百货商店(场)的负责人连夜对有关问题作了研究,多次听取基层干部、职工的意见,最后作出决定:从4月1日起,包括百货大楼和东风市场(东安市场)在内的王府井大街商业区的大部分商店,延长营业时间半小时到1小时,城区其他商业区商店也根据具体情况,延长半小时或1小时。

北京市有关部门还要求各区、局、公司提前和交通、治安、环卫等部门相互通气,协调工作,对职工的福利、小孩入托、倒班吃饭、上下班乘车等实际问题要尽可能解决好,以便能更好地坚持下去。

凡事开头难。用行政命令每天仅延长营业时间半个到一个小时,就费了这么大的周折,以后繁华商业区发展成为不夜城,是当时人们难以想像的。

报纸的批评终于有了着落,4月1日王府井就要开办夜市了,负责这项采访任务的本报记者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报道王府井延长营业时间第一天、开启夜市的盛况。

但是天公不作美。4月1日下了一天雨,入夜雨势更大。春寒料峭,冷风刺骨,再加上是第一天,许多市民还不知道这个新规定,外出的很少,



虽然夜晚的王府井大街灯火齐明,但前来购物的顾客并不多,营业员站在那里无所事事。

夜晚10时多,负责探访夜市的记者陆续冒雨灰溜溜地归来,各位记者的笔记本上几乎都没有记录到多少素材,编辑部夜班一位一直不大同意搞这组报道的负责同志带着嘲讽口吻说,要发新闻,标题只能标:“王府井夜市第一天(肩题)春雨潇潇,顾客寥寥(主题)”。

我说,当然不能发这样纯客观的新闻。我们既要按照新闻报道必须实事求是的原则,又要善于从积极的正面去引导,既然破天荒地开放了夜市,就需要写新闻来加以介绍。于是,我们坐下来,由《经济日报》北京记者站站长郭仲义执笔,字斟句酌地写出了下面的新闻,刊登在4月2日《经济日报》第一版上:

### 王府井商业街即景

延长营业时间第一个夜晚不少顾客冒雨进店买东西

本报讯 4月1日,是北京王府井商业街延长营业时间的第一天。傍晚,恰逢第一场春雨,街上灯火通明,不少顾客冒雨进店购买东西。据记者观察,八时以后仍然营业的商店,有王府井百货大楼、东风市场(东安市场)、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等二十多家。这些商店的营业员都坚守工作岗位,直到规定的停业时间。在百货大楼食品部,虽然已到八点半下班时间,三位营业员仍热情地替一位冒雨前来的老太太挑选盒装糖果。

这天晚上,北京市财贸部门的领导也到王府井巡视。第一商业局一位领导看到满街商店灯火通明但顾客不多的情况,愤怒地拍案:“今晚的电费让张××出!”

### 春潮涌动:王府井夜市人流熙攘,顾客盈门,财源茂盛

次日(4月2日)阳光灿烂,温度上升,我们对第二天的夜市抱着希望。果然,王府井办夜市的信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像春节赶庙会一样蜂拥赶来王府井,于是,这一天夜市与昨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本报记者在4月3日《经济日报》二版以《昨晚王府井大街人流熙攘商店顾客盈门群众称赞商店延长营业时间确实好,要是再延长

些时间就更好了》为题如实做了报道,介绍了顾客购物的踊跃、购物人数和商店营业额增长的幅度及大多数顾客对进一步延长营业时间的愿望。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赶到王府井拍摄了电视新闻,王府井商店适当延长营业时间的情况在电视屏幕上和广大观众见了面。王府井办夜市后,顾客日益增多,销售额逐日猛升。北京市西单、前门等主要商业区见到这个景象,也不约而同分别延长了营业时间。

### 借势推动:在加强宣传的同时,邀请全国人大代表逛夜市,向全国推广王府井的经验

王府井亮起来转瞬已七天,这一周的营业情况如何?商业从业人员有何想法?有何新的矛盾与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作为连续报道,我派出记者分别走访了百货大楼、东风市场、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和春元楼饭庄四家大型商店(场)的领导,进一步交流情况,以便推动这一改革举措更好地向前发展。

4月9日本报一版摘要报道了各店场负责人的谈话,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发表了《编者按》。

……王府井部分商店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以后,广大群众无不拍手叫好,相形之下,有的商业人员却显得有些被动,甚至积极性不高。何以如此?主要是经济利益还没有同企业和个人挂上钩,不能把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同时,强调自身困难多,考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少,看来,商业要继续进行必要的改革,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完善零售商业和服务业的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希望王府井以亮起来为起步,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有关商业的有益探讨,力争开创一条新路子,做到“三兼顾”“四满意”,更好地为广大消费者服务。

王府井亮起来一个月后,我又以编辑部名义在报社主持召开了王府井十五家商店负责人的座谈会,反映了他们的强烈要求:上级应给企业“松绑”,让商店经营有自主权。

基层商业部门在媒体的呼吁,很快有了回

应。5月6日下午,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有商业、服务、轻工、税务、财政、物价、银行、工商管理等部门领导以及王府井十五家商店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和分管财贸的副书记、副市长都到会。这是一次带决策性的重要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表示:“《经济日报》的报道,是对北京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现在,改革商业



2008年4月1日的王府井夜景,时隔商业街延长营业时间的第一天整24年

势在必行,我们一定要从‘亮起来’破题,给商业企业‘松绑’,抓好城市经济改革。”同时指出《经济日报》刊登的“王府井十五家商店负责人座谈会”对商业改革提出了好意见,我们完全支持。”商业部部长刘毅也到会,表示完全支持《经济日报》的宣传报道,赞同北京市的改革意见。

就在王府井亮起来之后不久,全国六届人大和政协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了扩大亮起来在全国的影响,并征求“两会”代表和委员的意见,我派出采访两会的记者汪洋、赵健、姜波等先后邀请并陪同安徽、广西、湖南、陕西、四川、山东等省的部分人大代表在夜晚来王府井浏览、购物。其他省、市、区的代表也纷纷闻讯前来观光。

代表们边逛街,边称赞,纷纷表示回去后一定要促进本地商业区也尽快亮起来,以美化城市面貌,繁荣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也热情地向本报记者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

要真正把夜市办得热热闹闹,光国营商业不行,要国营、集体、个人一齐上;许多商店的商品还不够丰富,反映了目前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基层商店没有进货的自主权,以致消费者和商品见不了面;办好夜市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打破“大锅饭”,不折不扣地实行经济责任制,明确每一个职工的责、权、利,真正做到物美价廉,童叟无欺,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送给顾客……

各地的代表和委员们期望王府井商业大街的改革有新的突破,为全国带一个好头。在记者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的《经济日报》充分反映人大代表的意见。对集体前来参观的代表,我在经济日报社附设的王府井茶馆内设茶款待。

面对这些热气腾腾的议论,北京市代表团的代表们坐不住了。他们认为,外地代表们的意见提得对,提得好,北京市一定要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延长营业时间、方便群众、克服“官商”作风为突破口,认真改善商业工作,更好地为全市、全国人民和外国友人服务。一些代表主动找到本报记者提出不少具体意见。北京大学副校长朱德熙说,在商业改革中,各个商店、饭馆都要建立责任制,保证服务质量,认真贯彻食品卫生法,尽量使顾客满意。清华大学名誉校长刘达说,过去北京的风味小吃很多,像爆肚、炒肝、炸丸子、老豆腐等等,既便宜,又方便。现在这些小吃大为减少,而且吃饭排队。人们呼喊“吃饭难”。相声大师侯宝林看了《经济日报》后说:我觉得北京的商业和工业改革都比较落后,有人就是愿意保持现状,不思改革;有些事集体、个体可以干的,可是不让人家干。他认为,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增加了经济效益,就应发加班费,多劳多得

嘛！六届人大常委、全国侨联副主席洪丝丝转达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的要求：王府井延长营业时间只是小改革，算不上大改革，多数商店应延长到晚十点左右，夜宵店还应延长到午夜以后。

### 后记

王府井亮起来的连续报道自3月14日开始，到6月15日大体上告一段落。除开始时中间被迫停止宣传十三天外，在其余的两个半月内，几乎天天发消息，版版见报道。根据总书记的批示精神，我们组织和采写的数以百篇计的新闻、通讯、速写、评论、文章、专论等形成强大的宣传声势，引起各地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的关注，立竿见影地扩大了宣传报道效果。

乘着党的改革开放的东风，在王府井亮起来的推动下，北京市各条商业街道争先恐后地都亮起来，而且营业时间一延再延，市民们晚上逛街购物不再困难了。与此同时，不用发红头文件，不要开会传达，不必层层布置，不须作出规定，由新闻媒体一竿子插到底，全国各大中城市主要商业街区不约而同地纷纷自动亮起来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从王府井发展起来的各地夜市又有了新的发展。北京天安门十里长街、上海外滩及浦东、天津海河两岸、重庆整个山城以及其他大城市都有了自己的特色景区，每逢节假日的夜晚，都是灯明如昼，光辉璀璨，色彩斑斓，晶莹剔透，形成了一道道美轮美奂的风景区。今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和各协办城市的灯饰更增加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等内容。庆祝奥运的花坛造型，在灯光照射下，绽放出欢乐祥和的异彩。

斗转星移，春去秋来，转眼间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力的支持与鼓励，为改革开放的报道指明了方向，心情便激动不已。亮起来虽然只是改革开放大潮中激起的一朵浪花，但它是在党中央英明正确指引下，解放思想，做出的一个毅然的抉择。亮起来，让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给中外人士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作者系《经济日报》原副总编辑、《中国建材报》原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晨）

邮发代号 1-4

欢迎订阅

2009年

# 文摘报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创刊于1981

只需0.60元 读尽百报精华

一份报纸 全家老少皆分享

#### 主要栏目

时政要闻 社会广角 法制纵横 健康之友 文体时空  
学林漫步 环球博览 人间万象 人物长廊 文坛集萃

社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邮编：100062 电话：(010) 67078050  
全年100期 定价60元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或拨打当地邮局订阅电话：11185



# 中国的地震预警史

● 钱 钢

## 预警简史

汶川 8 级地震 ,震动世界。这场在无预警状况下发生的浩劫 ,引起公众质疑 :汶川地震为什么未能预报 ? 汶川地震为什么没有预防 ?

汶川地震 ,也使我心中充满疑云。汶川地震发生前 ,到底有没有与地震发生实况接近的短期预测或临震预测意见 ? 更重要的是 ,汶川地震前 ,地震界和政府到底曾有过什么样的沟通和互动 ? 这一地震 ,是否完全没有预警的可能 ?

1949 年以来中国大陆破坏性最大的 12 个地震和相关地震预报情形如下 :

时间	地点	震级(里氏)	死亡人数	有无预报
1950.8.15	西藏察隅	8.5	4000	无
1966.3.8 1966.3.22	河北邢台	先后发生 6.8、7.2	8064	无
1970.1.5	云南通海	7.7	15621	无
1973.2.6	四川炉霍	7.9	2199	无
1974.5.11	云南永善	7.1	1541	无
1975.2.4	辽宁海城	7.3	1382	有长期、中期、短期、临震预报
1976.5.29	云南龙陵	先后发生 7.3、7.4	98	有长期、中期、短期、临震预报
1976.7.28	河北唐山	先后发生 7.8、7.1	24.2 万	无短期、临震预报 ; 有长期、中期趋势判断
1976.8.16 1976.8.23	四川松潘、平武	先后发生 7.2、7.2	41	有长期、中期、短期、临震预报
1988.11.6	云南澜沧、耿马	7.6、7.2	743	无短期、临震预报 ; 有长期、中期预报
1996.2.3	云南丽江	7.0	309	无临震预报 ; 有长期、中期、短期预报
2008.5.12	四川汶川	8.0	估计 8 万	无短期、临震预报 ; 有中长期趋势判断

(注 :汶川地震伤亡人数以中国地震局公布的数字为准)

本文将论及科学范畴的“地震预测” ,但探讨的中心 ,是须由政府、科学界、社会三方合力达成

的“地震预警”问题。在最终能够使用确凿数据 ,准确判断汶川地震前设防决策的得失之前 ,笔者从灾害史和危机管理研究的角度 ,梳理与地震预警有关的史料与观点 ,作为深入探究的预备。

## 69 号文件 :国家级预警

1950 年察隅 8.5 级大地震发生在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 ,烈度高达 12 度 ,印度称为“阿萨姆邦地震”。因信息闭塞和科技水平落后 ,中国政府将它看作异国地震 ,还曾援助大米给印度。

1966 年 ,距北京不足 400 公里的河北省邢台发生强烈地震 ,8000 多人死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科学界提前解决外国从未解决的地震预报问题。地震预报工作在邢台仓促上马 ,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在震区调查前兆现象 ,产生朦胧的认识 ,并立刻应用。在 7.2 级地震发生后仅仅 4 天 ,竟然成功预报了一个 6 级强余震。

自 1966 年始 ,中国进入为期 10 年的强震活跃期。1970 年初 ,云南通海发生了 7.7 级大地震。这个完全没有预警的地震 ,导致 15000 多人死亡。地震工作加速发展 ,国家地震局开始筹组 (1971 年 8 月正式成立)。

中国政府当时对地震预报的成功抱有急切期待 ,计划三五年内在重点地区实现 5 级以上地震短期预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 ,填西江月词四首 ,献给全国地震工作会议 ,其中有“当作帝修看待 ,大家擦掌摩拳。集中力量将敌歼 ,敢向地球开战 !”的词句。

1972 年 ,第二次地震工作会议召开 ,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 ,以预防为主 ,专群结合 ,土洋结合 ,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形势逼人。1973 年 2 月 ,四川炉霍发生 7.9 级地震 ,2000 余人死亡 ;1974 年 5 月 ,云南永善发生 7.1

级地震,1500多人死亡。两个地震均无预报。与此同时,华北的东北的地震前兆观测,发现了令人警觉的迹象。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中国科学院根据会商意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下发第69号文件,向若干省市通报震情。

这实际上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国家层级的地震中期预警,预警地域包括了首都圈在内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当时中国地震预报起步不久,依据李四光的构造理论和地震活动现象,地震工作者判断华北及渤海地区正在孕育大震。对一二年内可能发生地震的估计,有一定准确性。虽有人提出“华北已积累七—八级地震的能量”,但并没有人预测到会接连发生海城、唐山两个强烈地震。这种情况下,文件依据多数人“明年内有可能发生5—6级地震”的分析,要求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提出“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决定加强地区间协作,成立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简称“京津唐张”)协作组与渤海地区协作组,共同监视近一二年内可能发生的大地震。

有人根据地震科学的“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标准,认为69号文件转述的地震预报意见,水平并不高,地域太宽,对震级的估计偏小。但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69号文件启动了有巨大减灾实效的预警。它下达后,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活跃起来,七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

较大范围的中期预警达到三个效果:各级政府开始应急准备;专业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队伍开始密切监视地震前兆信息;公众开始接受广泛的地震和防震知识宣传。海城地震的预报和预防,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

### 三种命运:海城、唐山、松潘

1974年底,渤海地区协作组工作范围内,出

现地下水、动物行为等多项宏观异常。辽宁省委决定,防震工作由省委直接指挥。1975年1月16日,震前20天,国家地震局提出了“辽东半岛地区,特别是辽宁南部,可能孕育着一次较大地震”的短期预报。

据海城地震当事人回忆,69号文件下达后,仅辽宁南部地区就建立了群众测报网点2600多个,参加测报的人员4000多人,放映地震知识电影600多场,发放地震知识小册子15万册。在海城地震发生前的三个月,辽宁全省有1800多起宏观异常现象被报告,为地震工作者的判断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

2月1日后,营口、海城两县交界处出现了类似邢台地震的小震密集现象。2月4日凌晨,省地震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提出明确的临震预报意见。2月4日上午10时30分,省政府向全省发了电话通播,发布了临震预报。工厂停工,集会取消,救援队待命。当时正是严冬,政府命令“人离屋,畜离圈”。当晚7时36分,强烈地震在海城发生。根据当地人口密度和邢台、通海、唐山三个地震的平均伤亡率推算,如不设防,地震将造成5万人以上死亡。而海城地震实际死亡1300多人。预警大大减轻了人员伤亡。

辽宁省委在1975年2月4日早晨的地震报警决定,是在民众已有一定思想准备,地震的前兆信息特别是前震活动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做出的,但仍不无冒险性质。成千上万百姓在寒冬被动员出住所,而大地震竟果然在数小时后“准时”到来。

海城式的地震预警,不是孤例。1976年5月29日,发生在云南龙陵的强震再度被成功预报和预警。

也就在龙陵地震被准确预报之时,地震界正在全力捕捉另两个可能的大震——即此后三个月之内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和松潘、平武大地震。

唐山地震预报和松潘、平武地震预报,两者有密切联系。69号文件启动中期预警后,包括唐山在内的华北地区有过广泛的防震宣传活动。但在地震发生前数月,地震工作者判断与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北京这个高度敏感的地点。1976年4月,内蒙古和林格尔、河北大城先后发生6.3级

地震,使关注华北震情的科学工作者陷入困惑,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形势的判断出现分歧。与此同时,四川震情紧张。国家地震局调集包括北京、河北在内的地震观测队伍入川,捕捉临震信息。这在客观上削弱了“京津唐渤张”的监测力量。而四川发布短期预报后出现的地震恐慌,又使首都圈的地震短临预报变得十分棘手。

唐山地震前,“唐山”这个地点确在地震工作者监视范围内,但他们监视的焦点是北京。1976年五六月,北京以东地区异常日趋明显。7月初,一系列异常引起北京市地震工作者警觉,做出了“从今年下半年起,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趋势背景正在加强”的判断,并向国家地震局告急。7月26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人员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未形成一致意见。在首都圈地区,能否公开发动群众防震,成为问题关键。会商时有人以四川已经出现的动荡为例,认为北京的预报要慎重。7月27日,国家地震局领导听取预报人员汇报,决定用一周时间做准备,圈出危险区,派队伍去“抓地震”。仅十几小时后,7.8级地震在唐山发生。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与唐山地震有关的监测、争论,乃至“告急”(包括唐山当地几位业余观测人员的预报),都没有产生正式的预报意见送达政府。唐山地震没有预警,只有距唐山市115公里的青龙县是例外。

在唐山地区的一次地震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青龙县领导听到一些地震工作者关于“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的预测意见,决定“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防震抗震的部署传达到所有群众。地震发生时,有准备的群众及时逃生,虽然有7300多间房屋倒塌,直接死于地震的却仅有1人。震后5小时,青龙县派出第一支医疗队赶赴唐山救援。

青龙的案例,使许多地震工作者痛心疾首:既然青龙可以在震情预测尚不明朗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并收到效果。那么,唐山地震前,在京、津、唐这个更大范围,地震工作者是否可能在犹疑焦虑之际及早向政府报告,而政府是否可能在难以决断之际以“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临震阶段的预警设防?

未能预警的唐山地震,结局极为惨烈。24万

余人死亡,16万余人重伤,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

唐山地震未能临震预报和预警造成的震惊世界的惨烈后果,遮蔽了北京、天津因中期预警而减轻损失的事实。从1974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对“京津唐渤张”的中期预警,对北京和天津这两座重要的大城市,是有极大减灾作用的。69号文件下达后,中央机关和北京、天津两市均建立了抗震防震指挥机构,除广泛宣传外,还进行了建筑物的普查、鉴定和加固,尤其是对电力、煤气、石油、铁路、交通、通信、供水和容易产生次生灾害的单位的建筑物做了重点加固。天津市在1975年2月和1976年5月两次部署应急准备,包括疏散方案、医疗救护准备、救灾物资储备等。天津是唐山地震的严重波及区,破坏烈度高达八度,如果没有中期预警,这座城市的人员伤亡和建筑物破坏将倍增。

当唐山地震发生时,已经发布预警的四川地震却迟迟未至,成都平原动荡加剧。

1976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区,特别是松潘、茂汶在1976年可能发生6级或6级以上地震的意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危险地区。4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会议,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险区和其它重点区工作。绵阳、阿坝、温江等地区先后召开地震工作会议,地震局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县、江油、大邑、邛崃等县协助当地加强群测群防工作。

6月14日,四川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2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两个月内,特别是在6月下旬可能发生6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但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

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6月22日和24日相继成立时,动荡随之出现。24日凌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动,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办公室接到各种各样的问询电话,从水库是否需要放水、电影院是否可以开映到医院的手术能否进行。



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6月下旬”。22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南北带中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有专家判断，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的映秀湾一带（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发震地点。而人口集中、工矿企业较多的灌县，是危险区中的危险点。消息迅速传到灌县。县政府决定，县城的5万人全部撤离。市民搭汽车、火车，或是在大雨中步行，撤向成都。26日，灌县已经成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没有发生。省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短期预报，预计发震时间推迟到“8月底前”。

7月，成都气氛稍缓和，月底唐山地震爆发，恐慌再起。人员外流、哄抢仓库、砍伐树木、干部带头撤离家属等事件连连出现，满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产。中共中央为此发电报指示四川稳定局面。8月初，地震部门发出临震预报。这个预报所圈定“13日、17日、22日前后”3个时间点。8月16日，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召开的20万人大会结束不久，松潘—平武7.2级地震发生。22日、23日再接连发生6.7级、7.2级两个强震。震后，地震部门又发出虚报，成都警报拉响，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8月27日，在政府已撤销警戒后，四川省安县秀水镇红光村发生61人集体投水41人死亡的奇异事件。两个月来，有线广播里频频发布的地震警报，使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风声鹤唳，许多自然现象和动物行为，都被当做异常报告，有的公社的业余观测员，也可以向全社发布地震预报。地下的“一步登天道”在这时散布“四川要沉为汪洋大海”，“毛主席讲的天翻地覆，就是要发生地震，要赶西山塞东海”，“大难临头了，善人要收一半，恶人要收完”，“只要进佛门，赶快做功，祖师爷就会派慈船来接你们到仙山，回到西天躲劫难”等传言，致使61人连续4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

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是在小震活动不明显的情况下做出的，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带来成功的预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预报那么“幸运”，短期、临震预报发出后不久地震就发生；松潘—平武地震对发震时间的判断几经调整，预警持续了较长时间。公开发动群众防震的有利之处，是宏观异常可能被迅速报告，地震短

临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弊端是社会要承受动荡压力。

## 地震科学 进步？止步？退步？

地震科学是地震预警的基础条件。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其间32年，中国地震科学界做了什么？地震预报研究有什么进展？遭遇了何种困难？

“1966—1976”、“1977—2007”，对中国地震预报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历史单元。前一个单元，为20世纪中国大陆的第四个“高潮幕”，恰与文革重迭。后一个单元，地震从平静期走向活跃期，正逢“改革开放”。

文革后，总结唐山的惨痛教训，人们一度把原因归于政治，认定“四人帮”及其党羽严重破坏干扰了监测预报。这以后“唐山地震未能做出短临预报，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还很差”，才成为改革开放初的官方表述。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高新技术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特别是空间对地观测技术和数字地震观测技术的发展，地震科学水平有了可与天文学中望远镜的使用和生物学中显微镜的使用相比拟的飞跃。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于2000年通过国家验收。总投资近23亿人民币的中国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汶川地震一个月前的2008年4月11日刚刚通过验收。

从唐山地震到汶川地震的32年中，中国地震工作的方针和地震预报体制也进行了调整。除了地震预报，地震部门加强了工程地震工作，承担了大批建设项目的工程地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文革十年期间发展起来的群测群防地震预报工作，受到大规模“整顿”。唐山地震后，全国有群众测报点3万余个，业余测报人员20万人。在1979年后群测群防队伍被认为“科学性不足”，开始整顿，到1980年底，群众测报点降到5000多个，业余测报人员锐减到2万人。文革期间，四川堪称群测群防大省，有业余测报人员1.4万人，文革后迭经整顿，到1985年已剩下不足千人。

“法制”，“科学”，是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前许

多事物成为“改革”的对象。然而,究竟应当如何评价 1966—1976 年的中国大陆地震预报?那一个地震“高潮幕”所累积的经验和教训,对此后的地震科学发展有何种意义?

唐山地震后的 30 余年中,中国地震预报陷入混沌的状态。它的某些方面在迅疾发展,某些方面裹足不前,某些方面在退步。

1988 年云南澜沧、耿马地震,被认为是新的地震活跃期到来的标志。1990 年,国家地震局强调“90 年代很可能是我国大陆强震多发的时期”。实际情形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地震活动,远未达到 1966—1976 年的强烈程度。影响较大的地震分别是:1996 年发生在云南丽江的 7 级地震(死亡 309 人),1996 年南黄海 6.1 级地震(上海有震感),和 1998 年张北 6.1 级地震(死亡 41 人)。这三个地震均无临震预报。

从 1996 年起,盖勒(Robert J.Geller)等人在《自然》、《科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认为地震不能预报。随即有人针锋相对发表反驳文章,在国际地震学界爆发激烈争论。许多人认为,即使能对地震做出正确的中长期预测,短期和临震预报还是不可能的。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唐山地震后的 30 年来,中国地震工作者仍做出了 20 余次较为成功的短、临预报。这本是地震界的成就,却基本上没有被大众传媒报道——有关地震预报的任何信息,无论正面负面,似乎都受到控制。

笔者核实,这些震例包括:北京小汤山 1990 年 9 月 22 日 4 级地震;青海共和 1994 年 2 月 16 日 5.8 级地震;云南孟连中缅边境 1995 年 7 月 12 日 7.3 级地震;四川甘孜白玉—巴塘 1996 年 12 月 21 日 5.5 级地震;新疆伽师 1997 年 4 月 6 日 6.3 级、6.4 级地震;云南宁蒗 1998 年 10 月 2 日到 11 月 19 日 4 次 5 级以上(最大 6.2 级)地震;辽宁岫岩—海城 1999 年 11 月 29 日 5.6 级地震;四川绵竹 1999 年 11 月 30 日 5 级地震(震中在汉旺镇);云南大姚 2003 年 7 月 21 日 6.2 级地震、10 月 16 日 6.1 级地震;甘肃民乐 2003 年 10 月 25 日 6.1 级地震;最近的事例,是 2007 年 6 月 3 日云南宁洱 6.4 级地震。其中小汤山地震,在地震界亦称“亚运会地震”,震中距亚运村仅 10 公里,发生在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前数

小时,对它的预报,意义非同小可。前国家地震局局长方樟顺回忆:

我记得 9 月 18 日下午,在门头沟开会,当时有十几位同志发言,他们讲得都非常朴实,比如这个地段目前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与这个地区历史上一些中强震的关系,据此提出了近期的判断意见。所以回来以后我们报告了国务院,而且对地震可能产生的影响都讲得比较客观。若发生 4 到 5 级,不会造成什么伤亡、破坏等,要求亚运会保持冷静,否则人踩人就可能带来伤亡,这样,组委会基本上做到了心中有数。结果,开幕式当天上午 11 时 02 分就发生了一个 4 级左右的地震,恰好又离亚运村那么近。

这就是中国地震科学的现状,高新技术的运用,尚未显示奇效。唐山地震 32 年后,地震预报仍在摸索前行。有时,地震的踪影被发现并捕获。更多的时候,预报者和大地震擦肩而过。包括在 20 世纪认定的中国主要强震危险区的概念、发现的强震高潮幕起落规律,似乎都要被改写。2001 年 11 月 14 日,在人们认为的强震平静期内,在传统认定的地震高烈度区外,昆仑山口西发生了 8.1 级强烈地震。科学家们正在讨论“21 世纪,在我国是否会发生死伤 10 万人以上的地震”,汶川大地震降临。

## 政府:有效预警的困境与可能

中国的各级政府面对两难抉择:地震科学研究困难重重,却无法放弃;现有地震预测还只是概率性预测,却必须在许多时刻做出有效预警。20 世纪,美国 7 级以上地震总共只有 20 次,总死亡人数 1380 人,而中国在 20 世纪直接死于地震的人数高达 50 万人以上。中国别无选择。目前世界上除了日本仅对东海地区继续开展负有减灾责任的预报,只有中国,在科学研究尚未过关的情况下,承担地震预报任务。

如果我们把地震的术语“漏报”、“虚报”套用到预警,称为“漏警”和“虚警”,那么可以大致概括:唐山地震后的 10 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 1986 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



汶川地震现场惨状

1976—1982年,广东、贵州、山东、江苏、四川先后发生多起地震虚报。地震预报开始被越来越严格地管理和控制。在“把地震预报纳入法制轨道”的理念下,从1977年颁布《国家地震局关于发布地震预报的暂行规定》,1988年颁布《发布地震预报的规定》,到1998年颁布《地震预报管理条例》,对地震预报做了一系列约束。1988年的规定甚至要求“涉及地震短期和临震预报水平的宣传报导、写实的文艺创作,在发表前应征得国家或省级地震部门的同意。”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地震活动却相对平静。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本地的稳定,对任何可能“影响投资环境”的负面信息都严加控制。唐山地震后对地震的“过敏”,变成对地震谣言、地震误传和一切“不安定因素”的“过敏”。如海城地震和松潘地震前的大规模发动群众公开防震,在这一时期已然绝迹。一些成功的预警,都可以称之为“秘密预警”。

1999年,一个类似海城地震预报的事件,在同一地区重演。在有正确中长期预报的基础上,辽宁省地震局在这年11月27日向省政府发出了海城—岫岩将发生5.5—6级地震的临震预报。但当时他们仍无完全的把握,提交给省长办公会议的分析意见,一是“临震”,二是“进一步看变化,也可能发展成一般的震群活动”。辽宁省地震局前局长徐心同写道:

我们这样的不确定的分析预测意见,提交到省政府常务扩大会上,实际上是给省政府的决策者们出了个难题,在看到省长们决策时为难的样子,而我们又无能为力,处境真是十分尴尬。政府的决策者们面对的是把我们的不确定的预测意见变成是否发布预报、采取预防措施的确定性行为,这是典型的风险决策。

辽宁省政府决定发布临震预报,但采取了周密的实施方案:按内紧外松原则,各级领导和关键部门做好应急准备,不惊动更大的社会面;在省地震局圈定的最危险的两个镇,动员居民和师生撤离危旧的住房和校舍,通知井下人员停止作业。

政府的预报发出不到两天,29日中午,5.6级地震在岫岩—海城交界处发生。

地震以及其它重大灾难的预警,政府必须有决策。决策不能闭目塞听而作,但也不能期待握有充分信息后才出。获得专业部门的概率性预报后,政府要做的,是对涉及社会、经济甚至国防的诸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对“警兆”和“警度”做出判断,发出不同级别的预警讯号。政府的判断,依然是概率性判断。事实上,无论恐怖袭击、化学灾难、疫情爆发,还是可视性已经很强的洪汛、台风,政府即使尽最大努力预先获取准确信息,决策的盲区仍将无可避免地存在。

显然,当前各级政府的灾害预警能力很低。尤为奇缺的,是先进的危机管理思想。

地震界把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震级”称为“三要素”,在预测预报中全力追求“三要素”的精确性。但“三要素”的精确性,并不是政府预警的先决条件。例如,就所释放的能量而言,一个8级地震是7.8级地震的2—3倍,是一个6级地震的900倍,差别巨大。但是政府预警的最基本举措,却未必一定要有这种精确的“级差”。当政府对一个可能震级为6级、破坏烈度为7度的地震进行预警时,就应该撤离、疏散人群。这个举措完全覆盖了震级和烈度更高的地震。

人们希望政府的预警能做到如海城地震的“大震大防”(或判断准确的“无震无防”),不再重



蹈唐山和汶川一类的“大震无防”。但现有科学水平和政府预警能力,使“大灾小防”和“小灾大防”不可避免。

文革时期数次成功的地震预警,除了地震科学工作者的贡献,“备战备荒”年代广泛发动群众捕捉异常信息的特有方式、政府“不计后果”的拍板,都是重要的原因。那时的地震工作和战备、人防实行统一领导。而在新历史时期,海城预警模式、青龙预警模式,或者更宽泛地说“69号文件预警模式”,已难以复制。从唐山到汶川,32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演变。面对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全新的信息流通方式,政府的危机管理,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困难。

## 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22时到24时将发生2到6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1980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8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两个市十余个县,据调查,全烟台地区700万人口,相信的人达20%,半信半疑者达50%,本地经济和民众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

另一起发生在广东的地震谣言,起源于1980年香港《明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称,“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旷大洞,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次年,广东海丰地区发生小地震群活动,当地民众的海外亲属联想起报纸信息,纷纷致信、致电、汇款。民众大惊。3月29日,汕尾渔民吹响螺号,次日下午,近200条渔船载着6000

多男女老幼,逃离家乡。其中有106条,载着4000多人到达香港,被香港当局拦截。

历史的吊诡在于,文革时期信息封闭,但在那一时期,地震信息却曾有过公开的传播;文革结束至今,社会逐渐开放,地震信息却被牢牢控制,防震知识的普及也大大减少。公众对地震的反应,仍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大陆的“地震恐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汶川地震后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1995年9月20日,山东苍山县发生5.2级地震。震害不大,却有许多人惊慌外逃,因摔倒挤压、跳楼造成伤残,其中99%是中小學生。原因是大多数人缺乏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一事实显然不曾传播到四川)。2002年12月14日甘肃玉门5.9级地震,间接死亡的两人,亦因惊恐。有350人,在惊慌逃离住宅时拥挤压伤或摔伤。更严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严寒中滞留户外,8000多人冻伤患病。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而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与其责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信息的过度控制,独立媒体缺位,使单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减。因为社会体制的僵硬,民间社会不发育,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有弹性的中间层,民间缺乏自我调适机制,无法参与灾害预警。政府与民间,表现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立状态。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而政府则因此越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地震预警的现状是,地震预报水平虽领先各国,却仍处于“荆天棘地”的摸索前行时期;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应对灾害的社会素质,均亟待提高。中国地震预警的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清醒地反思汶川地震未能预警的严重教训,共同面对巨灾的威胁。

(责任编辑 吴思)

# 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与前景

## ● 思源

小学识字课本告诉我们,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但是,最新信息告诉我们,在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重重侵袭之下,我们这960万平方公里遍体鳞伤,完好的肌肤所剩无几,生态环境脆弱区已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如果不奋起救治,国将不国!

## 一、灾难就在前头

我国的生态环境灾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 1. 沙漠可能吞没中国

土地沙化是我国特别是西北地区当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的沙尘暴、不断扩展的沙化土地使得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建国以来,我国沙漠面积已由15亿亩扩大到25亿亩,全国已有66.7万公顷耕地、235万公顷草地和639万公顷林地变成流沙。荒漠化年均扩展速率达4%以上。由于风沙的影响,许多地方人畜已失去生存条件,农牧民被迫迁往他乡,成为“生态难民”。

现在我国从西北、华北北部到东北平原的西部,分布着沙漠、戈壁和荒漠化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已是国土面积的1/4。而且土地沙漠化面积还在继续扩大,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每年扩大1560平方公里,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每年扩大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末每年扩大3460平方公里。绵延万里的沙漠正在向中华腹地进军,最近的沙漠距天安门仅70公里,以致一些人发出了迁都的呼声。

近几年来,我国对荒漠土地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总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每年新增的荒漠化面积相当于丢失一个中等县,几乎每分钟就损失4.5亩寸金之地,许多生态性灾难频繁发生。过去几十年里,国家对沙漠化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研究显示,仅有约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治理,12%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局部治理,整体恶化”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最近在对40年来中国681个气象站气象实测资料综合分析后,中国科学家发现,青藏高原已成为新的风沙策源地。青藏高原荒漠化土地已达到50多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总面积的二成,比上世纪70年代净增近4万平方公里,增长率超过8%。青海湖已在日渐浓缩,趋向干涸。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整个青海湖干涸,西北、华北、东北地区 and 整个青藏高原乃至大半个中国全变成沙漠就指日可待了(2006年6月《科技中国》第6期)。可以说“沙漠正在包围中国”决不是危言耸听!

### 2. 水资源缺乏且严重污染

虽然中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3%。中国面临着水资源的严重缺乏,特别是北方地区,其农业占全国的66%,而水资源供给的80%却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

中国的粮食生产严重依赖水资源,大约80%的粮食产自水浇地(这一数据在美国是20%,在印度则是60%)。从1982年到2000年,黄河每年有2/3的时间干涸。

与20世纪50年代初相比,全国湖泊面积减少15%,长江中下游的湖

泊数量减少一半以上,天然湿地面积减少 26%。全国每年平均消失 20 个天然湖泊。建国以来,已有 1000 个湖泊干涸。

中国北方的蓄水层被消耗的速度要快于它能得到补给的速度。海河流域的水位线下降了 50 至 90 米,许多城市,如天津和济南发生了严重的地表沉降。

中国水资源使用效率很低。有专家估计中国用来灌溉的水资源的 60% 由于种种原因而浪费掉了。

中国也长期受到洪水的困扰。2003 年 7 月的洪水影响了中国南方、东部和中部的一亿人口。对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森林的过度采伐加剧了洪水的发生。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这些流域森林覆盖率减少了 30%。

据《2006 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 年全国水资源总量 25567 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 8.9%; 全年总用水量 5716 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 1.5%。这一增一减之中,不难看出我国水资源的严重危机。

据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2006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近 14 万公里河流的水质评价:近 40% 的河水受到了严重污染,全国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 41%。在被统计的我国 131 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 36 条,重度污染的有 21 条,中度污染的有 38 条。污染率达到总水系面积的 87%。

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河流,但如今仍是受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淮河在评价的 2000 公里河段中,78.7% 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标准,79.7% 的河段不符合渔业用水标准,32% 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用水标准。10 年前,淮河还生长着 60 多种鱼类资源,如今这些鱼类几乎绝迹。当地有句民谣:“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虾绝代,九十年代身心受害。”淮河流域许多地区癌发病率

比正常地区高出十几倍到上百倍,一些村庄 2/3 的人肝肿大,让人闻之莫不心酸。

全国地下水资源与环境调查评价显示,我国地下淡水可开采资源为每年 3530 亿立方米,但却有一半地区的浅层地下水遭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城市最为严重。

海洋的污染状况也不容乐观。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调查结果表明,珠江口海域有 95% 的海水被重度污染。曾经是我国富饶“海上粮仓”的东海,却在每年 4 月到 6 月赤潮频发。专家指出,全国的污染通过河流向沿海集中的结果,是中国水污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已被无情撕破。

水污染直接危害的是百姓饮水安全。国家水利部披露出一组令人惊心的数字:目前全国有 3.2 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其中约 6300 多万人饮用高氟水,200 万人饮用高砷水,3800 多万人饮用苦咸水,1.9 亿人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

据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国情研究报告称,我国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仅占 10%,基本符合标准的占 20%,不符合饮用水标准的达 70%。以地下水为饮水的城市,90% 以上的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且污染逐年加重。

### 3. 大气污染会杀人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通行的衡量空气污染的标准,是测量每立方米空气中所含的悬浮微细粒子。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 20 微克。中国只有 1% 的城市居民生活在 40 微克的标准以下,有 58% 的城市居民



水灾



生活在 100 微克标准以上的空气中。

近年来“灰霾”这个词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雾主要是由水滴组成的,而霾主要是由干粒子组成的。现在雾和霾已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灰霾天气。仅 2007 年 12 月,广州的灰霾天就达到 22 天。2006 年,深圳灰霾天气是 164 天,2007 年已达 231 天。深圳灰霾天气不是单独的,珠三角城市都受到了这种区域性灰霾的影响。

工业发展超过环境负荷,珠三角从机械污染、化学污染过渡到多种污染并存局面。世界发达国家完成这一污染过程花了 200 年,我们只花了 30 年。

城市密集成群,减少了以前存在于城乡结合部的空气污染缓冲区,一方面造成污染物不易扩散,另一方面也把很多城市连成污染的整体。

灰霾的形成会对各种传染疾病的流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大气环境中,人的机体抵抗力必将大为减弱。

我们人每天需要呼吸 15 立方米空气,城市里的人就相当于吸尘器,每天要过滤 15 立方米空气,这样持续下去,细粒子污染对身体的危害要比切尔诺贝利核辐射严重。影响最大的是人类生理年龄的两端——孩子和老人。

大气污染对北京市民的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造成的死亡率影响,分别为每天增加 41 和 59 人,过早死亡的经济损失分别为 2550 万元和 3691 万元。大气污染引起的居民健康经济损失不容忽视。2004 年,中国城市由于空气污染共造成 35 万多人死亡,约 64 万人因呼吸和循环系统疾病住院,25.6 万人新发慢性支气管炎,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 1527.4 亿元。国家环保专家进一步证实,“近年的数据与 2004 年大体相似”。

1952 年 12 月伦敦“雾都劫难”,有 4700 多人因呼吸道病而死亡,灾后几个月,又有 8000 多人死于非命。当时英国雾中烟尘颗粒物浓度是每立方米 4 毫克。2007 年 12 月 28 日我国北方某特大城市个别测站的小时峰值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立方米 1 毫克。伦敦雾中的污染物以燃煤产生的硫化物为主,我国城市空气中的污染物成分更复杂了,污染状况甚至还要严重。我们要警惕伦

敦雾灾在中国重演,不能等到出现事故以后再被动地应付。(2008 年 4 月 3 日《南方周末》)。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过 18 个月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于 2007 年 7 月 17 日公布了关于中国环境政策的报告书《OECD 中国环境绩效评估》,并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订了备忘录。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在环保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中国的大气和水污染状况仍然十分严重。

经合组织的报告预计,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将导致 2000 万人患上呼吸系统疾病。到 2020 年之前,污染会导致中国“60 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 2000 万例呼吸系统疾病、550 万例慢性支气管炎和健康受损病例”。这可能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 13%。

报告认为,虽然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环境标准,常常更接近某些最贫穷的国家。

我国的生态环境危机之深重,可以概括为“经过多年累积,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世界上范围最广、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逼近环境安全的底线。”(2008 年 3 月《绿叶》月刊第 3 期第 71 页)即:灾难就在前头。

环境问题在中国已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随着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环境问题正在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可能演化为有损社会和谐的社会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环境污染在中国造成的危害过大,很可能全面颠覆中国多年改革获得的小康成果,而成为一个具有爆炸性的政治问题。

## 二、软约束难治硬污染

自有环境污染以来就有环境保护工作,环保工作也并非没有一点成就,但生态环境形势整体上却在恶化,每况愈下。生态保护的速度与生态破坏的速度之比,犹如龟兔赛跑。原因何在?说透了,就是我们抓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手很软,谓之“软约束”,而人家搞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那一手却很硬。软约束碰上了硬污染,哪有不败之理?

“软约束”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

### 1. 行政处罚上限太低

当前我国环保立法存在的首要问题,是法律上设定的行政处罚上限太低,致使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执法成本高。

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环境违法的平均罚款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0%。一个每天排放5000—6000吨废水的中小型企业,按照每吨水处理费用2元的标准计算,一年就需花费污水处理费300多万元,而有的大型企业治污设施每天运行费用就在10万元左右,一年则高达3000多万元。对污染大户来说,闲置污染防治设施一天就可以节省几万甚至十多万元。但是,按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对于擅自拆除、闲置水污染防治设施,排放污水超标的,最高只能罚款10万元,远不如一天偷排所节省的运行费用。

据报道,前不久广州的一次强制查封排污企业的过程遭到违法者的抵触,一家工厂负责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宁可继续生产也不愿治污,大不了继续受罚,反正环保罚款的钱远远不如停业整顿的损失和环保设备的购置维护费多。”

2007年吉林石化发生爆炸案后,国家环保总局对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处以100万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有要求公司承担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责任。而国家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人力对松花江水质实施实时监测、消除污染对流域的影响。

### 2. 一事不再罚原则造成违法漏洞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一事不再罚原则”。但该法却没有规定什么是“一个违法行为”,即什么是“一事”。是违法一天构成一个违法行为,还是违法十天、一个月或者一年构成一个违法行为?因此,在环境行政执法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环保部门发现企业违法,依法给予了责令改正和罚款处罚,但几天后或者一个月后再去检查,该企业丝毫未改,照样违法。如果环保部门再给予处罚,该企业就认为环保部门违反了一事不再罚款的原则,诉讼到法院,法院也往往支持企业。这样,环保部门对企业处罚一次以后,就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处罚。

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很少对罚款的次数及上限作出明确规定,而是依据污染环境所造成的实际经济和社会损失,测算出具体的处罚额度,此举意在增加违法者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从而提高威慑力,迫使公民和企业严格遵守法律。

比如,美国根据《综合犯罪控制法》起草的《判决指南》规定,造成水体污染、大气污染、有毒废物处置等7个方面的环境犯罪的等级及其刑事责任,可以处以每天2.5万美元(后又改为2.75万美元)的罚金,这种罚金根据违法天数而定,并没有最高限制。除了罚款还有更严厉的监禁处罚,最高是违法一天判一年监禁,对再犯者还将加重处罚。这一规定在现实中得到严格执行:美国最大的煤炭电力公司——美国电力公司,由于发电燃烧煤炭排放的废气长期以来制造环境污染,被告上法庭,被判支付高达46亿美元罚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近七成。(2007年12期《上海经济》第44页)

面对如此天文数字般的违法成本,哪怕是实力强大无比的大企业,也都会胆战心惊,这就是巨额惩罚的威慑力量。

### 3. 限改令变成“保护令”

据《新京报》2007年6月26日报道:长江荆州段多家造纸企业长期违法将生产废水直排长江,严重威胁下游取水安全。今年3月,荆州市要求这些企业限期实现达标排放,否则将被强制关停。然而,“限改令”发出后,这些企业利用“限改令”大限之前的时间抓紧生产公开排污。一名纸厂老板直言,出台“限改令”其实还不错,起码这一两年生产排污没人干扰。

其实,地方政府对一些严重污染企业,应敢于实施“立刻死亡”。即使限期治理,给出的时间也应具可操作性,否则企业在期限内无法完成整改,必然以“末世心态”恶意排污。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检察局长陆新元也表示,目前一些地区对污染事件处理过轻、过慢,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瓶颈。

4. 一些地方政府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规定执法部门不准检查

确立“挂牌保护”制度,本是地方政府出于治理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

行政保护。但地方政府的“好心”并没有被企业“领情”，一些企业想的却是借这块“金”字招牌，从事违法活动，赚取非法利润。地方政府的“挂牌保护”实际上成了企业违法的“保护伞”。

河南新安县洛新经济工业开发区的 100 多家企业中绝大多数没有污染防治设施，园区生产生活废水多年来直接排入黄河支流涧河。据国家环保总局和监察部调查，新安县政府 2002 年以来多次出台有关政策，明确规定对工业园区实行封闭管理，进区企业实行“挂牌保护”，拒绝环保部门的监管。

这种行政手段将法律放在一个“虚置”的位置上，严重削弱了国家法制的作用。

#### 5. 司法部门阻挠司法服务

2004 年 2 月 11 日到 3 月 2 日，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化公司)违规技改，设备出现故障，导致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进入沱江。废水先污染了沱江下游的资阳、简阳、内江等地后流入长江，造成近百万群众饮用水暂停供应、工厂暂时停产、电站水库被迫放水、农作物大量受损、鱼类大量死亡的严重后果。据核查认定，沱江污染直接经济损失为 2.19 亿元人民币，生态环境恢复需 5 年时间。但是，长江流域水污染事故民事责任追究普遍不到位，流域生态损失更是少有人提及。为什么呢？我们从沱江水污染事故处理中可以发现问题的症结。

据 2004 年 9 月 24 日《天府早报》报道，沱江污染事故发生后，资阳市雁江区司法局下发了《关于办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区司发[2004]19 号)。通知要求：区内“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不应受理涉及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索赔一方的委托代理，推辞不了的委托代理，只能代理其非诉讼活动，不准收取代理费。”这一官方文件公然非法取消了司法服务机构的正常工作，间接侵犯了受害者的环境诉讼权，保护污染制造者逃避经济赔偿责任，引起了四川省社会各界和人大代表的纷纷质疑。

### 三、制度变革救河山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低效率再一次证明了，只有制度变革，才能救我河山。在此，我提出 4 点

意见：

#### 1. 决不允许吃污染饭

从国家环保总局到地方各级环保局，作为政府部门，理应“吃财政饭”，由财政拨给经费。但是现在的离奇景象是，环保部门大部分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要靠“自筹”。2007 年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报道：据安徽省灵璧县环保局纪检组长刘团结介绍，现在环保局有干部职工 94 人，其中公务员编制的有 8 人，他们的工资由县财政全额发放，财政差额拨款的有 13 人，他们的工资县财政发 70%，另外 30% 由环保局自己解决；剩下的 73 人都在环境监察大队，他们的工资全部要靠环保局自己解决。

环保局自己如何解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环保局就靠征收排污费了。灵璧县环保局的有关人员介绍，环保局去年收上来的排污费为 99 万元，这些钱 25% 上缴省、中央财政，40% 由市、县调控统一安排使用，剩下 35% 归县环保局支配，环保局基本上把这 35% 的排污费用于发工资。于是乎，环境监察大队的很多人整天在外面收取排污费，以便给自己发工资。征收排污费，或曰“创收”，成了他们最主要的工作。

接下来，问题就麻烦了。如果各排污单位经过整改，污水都作了有效处理，不再排污了，那环保局就收不到“排污费”，就没有钱给大部分干部职工发工资。为了保护“财源”，就只好保留一部分污染源，以便于“污染饭”可以持续地吃下去。只有污染源长盛不衰，环保局才能香火不断，所谓“治污”就无非是演戏而已，纳税人的钱则在这里消耗以尽。

不过也有人说，环保部门的人员工资和办公经费即使 100% 到位，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也不能杜绝用环保监控权作钱权交易以及滥用职权。如华北某省调查发现，有 56 个市、县环保部门将国拨污染治理资金 3457 万元挪用于本部门的经费支出，占财政拨款环保部门污染治理资金总额的 50%。

问题看清楚了，要解决并不难。关键在于这里需要触动财政制度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及选举制度的改革。

#### 2. 公众参与要制度化

公众是环境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世界环保事



业的最初推动就来自于公众。我国环境保护多年来效率不高,后果严重,与公众参与权利得不到保障有关。

报载位于贵州省铜仁市龙田村的泰源铁合金厂污染严重,为了降低成本,生产时经常不开治污设备,任由污染物向周围大量排放。村民多次抗议无果而断水源,迫使该厂停产。结果是反污染的四位英勇村民杨光均、杨光华、杨国平、罗来富居然被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并于2006年8月1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北京青年报2007年6月10日)。类似案件不时见诸报端。

但是,历史毕竟在进步。厦门市围绕“PX项目”建设的风波,就是一例。

腾龙芒炔(厦门)有限公司拟在厦门市海沧区兴建“对二甲苯”石化项目(简称PX项目)。因为该项目所处位置敏感以及存在极高的污染危险性,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厦门市民的极力反对。成千上万市民为此上街“散步”,表达心声。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正式宣布缓建“PX项目”。此后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顺从民意,决定该项目停止在厦门市海沧区兴建,迁至漳州古雷半岛兴建。(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08]》第13页)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在其宪法中明文规定了保护公民的健康权。而健康权离不开环境权。环境权是公民要求其所置环境具有基本生态功能的权利。

单个公民以散兵游勇的方式行使环境权、参与环保工作,自然势单力薄。如果形成合法的民间团体(NGO)开展工作,效果就大不一样。国务院2006年4月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也号召“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

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近年来逐渐走上社会前台,日趋活跃。中国NGO的数量正在急剧上升,社会团体由1978年以前的6000多个猛增到2001年底的13万个,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环保组织。民间环保组织的规模日益庞大,其组织性、科学性也不断完善。中国民间环保意识的觉醒,正是从零星的个人自发举动,演变为集体性的家园



旱灾

维护行为。而公益诉讼等一系列法规的逐步健全,也使民间的环保意识与行为,逐步获得法律支撑,形成法律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 3. 信息公开化要落实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环境信息要公开化。其实这也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普遍原则。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当然包括知情权。宪法同一条还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公民不知情,如何管理?不知情,如何评价委托管理者即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水平?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曾于1989年5月5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郑重提出关于制定一部信息公开法的建议:要求各级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将信息公开的范围对外公布,并检查执行情况;对于违反《信息公开法》的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应像违反《保密法》一样给予必要的处分。这样才能改变公开化措施

不规范、不稳定的状况,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制度。

我这条建议当时已通过正规渠道上报中共中央,不过回声则在遥遥的十来年之后。1998年国务院开始酝酿制定信息公开条例,2003年的“非典”又为这项立法加了一把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终于在2007年4月公布,并定于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在环保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立足于“家丑不可外扬”,本能地捂盖子,还美其名曰“污染的信息不能随便传播,以免公众恐慌”。以至于2007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地方政府都没有向社会公布真相。后来在记者的追问之下,一位堂堂的省长居然自我解嘲说是“善意的谎言”。国家的主人可不希望公仆来这种“善意”!

促使政府切实执行信息公开条例的真正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每个公民、NGO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参与,包括对违背信息公开条例的机构和官员进行揭发、批评和追究。姑息,就会惯坏了我们的公仆!

#### 4. 加快林业私有化,提高森林覆盖率

众所周知,森林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长城。森林可以涵养水土、调节气候并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减缓全球变暖。因此,积极植树造林、切实保护森林、努力提高森林覆盖率,并不仅仅关系林业工作,而且关系人类生态环境的全局。

我国森林覆盖率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幅下降、损失惊人、后果惨重。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集体林业产权归属不清、权利责任不明、利益分配失调。在那种情况下,广大林农的思想是“林不归我,我不爱林;利不连我,我不管林”,林农没有经营林业的主体地位和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法分子对于形同“无主”的集体山林进行乱砍滥伐倒是肆无忌惮。历史已经沉痛地宣告:这种荒唐的“集体所有、人人没有”的林业体制,使中国林业生产力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

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森林面积只剩下15.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16.55%,仅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27%的61.3%,全国人均森林面积

0.128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0.6公顷的21.3%。

全国各地的林农们有着共同的改革需求:希望产权到手,盼望林地回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数浙江分田最快、最坚决、最彻底;同时,浙江还坚决、彻底地分山林。浙江分山林,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一步到位,老爷子置下的林产,子孙可以继承。如此情势,谁家还上山去乱砍滥伐——森林覆盖率咋不会年年新增呢?上世纪80年代分山林前,浙江森林覆盖率排国内倒数几位,短短20多年时间浙江全省披绿,中国统计信息网统计显示2000年浙江省的森林覆盖率达54.6%,2006年高达60.5%,2008年已达62.9%,一切能种树的地方皆为绿色覆盖。

实践再次证明:必须让耕者有其山,还山于民、还林于民。惟有实行林权改革,林业才有希望。

以浙江为榜样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江西也拉开了帷幕。2004年9月试点,2005年4月全省全面铺开。2006年6月,全省转入配套改革阶段。截至2006年底,全省林地总面积的85%以上已通过改革明晰产权,其中分山到户率达到80%以上。以前全家年收入不过几千元的林农,而今收入翻了几番,农民造林的热情空前高涨。山区农民正在实现“由绿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林业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森林覆盖率达60.05%,由于产权明晰,人心稳定,林区秩序井然,全省没有出现一起群体性乱砍滥伐事件。

可喜的是,中国各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试点,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同。

200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在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依法明晰产权、放活经营、规范流转、减轻税费,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中国林业私有化改革的成功开展,不仅救了25亿亩林地,救了数亿林农,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能挽救整个中国的生态环境。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李晨)

#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难历程

● 李维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先后参与《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历时10多年。在这期间,我国史学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方面取得很多成就。现在把我参与上述编辑工作时,亲历、亲闻的几件事写出来,求教于有关学者和读者,也作为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

## 中美合作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1979年,著名学者姜椿芳,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就向中央提出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百科全书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近代西方国家早在200多年前就开始出版百科全书,但中国一直没有出版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潮涌动,姜椿芳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决定首先翻译出版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文版。消息一传出,首先在理论界引起不少议论:美帝国主义一直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的观点我们能接受吗?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条目怎么处理?中美双方能达成一致吗?种种议论通过胡乔木反映到小平那里,但小平不为所动,决心不变。根据他的指示,1979年1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代表,就合作出版开始进行会谈。邓小平先后接见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总裁斯旺森。他说:“全世界都知道《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内具有权威性的地位。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从中得到教益,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部百科全书的第一版1768年首创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以后各版在伦敦及剑桥出版。20世纪初,该书版权转让给美国。1974年前已出版了14版。从1960年开始,该公司对原书体例进行革新,历时15年,组织4000多名各国专家撰写,1974年编成面目一新的第15版。1980年8月12日,我国与美方达成协议,规定美方向中方提供第15版的最新修订稿;中方承担翻译(对原文只译不改)、出版等任务,并负责撰写纯属中国的条目;成立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负责编审工作并协商解决编译中出现的问题。

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主席是刘尊棋,他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1939年曾以中央社记者的身份,和《扫荡报》、《新民报》记者一起在延安访问过毛泽东。1949年后曾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又多年遭受牢狱之苦,也是三中全会后才出狱的。两位中方委员,一位曾是全国著名“右派”钱伟长,另一位是翻译家周有光。

协议规定中方重新撰写所谓纯属中国的条目,主要是指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与我们党史、军史有关的条目。这些条目多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撰写,属于军队方面的,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事科学院撰写。当时我在总政的编研室工作,所以参与了这项工作。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按照中美双方都能接受的要求,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如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条目中不使用“伟大”这个词;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人物条目的惯例,每个人都写婚姻和子女状况,《邓小平》条目中写了“和卓琳



结婚后生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争论并不大,难题是涉及对某些人物的评价。

## 纠正对项英的片面评价

根据双方的协定,对于原书中已有的条目,只增不减,例如十大元帅,原书中收得不全,我们补齐了。《项英》是原有的条目,需要重新撰写。军事科学院的同志先写了一个初稿。一共七八百字,光项英的错误就写了300字。因为过去有规定,凡是有中央文件的,就按中央文件的口径写,起草的同志是根据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写的。这时(1982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汇编,刚刚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集了皖南事变前后的文电共201篇,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关键的电报读了好几遍。我感到:1941年1月15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没有经过深入调查仓促作出的。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夜,双方激战到14日,叶挺军长下山谈判时被扣。新四军军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12日就中断了,15日这天中央与皖南事变中所有的领导人都还没有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显然过于匆忙。

这个决定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皖南事变中处置失当,对新四军遭受的损失负有责任,但从一系列的电报看,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缺乏警惕。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取得反击韩德勤的黄桥战役胜利后,冯玉祥在重庆通过周恩来提醒我们注意蒋介石的反共阴谋。194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一天,在致叶挺、项英的电报中也说:“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祝同)韩(德勤)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

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940年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1940年11月21日,中央给叶挺、项英的指示还说:“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这就是说,我新四军北移是有条件的,你不停止江北进攻,不给开拔费就不走。但国民党不肯答应这些条件,双方僵持不下。如果拖一个月是12月21日,拖两个月就是1941年1月21日了。1940年12月25日,就是在新四军军部北移前一周,毛泽东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虽然第二天(12月26日),毛泽东等接获周恩来从重庆的来电,得知蒋介石的态度后,中央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严令北移的电报,项英接电后作出不顾一切按中央指示立即北移的决定,但为时已晚。因此,把迟迟不北移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项、袁罗织了一大堆罪名,例如“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等等,把项英说得一无是处,把这两位革命家的功绩一笔抹煞了。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最后一条写的是:“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但是在党的七大直至以后的历次党代表大会上,对项、袁错误都没有进行议处。那么,当年那个决定还算不算数呢?

以上这几个问题,起草《项英》条目的同志,也认为很值得研究。但是这些观点当时无法得到多数同志赞同,更难得到某些权威的认可。因此,1982年春天在一次讨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问题的会议上,我向主持会议的胡绳同志提

出了这个问题。我记得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姜椿芳、刘尊棋等 20 多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军队方面有军事科学院的胡兰芝、蒋凤波和我三人参加。我原以为《项英》条目如何写的问题不容易解决的，但出乎我预料，经验丰富的胡绳同志，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说：“我们编的不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吗？那就简明一点吧，后面这一段就不要写了。”就是把关于项英的错误完全删去。我很乐意采纳这一方案，与会其他同志也没有反对的意见，这种改法就算通过了。

但是项英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久，我们接着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项英以前在党内、军内一直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在刘少奇之前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朱德之前担任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毛泽东之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少不了《项英》的条目。这回不是“简明”的了，到底应该怎样写项英呢？按当时的分工，总政治部干部部的编研室负责编写《人民解放军人物》条目，我是这个分支学科的副主编，南京军区编研室负责编写《新四军军史》条目，王辅一是《军史》分支学科的副主编。他对新四军的研究比我更深入，我与主编周之同商量，约请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项英》这个条目。王辅一不但欣然同意，而且从此一头扎进关于项英的研究中，后来他写出了 48 万字的《项英传》，对项英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评价，受到新四军许多老同志和广大读者的称赞。

王辅一撰写的《项英》条目，肯定了项英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了他在皖南事变中缺乏警惕，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的损失负有责任。这个评价与当年的决定差别很大，为慎重起见，我们送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条目的每一段都写了肯定的批示，他在关于皖南事变的一段旁批注：“这个评价看来可以了。”他看后又转给胡绳，请他再“仔细斟酌一下”，胡绳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研究后，认为“这一条总的说来是写得恰当的”。与此同时，杨尚昆、余秋里等也表示同意这个条目。但是，1987 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后，有些人又出来说

胡耀邦的批示是错误的。有个知名的作家，还写了一本《皖南事变》小说，沿袭当年决定的调子，而且虚构了许多情节，在项英身上泼了许多污水。这本小说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出版，广为发行，引起新四军许多老同志的愤怒。在舆论压力下虽一度停售，但仍在上海获奖。

1998 年 5 月 13 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项英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出席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讲话，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称颂“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迟浩田是代表组织讲这番话的，到此应当说对项英有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此后拍摄的《新四军》等电视剧，仍然按当年的片面决定，歪曲和贬低项英。我与王辅一向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反映意见，听取意见的同志表态很好，但《新四军》等电视剧依然丝毫未改，继续上演；《皖南事变》小说也继续重印。

## 为被错杀的红军将领立传

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条目，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确定收入人物的标准。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讨论，最后订了一个标准，就是收入建军初期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各个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即解放后授予上将以上军衔及职务相当的人物。我们邀请了数十位专家学者，经过多次讨论，层层审查，最后选定了 199 人。

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曾错杀过许多高级将领。有些比较知名，也正式平反过；有些因为早就被错杀，长期被埋没，乃至还没有正式的平反决定。但他们在建军初期，都担负过很重要的职务，做出过很重要的贡献。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标准，从 199 人中选定了 25 名被错杀的高级将领。他们是（按牺牲年代先后排列）：参加过南昌起义、黄麻起义的豫东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徐其虚（1906—1929），1926

年入党、参与发动宁冈暴动、最早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袁文才(1889—1930);与袁文才一起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王佐(1888—1930);曾入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徐百川(1901—1931);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商南起义的豫东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周维炯(1908—1931);曾被誉为一北伐战争中的“虎将”,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和龙州起义,率部千里转战,到江西兴国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红七军军长李明瑞(1896—1931);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5年入党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姜镜堂(1902—1931);1921年入团、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北伐战争中任团长的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1901—1931);1926年入党后曾领导黄麻起义的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曹学楷(1898—1931);1921年入团、1926年入党,曾在日本留学,领导过六霍起义的皖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领导人舒传贤(1899—1931);1926年入党,1927年率领农民武装参加黄麻起义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徐朋人(1903—1932);1927年入党,曾领导创建东固革命根据地,积极策应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红二十军军长、政治委员曾炳春(1901—1932);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曾积极策应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赣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李文林(1900—1932);1924年入党,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营长的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1904—1932);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曾领导黄麻起义的鄂豫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戴克敏(1906—1932);1924年入党的湘鄂西红军和苏区领导人,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1904—1932);1924年入党,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六军政治委员的柳直荀(1898—1932);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党,1923年回国后在鄂北领导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鄂北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程克绳(1893—1932);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任师政治部主任,曾介绍彭德怀入党的红军第六军军长段德昌(1904—1933);1926年入党,曾任红六军军长、红四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的旷

继勋(1895—1933);1926年入党,曾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的廖容坤(1903—1933);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湘鄂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王炳南(1892—1933);早年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师长,领导著名的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1901—1934);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从苏联学习归国后曾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军政治委员的曾中生(1900—1935);长期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领导红二十八军经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1901—1939)。

这25位被错杀的高级将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每人设了一个条目,虽然字数不多,但不少人是第一次在全国性、权威性的书中刊载他们的小传。我们的编写工作还没有结束时,解放军出版社就根据我们拟定的199人名单,约请各有关方面撰写内容更丰富、字数更长的《解放军将领传》,一共出了十几本,共约四五百万字。有些在原籍很少为人所知的人物,其遗属从此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优待、照顾,党史、史志部门也为他们写出书。

为了编写这些人物条目,我们搜集、查阅了大量资料。这些历史档案,反映了极“左”思潮在我党我军历史上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过去我们只知道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肃反中杀了许多人,其实,在中央苏区错杀的人更多、时间更早。1930年开始的反AB团斗争,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中,竟抓了4400多个AB团分子。

这场斗争是当时总前委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到红二十军搞肃反的人,抓了二十军的一批干部,二十军的一部分人被迫发动了“富田事变”。当时,有两个观点不同的代表团,先后从江西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件事,要求中央表态。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雷利斯基认为“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当时在上海的米夫,则持相反的意见。1931年1月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经过初步调查,于1月16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



在批评“富田事变”的同时,强调要纠正反 AB 团中的缺点错误。2月19日,项英在第十一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说:“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3月28日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实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在这个指示之后,中央苏区的反 AB 团斗争更加疯狂地进行,红二十军的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赣西南的地方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杀害或被撤职监禁。我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只收了在反 AB 团中被错杀的李文林、曾炳春两个人,还有大批被杀害的高级干部没有列进去。如赣西南特委书记王怀,后任二十军军长的萧太明,曾任二十军政委的陈冬日,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常委兼军事部长金万邦,少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赣西南特委秘书长李白芳等等。鄂豫皖和湘鄂西的肃反,就是在中央这个决议之后开展起来的。

过去我们常说,我们党的肃反扩大化,是受苏联大规模肃反的影响。但是看过大量历史档案之后,我们发觉,苏联的大规模肃反是1934年以后才开始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被错杀的,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被错杀,更晚几年。而我们的反 AB 团,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上述被错杀的25位高级将领,有22人都是在1933年以前被错杀的。而且我们搞的肃反,不是共产国际或苏联的指示,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负责人盖利斯,在1930年12月3日的一封信中转述了毛泽东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 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从共产国际档案中还能看到:1930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

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些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

有一次,萧克同志向我们讲述他亲历反 AB 团斗争的情况。他指着桌上的一个茶杯说,如果这桌上有一个茶杯,你说成十个,可以说是扩大化;如果一个也没有,是什么扩大化?他叮嘱我们,要好好写一写那些被错杀的同志,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用这些同志的生命换取的历史教训。

编完《中国大百科全书》后,我们又继续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我军人物收入的范围更宽了。我们拟定了一个名单,送给各有关领导同志征求意见。洪学智看到名单后,特地打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着重介绍了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从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李特,和曾任川陕苏区政府与军委秘书长、红五军政委的黄超的情况。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作战,到达了新疆,但不久即失踪,若干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是被错杀的。洪学智认为应当把这两位烈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发了平反文件,李特和黄超载入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之中。

## 客观书写历史的进步与局限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在历史著作中,对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例如,对伟大的人物不能说缺点、错误,对有错误、有问题的人物不能说好话,几乎成为惯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的同志都力图在这方面有所进步,总的看进步不少,但阻力也不小。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毛泽东》是特长条,全文7000多字。其中要不要写他的错误,意见很不一致。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中央在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也写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多数同志认为应当写到条目中。但是也有不少同志反对。最后经过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保留了75个字,即:“1966年,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又被林彪、江青两个

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浩劫中也受到严重损害。”接着说明:“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著名的十六字诀,过去一直说是毛泽东的创造。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撰写《朱德》条目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组组长陈友群等同志,有根有据地提出,朱德1925年在苏联学习时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总结出十六字诀。《毛泽东》组也拿出老同志的回忆,说十六字诀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在《毛泽东》条目中是这样写的:“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中,同朱德等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关于《毛泽东》条目的概括评语,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也没有用“伟大”的用语,这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尽管还是有限的一步。

对于犯过错误或有问题的人物,过去一般是不收的,甚至连名字都不准出现。我看过20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一本战史,因某人犯了错误,在序列表中连他的名字都空缺了。我们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撇弃了过去的一些不合理的框框,列入了《林彪》、《高岗》的条目。因为他们都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也为革命做过贡献。但是对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写不写,怎样写,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最早是陈云在1983年8月9日曾说过:“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我们按照这种精神写出《林彪》条目的初稿后,与其他一些重要条目一起,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

黄克诚看了《林彪》条目释文后,叫秘书打电话,说要当面找我们谈一谈。1985年2月21日,我与周之同、姚夫同志一起到了玉泉山,黄老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

面貌。……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黄老还逐段逐段地谈了他的意见。

黄老的意见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努力按他说的精神去写历史人物。但是,我们也深深感到,司马迁不是那么好学的,真正做到全面的观察,做出全面的评价绝非易事。首先要有敢于打破种种局限,敢于直面历史的勇气,还需要有允许全面观察、全面评价的氛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走过的历程,我以为距真正达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依然任重而道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领域拨乱反正取得的成果很多,就是在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解决的疑难问题也不少。例如为西路军正名和关于“密电”的争论,其过程更为曲折和复杂,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文中从略。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萧 徐)

## 更正

我看到《炎黄春秋》今年第10期刊载的《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张根生遗稿)中提到(见第9页):“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6师进行活动……”过去关于这件事的传说很多,贵刊2000年第11期第10页和2004年第7期第2页,也提过这件事,但说法都不一致。叶剑英和华国锋同志可能听过这种传说,但他们不可能直接去调查这件事。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实际上张××(秋桥)同志没有去过坦克6师。希望贵刊予以更正。北京读者 弘 民

本刊今年第9期63页左栏最后一行“……全部认罪,没有一个悔罪”应为“……全部认罪”。

##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舆论监督对防腐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谷 翔

不久前，党中央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国、以预防腐败为主要职责的重要机构。同时发出一个反腐防腐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最容易发生官员腐败的五个领域，即：管理干部人事的领域，行使司法权的领域，掌握行政审批权的领域，掌控财政资金和金融的领域，还有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领域。据我了解，在我国当前，在这五大领域工作的政府官员，能“干净”从政的，即与贪腐行为不沾边的人，已是难能可贵得很了！不久前，我又走了一趟我工作过的一个地方，碰到了一位市报总编。他说，这些年咱这里因有石油有煤炭等资源，经济快步发展了，掌实权的大官小官可也都跟着发财了。他曾估算过，那些管人管钱管物的头头们的非法收入大都有几百上千万以上！不少人都在省城买了好几套房子，子女们开的是高级轿车。吃了亏的就是普通老百姓哦！他激愤地说：腐败不反不得了呵！但是他又说：到了这个地步反也不顶事了。他说“不顶事”有点过于悲观，他产生悲观情绪的依据是：大官干了那么多坏事

丑事，贪污上千万的巨款，被告到中央了，不但没被查处，反而又升了更大的官，谁还愿意去反什么腐败！？

看来，这位朋友的牢骚道出了一个道理，要防范惩治腐败，必须依靠了解当地贪官实情的干部群众；而要把知情的干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积极投入反腐败斗争，必须让他们有反腐必胜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很显然，必须使那些被干部群众既熟知又痛恨的贪官们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那干部群众“反腐必胜”的信心才会大增。

在中央不久前颁发的文件中，提出了不少防范腐败的措施，比较集中的是对几个关键环节上的权力的监督。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不过，根据我的亲身体验，对防范贪污腐败最有力最快速的监督，要属新闻媒体的监督了。因为，媒体有把贪官们见不得人的事曝光的阵地，也有向上通到党政最高领导那里的“通天”渠道。贪官最怕的无非就是这两条，一是曝光，二是通天，让最高领导知道，这两条的威力正是其他监督组织监督方法不可替代的。

## 意外的震撼所产生的巨大遏制力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刚刚起步，在党政领导层中，贪腐情况还不太严重。尽管如此，党内党外的干部群众对少数当权者的以权谋私行为已很警觉，也很不满。也就在那个时候的某年春天，某一个军区的首长率领数十位高级部下来到某革命老区考察座谈：如何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问题。他们不到50人，占了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较高档的宾馆。当地政府按贵宾接待。几天的日程安排，都是上午开座谈会，下午参观考察，有时乘直升机到野外打猎，晚上或是舞会或是招待演出，中餐晚餐均是酒宴。这在当时农民温饱尚未解决，全地区农民平均年收入不到50元的革命老区来说，就显得奢侈过分了。这也就引起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不满。我将这情况向记者站领导电话汇报后，写了一篇《来自某革命老区的一张报销单》，如实反映了这个军区领导人这次活动的情况和群众的反映，发到了北京的



编辑部。稿件发出后,没两天就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亲笔就领导干部廉洁和抵制贪腐问题写了很长的批示,通报全党全军,引起很大震动,对遏制在党内军内刚刚露头的贪腐苗头起了一定作用。这应该算是一种舆论监督的成效吧!

很显然,像这样的舆论监督作用,对那个大军区当时那种活动的监督不是其他监督所能代替的。群众虽对那种借开会搞吃喝玩乐的情况有很大不满,但无能为力,只能是发发牢骚而已;上述大军区领导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的那种作为,既谈不上违纪更谈不上违法,纪检监督或司法监督也无可奈何。对于这种苗头性问题,只有新闻媒体能承担起具有警示作用的职责。可惜,类似这种可以对防范腐败起很大作用的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现在被限制殆尽了,连群众恨之入骨的贪官们的丑恶卑劣行为,也被视为报道禁区,甚至连内部报道也少见了。在这样情况下那洋洋万字的防范腐败的五年规划,又如何落实呢?!

## 舆论监督对“一把手”有特殊功效

谈起反腐防腐,无论是同朋友们的议论,还是报刊或网上的文章,有一个共识:党政一把手是焦点。不论是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还是一个部门,只要一把手是清廉的,必然对所在地的反腐防腐非常重视,那里的反腐防腐和廉政建

设也必然比较出色;相反,如果一把手是贪官,那里的反腐防腐就难上加难了。比如,几年前沈阳承办的“慕马”案,涉案的17个部门和单位的党政一把手都是贪官,这样,那些一把手就成了“一霸手”,决策一言堂,权力一把抓,用人一朝臣,花钱一支笔,反腐自然就要走过场了。

在若干年前,上世纪80年代初吧,我所在的新闻媒体,还能按党中央的要求正常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舆论监督权,记者有权对所在地发现的新闻线索进行采访调查,写成稿件由本媒体负责人签发,无须交地方或省级领导审查。这样,记者对所在省就能够做到有喜报喜,有忧报忧,敢讲真话,实事求是。如发现了问题,不管涉及谁,哪怕是当地的党政一把手,只要是应该报道应该反映的问题,就采访调查,就及时发稿。在那几年我和同事们所反映的涉及省、地、县一把手的稿件有十来篇。如:当时正是农村生产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由于一把手思想保守,阻挡改革,反对包干到户,我们都如实采写了诸如《小麦登场见分晓》《“包干到户”在抗洪救灾中发挥了优越作用》等好几篇用事实批驳一把手错误观点的通讯。有一个在“学大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受过党纪处分的党员干部,下放到农村劳动,肯吃苦,事迹突出而被当地农民评为县劳模。没想到县里一把手竟为此事大发雷霆,认为“犯过错误的人就不该当劳模”。虽然当时在领导层中许多人有不同看

法,但因是一把手的意见,不敢顶撞,要下去“纠正”。一位记者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这朵红花该不该给他戴》,这篇文章在当地引起很好反响,后来一把手收回了自己的不当意见。还有,在我们反映了当地广大群众要求调换省一把手的意见后,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由省委把全省县长县委书记召到省上,同省委委员一起投票,用这种民意测验的办法来“选”一把手。投票结果,绝大多数票希望一位思想解放作风正派的副省长当一把手。可是此人不合“老一把手”的意,他私自准备更改票决数字,换另一个人作为新一把手的对象报中央。可是由于我们在投票当天就把票决结果如实向中央反映了,使老一把手的企图未能如愿。

从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舆论对官员的监督,特别对一把手的特殊监督作用。之所以当年能有那样的作用,无非是因为媒体的报道一能曝光,二能通天。再大的官员,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当然害怕曝光于天下,当然害怕党中央知道丢乌纱帽甚至掉脑袋。可是当今的新闻媒体,包括可以“通天”的中央媒体,现在的监督作用,特别对各省一把手的监督作用,我个人以为均已大大削弱了,基本不存在了。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据我了解,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几年前对中央媒体来了一条过去几十年都没有的限制,即:凡涉及省上工作特别是省领导层问题的内部报道稿件,必须经过有关省的省领

导审查。这一条规定就把对一把手的内部监督通道堵死了。尽管在新规定中规定了各省领导对送省稿件有不同意见可提出,但不得扣压,可是请想想,有谁愿意把反映省上问题的稿件送给省上的当事人去审查呢!这显然是在限制舆论监督,而根本不是什么鼓励!其实有“文责自负”这一条就足够了嘛!这样限制的结果又怎样呢?

近些年来我常去的那个地方,随着党内外监督体制的日益削弱,贪腐势力也从上到下日益蔓延。上世纪80年代初,只要在各级领导层中有越轨行为,只要有与党中央要求不一致的动向,很快就会见诸报端,或通过内部渠道反映到中央领导的案头,哪怕是大军区大首长的不当作为,哪怕是省委一把手那样高官的错误决策,都能得到及时制止或纠正。可是现在,党委的监督、党内的监督完全失效,一切大小决策,包括领导层人事的安排,重大项

目的取舍,对上的报告,对下的表态,等等等等,都由一把手说了算,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没人敢吭一声。中央被封锁着,下边被隐瞒着。如果还像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新闻媒体的“通天”渠道畅通,能发挥应有的舆论监督作用,那个地方也不至于腐败到今天这个地步啊!

把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放开吧,把敢讲真话报实情的渠道放开吧!把这些年已造成严重后果的限制舆论监督的机制,改成鼓励机制吧。对掌管监督大权的监督者,也亟须对他们加强监督啊!

(责任编辑 李晨)

## 书屋 2008年第11期目录

- |      |  |                   |
|------|--|-------------------|
| 学界新论 | “敢为天下先”引发的一点思考<br>君主立宪在近代中国何以不可能<br>——兼论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世俗性特点<br>我们需要启蒙主义<br>——兼说文学家的使命问题 | 雷池月<br>阙光联<br>许曠  |
| 书屋讲坛 | 预算的人民性<br>小议公民社会   | 李炜光<br>王小章        |
| 思史佚篇 | 1918,我们还能说什么?  | 熊伟民               |
| 说长论短 | 李敖时或脱口成谬<br>“大师”戏说马寅初之后<br>合格祖宗有瑕疵   | 任辛<br>邵纯<br>张永高   |
| 灯下随笔 | 云岗石窟随想<br>读西哲,思当下(二则)  | 蔡蓬溪<br>黄书泉        |
| 域外传真 |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br>获得“国葬”殊遇的作家  | 王志龙<br>许锡强        |
| 人物春秋 | 说说家父吴奔星的一则“文革”汇报<br>萧乾先生印象<br>——一位厚道的老北京人<br>夏承焘旅居湖南侧记                             | 吴心海<br>刘炳善<br>朱琪  |
| 书屋品茗 | 状元春秋<br>□鵑与蟾蜍<br>——从《庄子》到《郁离子》<br>夏日长开说紫薇  | 张志东<br>徐柏容<br>李荫远 |
| 史海钩沉 | 毛泽东紫金山头论古今   |                   |

李元讲述 李大光整理

雷霆雨露皆春风 刘绪义  
关于“妻子”的流转交易 蒋晗玉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邮发代号:2-868  
欢迎来稿 欢迎订阅  
2009年不涨价,全年96元。



# 博覽群書

生活即阅读 思想共交流

综合性读书类月刊《博览群书》，由光明日报主管主办，1985年创刊。2009年，《博览群书》将两翼齐飞（以书为媒、关注生活），三性并举（思想性、趣味性、服务性），致力于社会各界的思想交流，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订阅《博览群书》，可以提高阅读趣味和修养、选读人文社科类好书、了解思想界最新动态、营造自己的精神高地。

《博览群书》每期128页，每月1日出版，每册8.00元，全年96元。邮发代号：2-868，全国各地邮电局（所）订阅，可破季订阅。编辑部办理邮购。

订阅全年《博览群书》，寄回发票或发票复印件的前200名读者，将获赠《博览群书》精选集一本（《读书滋味长》，广西师大出版社，30.00元；《情怀与风度》，人民出版社，23.80元；《追忆与感怀》，人民出版社，23.80元）。

地址：(100062)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电话：(010)67078104  
E-mail: gmblqs@163.com http://www.gmw.cn

# 闻陆铿辞世感言

● 施亮



晚年陆铿

海内外华人新闻界享有盛誉的老报人陆铿先生于今年6月21日晚病逝美国旧金山。他的遗体6月26日上午11时在当地火化，骨灰由其子女带回国内安葬。依其遗嘱，归葬于昆明市金宝山的名人园，墓碑上镌刻：“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

陆铿先生必定是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影响的人物。但虽然近年来也有一些报刊介绍其人其事，国内却较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出身云南省保山县的世家大族，年轻时即担任缅甸《仰光日报》的特约记者，后来听从萧乾先生建议，抗战中奔赴大后方重庆，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班，毕业后即开始了职业新闻记者生涯。他当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又与友人办报纸。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他赴欧洲采访，在柏林见到已经被盟军关押至监狱的纳粹元凶之一戈林，还受邀拜谒了天主教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回国后，他曾经担任《中央日报》采访主任，又升任副总编辑，可说是当时国统区新闻界风云一时的当红记者。陆铿不畏强权，敢在权势面前说真话，甚至有一句名言：“不坐牢就不是好记者。”他为调查国民党政坛黑幕真相，想方设法在庐山偷看陈布雷的机密文件，惹得陈

布雷大为恼火。他还在报刊上公开揭露宋子文、孔祥熙大量贪污外汇的事实，蒋介石大发雷霆召见他，喝令他交代此事的消息来源，而屠刀架在脖子上他也拒绝说出真情，并向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官僚腐败贪污的种种劣迹，预言如不改弦更张，必定导致大崩溃局面。他的一番坦言，竟然使蒋介石动容，终于轻饶了他。不过，他的犀利笔端自然会触痛某些权贵，就在国民党在大陆政权覆灭前夕，这些人仍然对陆铿必欲除之而后快，当他在广州创办《新闻天地》时，国民党给他扣上“通敌”罪名，将他逮捕坐了几个月的监狱。这也是陆铿的初入囹圄，因幸得欣赏其才华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阎锡山营救出狱，暂时由广州避往香港。他又从香港返回昆明，拟接出家眷到香港定居，恰遇昆明解放，因此滞留于大陆。新中国诞生后，陆铿也曾经以“战犯”身份两度入狱，直至1975年人民政府实行大赦，他才被释放回家。后来，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他时，曾对他表示抚慰之意，说是让他吃苦头了，受委屈了。此时，陆铿已经迁居香港，担任《百姓》半月刊社长，美国纽约的《华语快报》发行人。

最近，我读到了《作家文摘》转载《凤凰周刊》所发表贾葭先生的文章，专门提到了陆铿采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事。那是在1985年5月10日下午，他们坦诚地交谈了两小时。采访时，陆铿曾经要求带录音机，碍于有关规定接待部门不同意，最后还是胡耀邦亲自批准了。此次会谈中，涉及了台海关系、对毛泽东的评价、高层人事动态、新闻自由及对人权的看法等等在当时极端敏感的政治话题。陆铿将这篇访谈《胡耀邦访问记》全文发表在香港的《百姓》半月刊上。“由于陆铿在发表时拒绝胡耀邦的删改建议，导致胡耀邦关于中国政治的一些看法曝光，引发北京高层震动。”这篇访谈竟成为一个政治事件，是胡耀邦同



志蒙冤受屈而辞职的重要起因之一。据说“陆铿在回忆录中对此深为悔恨”。我也曾经有幸拜读过这篇访谈记,并且反复读过几遍,由此深为钦佩耀邦同志的远见卓识及开明的政治风范。说实话,倘若未能设身处地感受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历史氛围,现代青年人一定极其讶异,党的领袖讲一讲这些真话怎么会引起高层那么大的“政治震动”呢?他们不会明白,如今我们在报刊上司空见惯的那些名词,譬如以人为本,人文主义,甚至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观念,当时怎么都被某些人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被看成是异端邪说呢!抚今追昔,我们亦可从中感受到整个社会在艰难坎坷中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因此,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将当年这篇访谈记全文在国内公开刊布,其实这对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会是颇有助益的。

1994年10月,我随团中央的一个访问团去香港时,顺便向带队人请一天假,特地与美籍华裔作家陈若曦会面。我们随意交谈时,也谈及陆铿先生的一些逸事。我久闻陆铿先生大名,也很仰慕他的节义风骨。陈若曦说,陆铿访问胡耀邦前曾经与

她通过一个电话,因为此前她也受过胡耀邦接见。他们对胡耀邦是很敬仰的,尤其是崇敬胡耀邦坦诚磊落的胸襟及人格风范,认为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有品格的文人最重求真,但是求真也往往须付出代价。陆铿即因为直言付出许多代价,国共两党曾经都不喜欢他。他因为1985年采访胡耀邦惹祸,直至去年才被允许回内地探亲。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有人谣传,他曾经帮助过某大人物由香港潜逃美国定居:此事纯属臆测。《中国论坛》社长陈有为先生已经在《联合早报》廓清事实了。陆铿在上世纪80年代初撰文说,蒋经国身体欠佳,不适宜连任“总统”,遭致蒋经国震怒,因此台湾当局曾将其列入不受欢迎人的名单,直至1990年才解禁。在“江南事件”中,陆铿亦为作家江南惨死而大声疾呼,仗义执言。他明白讲真话会有各种麻烦缠身,甚至讲真话也会像江南一样遭遇不测,但他绝不放弃“讲真话”的精神,因为讲真话,揭真相,求真理,才是一个真正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所在。他的棱棱风骨让人敬佩。

(作者系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李晨)

##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2008040039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2008050153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后语

● 叶维丽

“我”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十几年前，这是个十分困扰我的问题。

10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沧桑剧变，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巨大的认同困惑。身在海外，我的困惑尤甚。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马笑冬着手做这个口述成长史时，不绝于耳的是“历史的终结”的胜利宣判和全球资本主义充满自信的进军步伐。在它大步的践踏之下，我个人的历史一时变得支离破碎、面目皆非。“我”是谁，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自己去艰难求证的。做口述成长史的初衷，即源于我的认同危机。

十几年后的今天，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变得天下太平，而是充斥着血腥的种族残杀，激烈的宗教冲突，帝国主义改头换面的复兴，资本全球性的横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女性地位的继续下降和触目惊心的环境危机。这是一个令人不安、十分不确定的世界。“历史”并无终结的迹象。

十几年来，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也分别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一些变故，我曾不得不将口述录音的整理一度搁置。再将它拿起来时，进行这个工作本身成为我生活中的巨大支撑。在梳理个体经历的过程中，我寻找着一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将自己的生命与延绵不绝的中国人的历史“链接”在一起。我奶奶临终前给“太太”下跪，我母亲在延安窑洞前晒她的病腿——这些画面在我眼前变得栩栩如生。通过奶奶和妈妈，历史和我有了骨血的联系。这联系是个体的，同时却有着宏大的、关乎众生的意义，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身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做“二姨太”的奶奶，到投身“一二·九”运动，成为共产党员的妈妈，到今天，我，仅仅三代人，我们跨越了多少路程！将“小我”置于不息的生命长河中，使我获得了某种“历史感”，我的经历也具有了某种“历史性”。我不

再感到那么孤立无援，没着没落。

同时，梳理个人往事，使我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将自己过往的经历捡拾起来，细加审视，从中找出脉络、逻辑和关节处，重要的是，我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红卫兵”到改革开放之初各个领域的促进者这一巨大角色转变中看到了希望。毕竟人是可以获得历史主体性的，不会总是任人拿捏的工具。尽管这很难，但不是做不到。

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个不断自我考问而又自我肯定的反复求证过程，它是开放式的，不断提出问题的，而不是断然做出结论的。

今天，我可以这样说：

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生育了我，更因为她的精神在继续滋养着我。从小，是她告诉我：做女人，要争气。

我生命的“底色”奠定于“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作为一个孩子，那个时代教给我的，是相信光明，追求上进，凡事要认真。

“文革”前后的经历，让我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怀疑；在内心深处，我开始抵触绝对的权威、一统的精神和违反人道的政治。

农村五年的生活，让我的脚跟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从此我多了一份对“受苦人”的认同，少了一份城里人的轻狂，做人有了一些根基。

这“有根”的感觉，是我到美国后才体会到的。在那个陌生、奇异而又富足的环境里，我没有迷乱张皇，妄自菲薄。

同时，在美国的学习、生活和经历，也让我逐渐对世界采取一种开放、理解、分析和批判的态度。我眼中的事物，也开始呈现出它们的复杂、多面、矛盾、悖论和变动，呈现出它们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而不再仅仅是黑白两色。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十七年”正统教育，从小就被告知历史的发

展具有“必然规律”的人，一个经历了十年“文革”，总被强迫用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人，这个变化是深刻的。我出国时国内的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我到美国后所经历的视野的开拓和观察事物方式的改变，也算是我个人的一场小小的思想解放吧。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早已从学生变成了在大学的教员。每日耳濡目染，对美国社会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曾经令我不解、近年来却让我见怪不怪的是，那种非黑即白、“一面倒”的思维方式，却在一个号称自由、多元的国家颇有市场，我原以为它只是信息封闭国家的特产呢。慢慢地我意识到，如果说中国在80年代以来解构了许多革命时期的价值观念，那么美国作为冷战胜方，非但没有经历反思，反倒在一些人当中强化了“道德拥有者”、真理化身的倾向。

而我，已再无法接受唯我独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不管它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不管它是以什么名义，披着什么样外衣。

正是基于这种立场，我质疑西方某些人所代表的傲慢、绝对的“冷战胜方”的历史观。

我对它的回答，就是认认真真地梳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坏的摒弃，好的留下。

对我来说，求证仍在艰难地进行中。

我下一步要做的，是想通过梳理父母那一辈抗战初期参加中共的“三八式”知识青年的经历，来反思中国革命复杂的历史遗产。

细心的读者会记得，我曾在1998年去过一次延安，踏访1941年重病中母亲的足迹。从那以后，我陆续访问了数十位那一代的革命者，其中大半人今天已经辞世。我曾经十分健壮的父亲如今也已严重中风失语。很快，那一代人就将彻底离别我们而去。我这个当年在别人眼中不那么“革命”的人，在“告别革命”的今天，倒是不想轻松地告别，而是想要好好清理一下革命的是非功过。毕竟，那是一段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要的历史，在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梳理个人的历史，也使我更加意识到全面认真清理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遗产”的重要性。我和马笑冬所作的成长史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清理工作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浩大的思想工程，却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回避的。对待自己的历史，我

们不应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不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

有笔债在我心中日益沉重，那就是作为“老三届”一代人，我们对“文革”初期“红卫兵”暴力进行的反思和清算还远远不够，以至于我们的子女对那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几乎毫不知情。也许这样的集体失忆背后有重要的政治原因，与“文革”结束后形成的为了经济发展一切“向前看”（向钱看）的国家“历史政策”有关。但对历史终究是无法欠账的，越不勇于正视，就越容易导致对历史“非黑即白”式的全盘抹杀、全部否定。到头来，恶果还是要自己吃。

值得欣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代人已经开始正视自己“文革”初期的历史，开始反思，认错，道歉。据我所知，在一些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同学的聚会上，出现了当年伤害过同学的“老红卫兵”向被伤害同学沉痛道歉的场面。与此同时，“文革”初期女附中师生代表会的负责人，也在仔细回忆和认真思考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历史，并问自己：为什么“文革”中北京市第一起恶性暴力事件会发生在一所有名的女校？我们当年所受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她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





们在书中问的。这位当年的学生中的负责人还多次拜访8月5号被打的5位校领导中唯一的幸存者梅树民老师,倾听梅老师压抑多年的愤懑,反复地、真诚地为当天没有保护好老师们向梅老师道歉。

去年(2007年)是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成立90周年。值此大庆之际,以老三届为主的一些校友们提出不该忘却卞仲耘校长“文革”初期被学生毒打折磨致死的惨剧。为了记住这一女附中历史上的奇耻,更为了警示后人,校友们特别是众多的老三届学生们,纷纷捐款,为卞校长建立一座雕像,以志永久的纪念。

从1966年算起,42年过去了,卞校长的老伴王先生已是87岁高龄,这一天等得太久了。但我们毕竟没有忘记,我们又岂敢遗忘!

几乎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污渍,都有不堪回首之处。近年来,不论是用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方式,还是用加拿大总理(向原住民儿童)道歉的方式,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纷纷直面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寻求真相,并就过去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向受害者或其后代公开表达遗憾和悔悟之意,承诺不容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

个人的反省不能替代国家的道歉。我们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国家的行为也不能代替我们每个人的态度。众人拾柴火焰高,民众的推动可以对国家起促进作用。一个有“清洁的精神”的国家,它的良知应该根植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上。这良知不仅体现在此次四川大地震后举国上下所显示的仁爱之心,也应体现在一个民族勇于面对自己历史的真相、敢于承担道义的责任。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谅解,是一个和谐社会坚实的基石。这,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

今天,我们这代人已经鬓发灰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退居历史舞台的边角。该是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清洗历史的伤口,认真偿还历史欠账的时候了。于无声处,聚光灯外,我的校友们,我的老三届的朋友们,正在实实在在地这样做。虽然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但开始了就好。我深受感动。

我自己说了这么多,该讲讲我的合作者马笑冬了。她在重病中。她的病已不可逆转,她的生命在一点一滴中被销蚀。想到当年她是那么一个要强、出类拔萃的女性,我的心中只有悲哀。

马笑冬1999年从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社会学,同时投身于对贫困地区妇女婚姻和生育健康的研究。她选择的“点”,恰恰是她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提到的,她当记者时采访过的陕北某贫困县。在美国生活10年,她未敢忘怀那块土地。她对女性问题的关心和她与中国农村的不解之缘,已在本书中充分表达。实际上,她在美国写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的。回国后,她多次在陕北的村庄里和老乡共度春节。她对我说,在他们中间,她感到“自在”,谈起“她的”两个村子和那里的婆姨娃娃,她的眼睛发亮。她上海的同事们大惑不解:她为什么放着大城市舒适的生活不过,总是往最穷的地方跑。看过这本书,读者们也许会对马笑冬多一点理解。在病倒之前,她正着手写一篇关于陕北的文章,题目是《黄土地,我对你说》。她还有很多话要说,可惜再也无法说了。

妇女问题、性别问题、城乡二元社会等一系列问题,贯穿在本书若干章节中。它们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过去的经历,给我们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参照。马笑冬回国后,身体力行,继续着对它们的探索。“过去”和“今天”用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方式承续着。在马笑冬身上凝聚着我们这代人美好的品质:“不可悔改”的理想主义,对社会正义的执着追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它们已不合时宜,唯如此,更凸现出它们的真诚和可贵。

近乡情怯。献上一本由两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成长经历的小书,令我心情紧张。比起同代的很多人,我们的经历(尤其是我的)实在平常,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大起大伏。我深知,由于出身、背景和经历,我们的认知受到诸多局限。只是因为我们在海外,和中国的事情有了一定的距离,也有着一些格外的感触,才由此生出仔细梳理过去的想法。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更希望这本书能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特别我们这一代人,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回顾和反思。这样出来的历史,才能较为接近我们所经历的大千时代,它也将是我们能够留给后代的最好礼物。

(叶维丽系美国马塞诸塞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教授、马笑冬系复旦大学教授)

# 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 袁小伦

翻阅《读书》2007年第12期耿占春《一个孩子的阅读史》,想起我小时候的读书生活。耿说他“刚上小学三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放了长假”,而我的“假期”更长,“文革”爆发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文革”的一个印象就是,课本突然变薄了。我是“老六届”,“文革”爆发前在校的小学生,1965年上的小学,记得课本厚厚软软的,文字插图感觉很温暖的,而第二学年“文革”爆发,发下来的课本很没劲,硬硬粗粗的,标语口号漫画蛮横刺眼。当时真的很伤心!

耿文中开列的当年所读到的禁书中的第一本《百鸟衣》我也读过,是先听父亲用近似于抒情的吟咏后自己摸索读懂的。今天还依稀记得《百鸟衣》是一首句子有长有短的诗歌,有两个名字古卡和依婁。美丽的依婁被土司抢掠走,古卡用射一百只鸟的羽毛做成了百鸟衣,借献衣之机杀死土司,救出依婁,然后双双跨上骏马,自然驰骋而去。当年我是在中学某个年级的语文课本中读到《百鸟衣》的,篇名可能就是《古卡和依婁》。读《百鸟衣》的记忆,激活了那段饥不择食且引起胡思乱想的阅读史。

我出生于全民中邪和大饥荒中的一年,属猪。饿肚子饿慌了,做梦都想吃猪肉。看着母亲喂养的一头猪而发奇想:如果今天在它身上挖出一块肉,明天又长回去,那么就天天有肉吃了。一个生长在岭东潮汕偏僻乡村,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农民的家庭的孩子,是不能感受朱学勤经历的“民间思想村落”那样的读书思辨气氛的,也几乎读不到沈展云《灰皮书,黄皮书》中说的印着“供批判使用”的那种“灰皮书”的。不过,我还是觉得童年的阅读尽管的确的确是饥不择食却同时也是津津有味的。

在那个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年代,物质产品

和精神粮食非常匮乏,什么都吃,什么都看,不论是否合适是否有营养。

大约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名叫做《我们夫妇为什么破裂?》的讨论恋爱婚姻家庭文集,内容讲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初的一对夫妻——一位革命干部和一位教师的婚姻生活的破裂过程。是女主人公的一篇文章,似乎有批判和揭发丈夫的意味,不过不像早些年一些被丈夫抛弃而到妇联哭哭啼啼到丈夫单位嘈嘈闹闹的妇女那样,而是通过文字来保持一个女教师的尊严和正义。书中还有包括对第三者的看法等十几篇报刊的说理、评论文章,其中绝大多数是批判革命干部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也有个别文章是为革命干部辩护的。革命干部爱上比妻子年轻漂亮的新部下,革命干部说了一句“女孩子两条辫子一甩就动人心”的话。

开始上初中的时候,反复读了一本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小开本,比今天的小三十二开还小,十分残旧接近破烂的小册子,繁体竖排,书中有线条简练而生动的插图,印刷质量略好于手工油印,封面印有作者长头发的画像,当时弄不清这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更不知道什么左联五烈士之一了。

小说的故事震撼人心而文字朴实冷峻,写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乡村妇女被丈夫典出即被出租几年到地主家做传宗接种的工具的悲惨遭遇。书中有几个片段我一直记得。一个是父亲亲手把刚出生的女儿烫死的十分恐怖的情节。女人的丈夫一看妻子生的是女儿,便提了一桶开水到女婴的旁边,用粗暴的双手将呱呱叫着的女儿,投进在开水中。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听不到初生生命的哭声了,只听到开水的溅声和皮肉吸纳开水的嘶嘶声。二是这个女人到地主秀才家生下儿子秋宝,等到秋宝会说话的时候,管这个女人即亲生

的母亲叫“婶婶”，而却叫秀才的大妻为“妈妈”。还记得这女人丈夫的一句话。出典期满后，女人被迫离开秀才家回到原先丈夫家里。她拖着万分疲惫的身子准备做饭却找不到米可以下锅时，丈夫冷笑着说：你还真大户人家生活过惯了！米装在那只香烟盒子内。

这些东西能大体记住，现在想来，除原作的生动刺激外，我也曾耳闻目睹相类似情形。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乡下的孩子很少叫自己的母亲为“妈妈”的，多数叫母亲为“阿姨”“阿姆”，叫“妈妈”的孩子的父母一定是干部教师等吃商品粮的。米缸空空而把粮食当做珍珠一样盛在香烟盒、小药罐的更是常见了。杀掉新生的女婴的事没见过，但歧视女孩、歧视没有男孩的家庭的现象是到处可见。不过，对于“为奴隶的”这个定语当时是弄不清其确切涵义，因为那时是高喊“为革命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年代，我把“为奴隶的”的“为”错读成第四声。我喜欢《为奴隶的母亲》甚于后来读到的鲁迅的《阿Q正传》。

我有幸读过几乎是全套的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四叔一九六二年考上中山大学物理系，父亲把他的语文课本留了下来放在抽屉里，而理化课本据说被祖母当成包糖果的纸张慢慢地消费掉。除《百鸟衣》外，记得还有《百合花》、《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铸剑》、《反头税（税头？）的斗争》等。

《反头税（税头？）的斗争》一文选自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写的是民国时期某年河北蠡县农民过年杀猪反“割头税”的造反行动。县衙、豪绅、地主勾结密谋，横征暴敛，农民兄弟，忍无可忍，上街游行示威，砸烂征税所，冲进县衙，县长眼见势不可挡，只好被迫宣布免去当年的“割头税”。至今我对文中“割头税”的数字依然可以脱口而出，因为我曾将它与公社社员养猪对“公家”的“贡献”做过比较。这种比较是一种本能，因为当时不可能读到如“革命在事实上成功宣告了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之类的东西。

小说中春兰的父亲老驴头说：“街上又出了一宗割头税，杀一头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猪尾巴、大肠头。一头猪的税，值二三小斗粮食。我要是有这二三小斗粮食，再掺上点糠糠菜菜，一家子能过一冬天。”我读小说时，亲身经

历的人民公社社员养猪的“贡献”也不小。社员可以养猪，但不能杀猪，私宰牲畜是犯法的。公社党委规定社员杀猪事先报告公社食品站，经同意后，将猪运到指定的地点屠宰，按“购六留四”比例作“贡献”。

所谓“购六”，就是“公家”统一收购每头猪的百分之六十分量，价格约低于“牌价”三角，当时的“牌价”猪肉每斤八角，这种“牌价”是定量供应给吃商品粮的。所谓“留四”就是每头猪的百分之四十由养猪的社员留下自由处理，可以高于“牌价”的“议价”卖给“公家”，也可以拿到市场卖“自由价”，当然也可以自己吃掉。“议价”相当于“批发价”略低于“自由价”，“自由价”猪肉每斤一元六角，是“牌价”的两倍。我曾多次目睹母亲辛辛苦苦喂养大的猪被人用绳子捆绑吊起运走！早些年看到媒体上报道高级领导人物感叹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时，我不明白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如果是说革命成功后农民非常听话，那么他们说的算是真心话；与此同时，猜测他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是当年领导类似反“割头税”的农民暴动领袖。

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有那个特定时代的局限，将时间消磨在所谓的“红色经典”中，如沉迷《红日》、《保卫延安》、《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苦菜花》、《迎春花》、《三家巷》等。许多当年阅读过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的中老年人，由于先入为主的记忆，总觉得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是胡编乱造因而非常失望。我大体也是这样，而且觉得越到往后就越差劲。我认可的有两部，王心刚、王晓棠、王润身主演的黑白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浓缩了原著的精华乃至超越了原著；李琳主演的电视剧《迎春花》也很不错，片头的主题歌好像采用了《苏武牧羊》的一段曲调，好听极了。

整整一个暑假，月光如水，我都在晒谷场纳凉兼反复阅读《林海雪原》，开头结尾和所有篇目我至今不看书也可以说出来了。而且比较阅读了两个版本，该小说的初版开本较大，可能就是大三十二开吧，再版开本较小，可能就是小三十二开吧。记得再版中“少剑波雪乡萌情心”一章有少剑波赞美白茹的抒情诗：“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万绿丛中一点红，晨曦仙女散彩霞



……”而初版则没有这首诗。

小说中的少剑波小白鸽成为多少少男少女的偶像！少年的我当然也羡慕少剑波的英俊潇洒、足智多谋、文武双全，不过我更喜欢他身上的三件宝贝：手枪、钢笔、金壳表，尤其是钢笔。那时我非常想拥有一支钢笔。我的第一支钢笔价格一块二毛，其中六毛钱是自己割草卖给生产队的鱼苗场挣来的，另外六毛钱是父亲给的。少剑波的钢笔和金表是奖励品，是他出色深入烟台敌后执行紧急任务后上级奖励的（《青春之歌》中北大教授儿子罗大方可以在家中父亲的抽屉随意翻拣出一块手表送给卢嘉川或江华的细节也看得如痴如醉）。

小说《李鲤宫前对手交锋》中一个情节看得我心惊肉跳。丑陋凶恶的女匪首蝴蝶迷从腿上拔出匕首，咬牙切齿地吼叫：“小共产丫头，黄毛丫头，你姑奶奶临死也要抓个垫大腿的。”锋利的匕首直插向白茹的心窝。在这万分危急中只听大喊一声：“蝴蝶迷看刀！”随着喊声，蝴蝶迷从右肩到胯下，活活的劈成两片，五脏六腑臭血满地。“子荣，”小白鸽像个受惊的小孩子，扑到杨子荣的怀里（《苦菜花》中王柬芝杀死妻子与长工私通而生的杏丽，则是当年阅读中最感残忍和痛心的事件）。蝴蝶迷的肝胆皮肉都是臭的，体现了作者是多么爱憎分明啊！但当年是不理解的。类似的不理解还有看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所唱的“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同样是死，为什么结果是那样的不同呢！

当年读《林海雪原》有好多问题至今也没有弄明白。例如，为什么叫“少剑波”，中国有姓“少”的吗？小说开头写到他的姐姐“鞠县长”，姐姐姓鞠弟弟也应该姓鞠，但小说没有一个地方写有“鞠剑波”的。又如，小分队智取威虎山之前白茹十八岁，在威虎厅过大年之后，为什么小说依然写白茹是十八岁呢？难道作者真是希望白茹永远停留在美丽纯洁的十八岁吗？——行文至此的想法，并非当年疑问。

一本大概叫做《我国哲学战线的新论战》的书，白底色红色仿宋字书名，收入了好多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论战的文章，今天回想起来，可以说是我哲学启蒙读物，尽管读得似懂非懂，尽管先入为主清楚一分为二是毛主席的观点

是正确的，合二而一是杨献珍的观点是错误的，但阅读的过程中总觉得两者讲的是一个道理，却又不肯讲出来给人听。该书的几行文字成为我考倒小朋友的武器，因而也曾洋洋得意过。这几行字大意是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著《东西均》讲到对立统一问题，如“尽天地古今毕二”、“合二为一”等等，并认为古人把世间万物各种各样的“物件”叫做“东西”形象生动地体现了辩证法。几年前，试图寻找这本旧书，去了几家图书馆，结果无功而返，找来对“一分为二”有很深研究的庞朴注解的《东西均》，可惜再也没有当年的阅读快感了。

我与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两度相逢，少年读的是初版，米黄色的封面，可能是印刷于大饥荒时期，纸张质地很灰暗。记得是听了哥哥说了句“读了这本书你就什么都懂了”，然后硬着头皮、断断续续、跳读倒读、似懂非懂地读到哪里算哪里的。记得书名和内文既有繁体字也有简体字，封面或是扉页还印有“供高等学校选择试用”的字样。回想起来，初读艾著的收获是不少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肯定，人人都懂，人人都讲不清，大道理就是那些东西，就是讲法不同用意各异罢了。青年时读的是第三版，那是大约在一九七九年大二的政治课教材，封面或扉页的“供高等学校选择试用”的谦虚字样不见了，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连封面的设计都一样。读的是同样的书，感觉却如霄壤之别。这时读书有了功利性，因而只是划杠杠记要点应付考试，毫无求知的意思。对照今日一些在封面印着“全国优秀”、“获奖”、某某权力机关“指定”而错别字连篇、软硬伤遍体的大学教材，不得不敬佩当年学者的态度谦虚严谨认真。

小时候读过的少儿读物其实很少，上面这些其实大多为成年人的读物。我曾在一本书的引言中说到的少年阅读的至爱《成语故事》第一集才是真正的少儿读物，也是至今我读过的最好看的书。这是一册有难字注音有生动插图的小册子，平装本，翻阅简便，手感轻轻很舒服。它的制造者是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是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记忆确实模糊了，但封面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字样还是有印象的，同时封面的一幅画一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根据成语“杞人

忧天”意思画着一个因担心天会坍塌下来地会崩裂开陷而消瘦发愁的人,画着他那既弯着腰拄着拐棍又很艰难地抬头看天的样子。也许时代前进了而我幼稚依旧吧,儿子小的时候我曾经几乎走遍广州的大书店,想为儿子挑选一本类似当年阅读过的成语故事,结果让我十分失望,那样纯朴廉价的启蒙读物再也找不到了。这本小册子是我少年精神上的快乐和智慧的主要源泉。后来读《左传》《论语》《孟子》《庄子》等,常常又和那些典故人物图画相遇,感觉很开心很温暖。

我的悟性和智商其实都停留在少年阅读的水平上。少年时的阅读记忆就是一句话,饥不择食而又津津有味。想找回做一个少年阅读者的感觉,眼下似乎是不允许有这样的福气的,可能还要等待若干年,等到“老人如小孩”的时候,等到“返老还童”的时候。做一个阅读的“两头真”,期望那时是随心所欲而又兴趣盎然。

(作者系广州体育学院历史教研室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28.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动荡的青春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叶维丽	3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张纯如	28.00	6.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8.00	6.00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刘 冰	34.00	7.00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 杭	39.8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张 胜	45.00	7.00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徐庆全	24.00	6.00
淮海战役秘密战	夏继诚	33.00	7.00
辽沈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5.00	7.00
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6.00	7.00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上下)	程美东	68.00	8.00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	22.00	5.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 代购代邮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民主是个好东西,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不是对个人,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坏东西……因此,真正能够给民众带来福利的,依然是国内的制度:民主、法治等因素构成的国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把这个关乎民族前途的最大问题再次提了出来。每个负责的中国人都在深思。

《李锐反左文选》

1957 - 1978 年 20 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阅读此书,你不仅可以了解到苏联总统对后改革时期叶利钦十年的评价,对他领导国家过程中主要的消极成果的评价,对叶利钦及其班子不加批评地接受西方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你还将了解到为什么现在戈尔巴乔夫支持普京的政策。通过阅读此书,你会对苏联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总统及其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于光远

《沉思录》 温总理说:“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 100 遍,天天都在读”。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

# 值得纪念的光绪皇帝

● 王也扬

今年是光绪皇帝逝世 100 周年。光绪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有两点突出的事迹为历代帝王所不及。其一，他充当了把古代中国和平改造成现代中国的尝试——戊戌变法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维新党人。其二，在变法中，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回答：“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即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说明他是一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

笔者曾撰文认为，110 年前的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改革，其中一条论据，就是为政者在对改革的认识与决心方面，戊戌时期的中国皇帝光绪实际上超出了作为现代化改革成功者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和日本天皇明治。当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通过游历国外，见识了先进事物，产生了学习外国达致富强的愿望；日本明治天皇在倒幕志士的帮助下从幕府手中获得了权力，于是顺从了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而中国皇帝光绪对变法的觉悟则来自民族危机和国家存亡的千钧压力，其教训刻骨铭心，其认识达到相当的高度。甲午战败，一直主战的光绪“愤极愧极”，为了“不做亡国之君”，他通过老师翁同龢接触到了康有为的上书，进而又以各种途径“大购西人政书览之”，“考读西法新政之书，日昃不惶”，逐步认识到学习西方应“毋徒袭其皮毛”，必须进行根本制度的改革。这样他就从思想上与维新派渐趋一致，最后成为心心相印的同志。光绪对变法有横下一条心的决心，他曾当着慈禧面表示，甘愿“坏祖宗之法”，也要推进新政。而以中国保守的传统，触犯“祖宗之法”即可指为“大逆不道”。在百日维新中，光绪下达的一系列“上谕”，从政治改革到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改革等等方面，几乎都突破了“祖制”，也突破了张之洞等人把“西学”、“西法”限制在“中体”框框内的主张，从而在国内形成了“除旧更新”的令人

振奋的改革大潮。

最让人感佩的，还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光绪皇帝有一种为了改革、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自己权位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和了不起的。在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历来是为君者的命根子，所谓有了它便有了一切，失去它便失去一切。为了得到这东西，人们可以杀得血流成河，让亿万生灵涂炭。改革如要触动这东西，对不起，须拿万千人头来换！110 年前的光绪皇帝，能够说出“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这样的话，非为一时冲动之言，而应该看做是他对传统政治的一种反叛，这反叛只能基于其对西学及中国现代化改革性质的觉悟。百日维新中，光绪接受康有为的意见，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的政策，允许普通百姓直接上书中央政府甚至皇帝。要知道，清王朝以往是连下层官吏都没有奏事权的，光绪把向皇帝上书言事的权利直接下放给包括“野民”、“鱼人”在内的平民，并且强调“总期民隐尽能上达，督抚无从营私作弊为要”。这不啻是一场革命，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士民，却引起权贵阶层的强烈不满。张之洞愤然说：“变法者，清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有官僚抓住一些平民因不懂呈文规矩，称“皇上”未抬头等纛漏，认为是对皇权的亵渎，欲大加问罪。光绪却“一笑置之”，指示说：“当广开言路之时，不必有所谴责以塞之。”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本是康有为等维新派早就确定的政治改革目标，但后来见阻力太大而放弃。变法中，“设议院”问题仍讨论不断，有人提议建立一个评议国事的常设机构，“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自上”。但即使这样的举措，对于清廷来说，也被认为是有碍皇权至上的根本体制，光绪“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的话便发自讨论中。康有为建议，鉴于“今守旧盈朝”，此事现在“万不可行”；光绪虽然同意了康的建议，仍表



示“待后数年乃行之”。可见他对“兴民权”、“设议院”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坚定的决心。

相比之下,慈禧就是另一副嘴脸了。慈禧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的改革。最先为中国带来新生产力的洋务运动,就是在她同意下搞的。光绪主持的戊戌维新也是在她授权下才得以进行的。但改革一旦威胁到她的权位,她便要毫不犹豫地扼杀改革。在光绪筹划改革大计的时候,慈禧谋划的却是如何巩固自己权位之计。她首先把翁同龢、文廷式等“皇上所亲信之人”,从光绪身边“遣逐”,又要求“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收紧了高层人事大权。接着任命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京畿董福祥部、聂士成部、袁世凯部三支军队,从而把军政实权牢牢控制在手。后来光绪免去抵制士民上书言事的礼部六位堂官,慈禧则视为皇上竟敢动了她的人,遂对光绪破脸怒骂,酝酿政变杀机。1898年9月19日夜,慈禧突然提前两天从颐和园急返紫禁城发动政变。决定这一行动的直接原因,是她获悉光绪皇帝第二天要会见日本元老伊藤博文,于是慈禧第一个反应便是光绪欲“勾外国谋我”。政变发生后,有人上弹章追究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慈禧问李:有人说你是康党。李答:“臣实是康党……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

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李敢于这样回话还在怒气中的西太后,因为他知道慈禧发动政变在乎的是最高权力而非反对变法。几年后,慈禧复推新政,许多政策力度超过戊戌维新,

但和平改革的历史时机已经错过,清王朝终于无可挽回地覆亡了。

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禁于周围环水的小岛瀛台,直至他去世,过了整整十年失去人身自由、饱受精神折磨的囚徒生活。但他一直坚持学习外语,关心和研究国内外时事,始终怀抱着“有意振兴中国”(光绪私下对即将离开清宫的德龄语)之志。1908年11月13日,在慈禧患病多日之后,光绪也“疾甚”(《清实录》语),次日便亡故于瀛台涵元殿,终年仅37岁。过了不到一天,慈禧病死。对光绪皇帝如此蹊跷之死,百年来人们不能不怀疑他是死于谋杀。因为年纪尚轻的光绪平时身体虽不大好(有神经衰弱、结核等病案记录),但并无突然致命之症。给他看病的西医师屈桂庭见其“忽患肚痛,在床上乱滚”且“面黑,舌黄黑”,也认为“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近年,有研究者取光绪墓中的头发等遗物进行化验分析,发现砷(俗称砒霜)含量超出常人数十倍,更为光绪“非正常死亡说”增添了证据。如果光绪皇帝确实死于谋杀,那么也可以说,他是为中国现代化的改革事业牺牲的。我们应该怀着敬意,纪念这位历史人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思)

欢迎您到当地邮局订阅2009年《世纪》。如订阅不便或错过邮订时间,本刊发行部随时为您办理补订和邮购(平邮免收邮费)。

为答谢新老读者的厚爱,本刊特推出以下优惠活动:凡订阅2009年《世纪》读者,可6折邮购本刊2004年(35元),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合订本(精装50元)。《世纪》其余历年合订本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册30元,2003年每册35元,可享受8折优惠(免收邮费)。

# 世纪

中央文史研究馆 主办  
上海文史研究馆 主办

《世纪》大16K 80页,逢单月出版  
定价:6.5元,全年6期39元  
邮发代号:4-557 全国各地邮局征订

## 萧乾冰心倡办极具权威性的文史杂志

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合办的《世纪》已走过15年历程,《世纪》依托全国文史馆员不可替代的优势,注重“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追求真实,特色鲜明,价值彰显,转载率逐年上升,深受知识界,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的好评和喜爱。

主要栏目有:世纪遐想、世纪特稿、口述与回忆、翰林风采、史卷拂尘、黑匣曝光、国共舞台、名流综谱、故人旧事、海派艺苑、长寿人生、华夏文博、笔记掌故等。



社址:上海市思南路41号《世纪》杂志社 邮编:200020  
电话/传真:(021)53062023

#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

(下篇)

● 赵启强

## 七

1968年2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的报纸上,发表了佩比赫少将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了去年12月末遂军事政变的丑闻。文章发表后,政变的两个主谋,国防部党组书记谢伊纳携儿子叛逃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杨科上将自杀身亡。

在这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下,诺沃提尼终于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辞去总统职务的辞呈,搬出了他呆了12年之久的总统府。

新就任的总统是72岁的斯沃博达。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在50年代的大清洗中,他曾遭监禁并未保住个人的自由。

他仍将改革作为掌权后的头等大事,靠着改革上台的捷共领导人,在一个月内就拿出了全新的政治改革设计——捷共的《四月行动纲领》。

这份长达60多页的《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提议,由专家们起草完成的。希克教授主要负责改革的经济部分,曾经组织过《十字路口的文明》调查报告的里赫塔博士和后来成为捷共中央书记的姆林纳日则起草了政治体制改革部分。

在经济体制改革部分,除了以前有过的扩大企业权限、加强市场机制,最值得一提的,是“成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管理”,“企业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委员会有权任免企业经理、决定企业方针和计划”。

《行动纲领》的最大成就在于对政治体制作根本性改变。

纲领首先承认,捷共已从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蜕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对人民实行统治的特殊利益集团。为改变这一状况,纲领指出:

“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的自愿支持,它不是靠统治社会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而是靠忠诚地服务于社会

的自由、进步的社会主义发展而赢得它。”

纲领表示,“党的目标不是当社会的‘总管家’,不是用自己的指令捆住社会的手脚,对生活的每一步都加以限制。”

对实行镇压职能的安全部门进行整顿和彻底改革,把它们的权力严格地限制在保卫国家安全,对付外国敌对势力的范围内。纲领强调,要坚决制止公安机关对公民政治信仰和思想意识观点的干预、限制。

纲领指出:

“没有犯罪的每一个公民可以放心地看到,他的政治信念和观点,他的个人信仰和活动,不会成为国家安全机关注意的对象。党明确宣布,不允许这个机器用来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和社会主义矛盾。”

纲领没有仅仅满足于对政治生活中的集权专制进行批评,它确认了国民议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国民议会通过直接普选产生。

纲领将确保公民的权利、自由以及人民能监督政府、参与管理国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它指责过去的体制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弄颠倒了,所以不仅妨碍了个人的发展,也阻挠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纲领对民主、自由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1. 要由法律保证公民有建立自愿组织、兴趣组织和社团的可能性,不要以官僚主义加以限制;

2. 公民有讨论和影响国家决策的自由,“不能通过任意解释、依靠权力规定允许他们知道什么和不允许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哪些意见可以公开讲、哪些意见不可以公开讲……必须系统地研究舆论,研究的主要结果应公布于众”。

3. 实行新闻报道自由,取消新闻检查,“排除实际上存在的事先进行新闻检查的可能性……在报刊中要把国家的官方立场、党的机关报和新闻评论加以区别”。

4. 迁徙自由,“法律要准确地规定行动自由,特别

是公民到国外旅游的自由 ;主要的是公民有权在国外长期或持久居住 ,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

社会主义如果牺牲民主 ,受损害的还是社会主义自己。改革派共产党人呼唤民主政治正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所以 ,纲领称这次伟大的运动为“社会主义事业复兴”运动。

1968年4月1日,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论述《行动纲领》。他宣称,人是社会主义思想中占中心地位的因素。杜布切克所说的中心地位,是指社会主义应该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放在中心地位,而民主则是实现这个伟大思想、走向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在这次全会上,捷共的某些领导成员曾担心《行动纲领》的实施会使共产党在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担心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会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这种担忧,杜布切克镇定地表示,“公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党必须采取灵活的适应性以便能接近人民。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人民的支持下实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用暴力进行统治。

杜布切克建议:“今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组织——不管是军队还是体育组织——都不要再做为共产党服务的顺从的传送带。”

1968年4月5日,经过几天的大会讨论和排除了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之后,捷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了《行动纲领》。“布拉格之春”全面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它宣告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整整20年的斯大林主义统治结束了;同时,新的组织在这个经过了重大手术的国家肌体上生长起来。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入侵

4月6日,即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的第二天,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斯沃博达提出辞职。4月8日,改革的倡导者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并着手组建新内阁。4月18日,改革派政治家、“人民代言人”式的人物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4月下旬,切尔尼克在国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保证贯彻四月《行动纲领》,沿着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前进。在新施政纲领中,切尔尼克提出一条原则:“今后政府将主要向国民议会负责,而不是向党负责”。5月13日,国民议会通过一个法律草案,为所有1948年到1956年遭非法审讯的牺牲者平反。5月27日,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安全、司法部门侵犯公民权力的“非法行为”,为投诉秘密警察的违法行为开辟了通道……

5月底,民主化进程达到高潮,从人民中写来的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捷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改革派领袖表示支持,同时要求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把阻挠改革的保守派撵走。

## 八

1968年5月29日,也就是捷共中央全会将诺沃提尼等6名中央委员开除的当天,华约部队总参谋长、苏联将军卡扎科夫率代表团抵达布拉格,宣布华约部队将在捷、波境内进行军事演习。

保守派反守为攻,在以后几天的全会上,对杜布切克进行猛烈的攻击。党内的派别斗争明朗化了,反改革的图谋也公开了。

改革派领袖希望在9月所召开的“十四大”,能够选出一个进步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又一次受挫。改革派不能坐等“十四大”的召开,于是也激烈地投入了战斗。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杜布切克便来到改革的根据地布尔诺。在有600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杜布切克对保守派进行了回击。他称保守派是民主化进程的“最大危险”,并且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把这些人称为“反动派”。

改革派的其他领袖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等人也分赴全国各地,到工厂、到基层党组织去宣传改革。

由克里姆林宫指挥的华约国家合唱队首先喊出了对捷克改革的干预。仍在掌权的邻国斯大林主义者:东德的乌布利希、波兰的哥穆尔卡,公开干预捷克内政,对杜布切克施加压力。他们惟恐捷克的民主化运动会蔓延到他们国家。



除了舆论和外交的压力,还有赤裸裸的军事威胁:苏军总政治部主任皮谢夫将军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只要有一个捷克政府要求援助,苏联军队随时可以采取行动。”

5月17日,当苏联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布拉格时,代表团刚走下飞机,布拉格电视台美丽的女记者哈弗利奇娃迎上前去。她绕过代表团团长、苏联国防部长格烈奇科元帅,径直走到皮谢夫面前,把话筒举到将军挂满勋章的胸前。

这位漂亮的女记者迷人地一笑,非常有礼貌地问道:“您是否确实提议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

于是,所有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这位将军非常艰难地微笑了一下,用俄语说,“这是一件蠢事。”

政府也是用冷静的、富有理智的行动对苏联的粗暴干预作出回答——

5月中旬,由切尔尼克总理和希克副总理主持了一个由东西方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切尔尼克重申了新政权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民主权利和自由”,并宣布正在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同时新的选举法也正在起草。

5月13日,国家电台就国外对捷克民主化运动的攻击进行反驳说:“这2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相信,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 九

“布拉格之春”期间,许多深刻的改革思想不是出自理论家,而是出于作家笔下。作协的《文学通讯》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了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为“布拉格之春”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由作家瓦丘利克执笔的《2000字宣言》。

这份宣言发表在1968年6月27日的《文学通讯》上,距他在1967年6月27日的作协会议上发表那篇著名演说整整一年。

除了捷共的《行动纲领》,没有任何文件在“布拉格之春”比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影响更大。因为这篇宣言,瓦丘利克于1969年被又一次开除出党;因为这份宣言,苏联找到了出兵的理由。要了解“布拉格之春”,必须了解《2000字宣言》。

宣言首先从历史检讨开始:

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从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

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使得它对那些权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可耻的胆小鬼和心怀鬼胎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渗入党内,影响了党的性质和作风。

统治者的主要罪恶和最大骗局是,他们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人民的意志。

然而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人民没有这种罪过。人民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决定过……实际上是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阶层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这些人实际上占据了被推翻了的阶级的地位,自己成了新的贵族。

宣言指出,改革是共产党拯救自己的最后机会:

我们正处在民族文化的复兴之中。它是在共产党内开始的。当然,需要补充的是,这一过程也是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开始的。因为整整20年来,只有共产党人能过某种政治生活,只有共产党内的反对派才具有同对手接触的优越性。因此,民主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努力,是偿还整个党由于把非党人士置于不平等地位而对他们欠下的债的惟一办法。

削弱了共产党的权威的,并不是人民的批评和反对意见,而是这个制度本身。

《2000字宣言》阐明了这样的立场——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性质,改革应争得共产党内改革派的支持:

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观点:说可以在没有共产党人,甚至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某种民主复兴。如果这样,既不公平,也不合情理。共产党有很好的组织,必须支持他们中进步的一翼。他们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归根结底,他们手中握有决定性的杠杆和按钮。公众面前摆着他们的《行动纲领》,这也是第一次解决最大不平等现象的纲领,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出任何同样具体的纲领。应该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县、每一个村镇向公众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

捷共正在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让我们要求它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更好一些。如果共产党现在说它希望依赖于公众对它的信心而不是使用暴力,那就让我们尽可能信任它。

宣言强调,民主不仅是在法律条文上写出权利属于人民,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属于谁?社会的经济命脉是否掌握在劳动者手中:

今后民主制度的实际质量,取决于工厂的命运和工厂内部会发生些什么。尽管我们讨论了这么多,经理们还是可以要挟我们。因此必须找到一些好的经理,并且支持他们……

工人们作为生产者可通过把什么人选入企业管理机构和企业管理委员会来对这场斗争施加影响。他们能为自己做出的最好选择,就是把天然的工人领袖,有才能和廉洁的人,作为自己的代表选入工会机构,而不管这些人是否党员。

《2000字宣言》号召人民运用冷静而合法的民主力量,迫使阻挠改革的官僚辞职,但绝不采用暴力,以免造成混乱:

让我们要求那些滥用权力、掠夺公共财产、行为不正或残暴的人辞职。必须找到迫使他们离职的方法,比如:公开批评,做出决议,游行示威,组织示威性工作队,为他们退休征集筹募捐款,罢工,抵制他们上办公室等等。但我们必须拒绝采用不合法的、无礼的、粗暴的方法,因为有人会利用这些去影响杜布切克……

宣言请政府放心,当它面对强权的威胁时,它身后有整个民族作为后盾:

最近时期,外国势力干预我们国内的发展的可能性引起了很大的不安。面对着优势力量,我们只能有礼貌地保持坚定态度,而且不去触犯别人。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政府知道,只要它遵照我们的委托办事,我们就支持它,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

《2000字宣言》在《文学通讯》上发表后,工会的《劳动报》,青年联盟的《青年战线》,以及《农业报》立即转载了。

在瓦丘利克这份宣言上签名的有70人,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艺术家、科学家、体育工作者、教授、工人、工程师、教师、律师、经济学家,甚至还有农庄饲养员和个体农民。这些签名者中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几位捷共中央委员。

《2000字宣言》在4家报纸发表后,布拉格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大街上都摆上了桌子,征集签名。数以万计的捷克公民在声明上签字,支持这份宣言,支持改革。宣言打破了僵持,给静静等待的捷克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狂热。“布拉格之春”达到了高潮。

## 十

《2000字宣言》发表后几小时,莫斯科就得到了宣言全文。当即,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抗议这一“反革命”宣言,并要求捷共当局公开谴责这个声明。

也是这一天,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到党中央大厦去,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碰见了苏联驻捷大使。这

位以殖民地总督自居的大使板着面孔,一句问好的话也没有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准备如何对待《文学通讯》上的这篇文章?

斯姆尔科夫斯基当时还不知道报上发表《2000字宣言》的事,但他不喜欢这种不加掩饰的干预,就冷冰冰地说:“那是作家们的事,他们有权力说受他们的良心所驱使的话。”

这位大使指责说:但你们的报纸无权发表反革命号召书!大使同时要斯姆尔科夫斯基解释“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是什么意思?

当天下午,捷共主席团召开会议。保守派首先发言,他们说《2000字宣言》是反苏挑衅,说国内正面临着反革命内战的危险,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要在捷克重演。保守派还强烈地谴责杜布切克,指责他听任局势发展到能让这样一个宣言出笼的地步。

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压力下,杜布切克和他的改革派,为了避免12年前的匈牙利悲剧在捷克重演,“悲哀地同意应该谴责《2000字宣言》”。几小时后,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特别声明,谴责《2000字宣言》是“对当前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

在中央主席团表态之后,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要求切尔尼克总理,让政府出面反对《2000字宣言》的结论。一直拖到深夜一点,总理切尔尼克打电话告诉斯姆尔科夫斯基,他“说服不了政府,政府不想表态”。斯姆尔科夫斯基连夜赶到政府驻地,以国民议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政府会议。他讲述了局势的严峻性,警告说:“议会明早9点钟或10点等着你们总理的报告。”

28日早晨,总理在国民议会讲话,公布了政府对《2000字宣言》的谴责声明。然而这种妥协真能为改革争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吗?

## 十一

当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跨过国界,扩大到整个东欧和苏联时,对改革的围剿才真正开始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展开了宣传攻势,说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捷克斯洛伐克蔓延。7月初,华约部队在捷境内及邻国的军事演习搞得热火朝天。

1968年7月8日,勃列日涅夫及东欧四国的首领,东德的乌布利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波兰的哥穆尔卡和

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分别电告杜布切克,要他7月1日去华沙参加华约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2000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

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五国首脑的邀请信,并拒绝这一命令式的会议邀请。7月14日,华约条约最高级会谈,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7月16日,华约会议通过了与会五国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名信。这封最后通牒式的联名信,公开表示对捷克内政的干预。

联名信说:

反动势力利用了捷共领导的软弱,滥用了“民主化”的口号蛊惑人心,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忠诚可靠的干部的运动,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反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势力把黑手伸向报刊、广播和电视中去,把它们变成攻击共产党的讲坛……这正是反动派能够利用《2000字宣言》的形式向全国发出号召,公开自己的政治纲领的原因。这个声明直言不讳地号召反对共产党和合法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

因此我们相信,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

捷共中央立即召开了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拒绝五国联名信,并拟定了反驳这封指责信的复信。7月18日,杜布切克通过广播电视,向全国人民宣读捷共主席团对华沙条约五国的复信:

我们党新的、民主化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绝大多数人民关心国家大事。我们认为,这是当前局势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我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赞成废除书报检查制度,赞成言论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努力证明,它是能够用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声名狼藉的官僚主义警察统治的方法来实现政治领导和管理的。

苏联向捷共提出邀请,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去莫斯科、基辅或其他城市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捷共拒绝了这次邀请。他们熟悉东欧的历史,他们记得1948年铁托正确地拒绝了斯大林的会谈邀请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也记得纳吉的几次失败的、悲剧性的谈判。

最后,谈判地点选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小镇切尔纳。它距苏联只有3公里,是一个很难在地图上找到

的小镇。

1968年7月29日,一辆专列从苏联开到切尔纳,载来了苏共11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位。克里姆林宫的三驾马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总理柯西金、国家元首波德戈尔内都在其中。同时,另一辆专列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开来,送来了斯沃博达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全部11名成员。

会谈是由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将一捆剪报扔在谈判桌上开始的。剪报是从最近几个月来捷克的报刊上剪下来的。

勃列日涅夫逐一引用这些剪报作为捷共已失去控制、反革命在捷克泛滥的证据,其中一条是某工厂党支部,在报上招聘党支部书记的广告。

杜布切克承担着大部分责任。他温和而耐心地解释,同时也坚定地宣称,捷共在这场改革中的惟一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最好的社会主义。

勃列日涅夫却采用了另一种发言方式,他甚至愤怒地向杜布切克咆哮:“你们的政策居然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

勃列日涅夫的粗暴激怒了坐在杜布切克身边的斯沃博达总统。这位72岁的老人气得满脸通红。他说,如果苏联以这种方式谈判,他宁愿辞职!他说,他本来就是一介农夫,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挂冠归田。

会谈室的温度稍稍降了一点。苏联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那是一份要求捷共“非撤换不可”的人员名单。名单上有捷克党政负责干部,甚至还有作家和报刊电台的工作人员。这个名单上有250人。

即使要捷共自己开出这种包括基层人员的详细名单也是有困难的,可见苏联对捷克内政的关切和熟悉程度;也可见苏联的情报部门的工作效率。

第一次会谈进行到晚上10点也没谈出结果。

第二天的会谈,俄国人开始对捷克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攻击。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谢列斯特严厉地指责捷共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他的态度简直像一个发脾气的农庄主席在训斥工作中出了差错的农庄庄员。

谢列斯特一坐下,杜布切克马上站起来说:“假如您继续使用那种措词的话,即便继续进行这次会谈也不会有什么意义。”

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站起来说:“如果再这样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我将不再参加这种有失尊严的侮辱性会谈。”

说完,捷方全体代表起身离开了会场。



后来,勃列日涅夫带着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和谢列斯特登上了杜布切克的卧车,表示了歉意之后,会谈才重新恢复。

切尔纳会谈期间,《文学通讯》发表了由作家巴维尔·柯霍特执笔的呼吁书。呼吁书指名道姓地写给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几位改革家,将人民的信任交给他们,也委托他们在会谈中将捷克人民的意志宣告出来。

呼吁书写道:

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会谈的前夕,我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

同志们,你们的历史性使命就是要说服苏共领导人,要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

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可以用4个词来表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

请你们用无数的实例来说服对方,向他们表明,现在我们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阵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稳固得多,请你们转告对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

请你们代表我国人民来说话,在这些日子里人民已不再是一个抽象名词,他们变成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希望你们行动起来,进行解释,但一定要团结一致地捍卫我们已经选择,并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坚决走到底的这条道路。我们将每时每刻地关注着你们的工作。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报告。我们时刻想念着你们,希望你们也时刻想着我们。

呼吁书发表仅仅几个小时,全国就掀起了一个支持呼吁书的签字运动。在布拉格和其他城市的街头都张贴着这份呼吁书,摆在街头的桌子随处可见,人们排着长队,等候着在呼吁书上签名。

呼吁书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请谨慎地写!但要鼓起勇气来写!失去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那是我们的不幸,你们的耻辱。我们信赖你们。

几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有的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地址。捷克共产党获得了它成立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拥护。

然而,4天的艰苦会谈之后,精疲力竭的领袖们在深夜返回布拉格时,却没能给人民带回希望。领袖们不能把令人忧虑的前景披露给忐忑不安的人民,只是要求人民镇定,希望大家回家安心睡觉。

布拉格人不能入睡。人们聚集在国会广场,不愿散去,他们要知道会谈的真实结果。群众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会谈情况。

斯姆尔科夫斯基来到现场,他登上一个阳台,对近万名群众说:“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同志休息一会儿……他一天只睡3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很多问题。他肩上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

于是群众和许多记者拥到他的身边,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

开头,他坦率地回答了:他理解人民的心情,也深知祖国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到后来,当问题越来越触碰到武装干涉的危机时,他难于说下去了。

会场一片期待的沉寂、一片庄严的肃穆。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他向群众保证,领导人绝不会背叛改革事业,改革必将进行下去。有的群众固执地要知道会谈细节,甚至直截了当地问:是否存在军事干涉的危险?斯姆尔科夫斯基断然否定了这个问题,并批评说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不负责任的!

有了更多的问题,有了更嘈杂的喊声。会见继续了两个多小时,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斯姆尔科夫斯基终于精疲力尽,他鼓起最后的力量喊道:“你们所有的问题我都回答了,你们还要求什么?”

于是上万人的声音像一个人那样整齐地在广场上升起:“说实话!说实话!”

此刻,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不堪承受的重负压迫着。他无法将这副担子交出来,因为他很清楚,有时候甚至整个民族也难以承受一副历史重担。

## 十二

进入8月,几次谈判都未能扼杀“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终于失去耐心,苏联军队于1968年8月20日深夜,开始了本文开头已经描写过的那场入侵。

在苏军入侵的8月20日晚上,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召开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这是莫斯科导演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卡什帕尔的发言之后,将由保守派的比拉克和英德拉提出一个谴责国内反革命势力,要求杜布切克辞职的提议。

保守派知道入侵的具体时间,他们得将会议拖延到那一刻,然后,利用占领的消息通过这个决议,并立即成立新政府。会议在争论中拖延下去。总理切尔尼克几次



杜布切克返回布拉格后向群众发表演讲

离开会场去接电话。

23时40分,总理最后一次回到会议室时,他面色惨白地向全体与会者宣告:“那五个国家的军队越过了我们的边境,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

除了保守派,其他人被这个消息吓得惊慌失措,说不出话来。

中央主席团立即做出几项紧急决定:任何人不得辞职;所有领导人应坚守岗位;立即起草捷共中央主席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8月21日凌晨2时,捷共在得知入侵消息两个多小时后,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在布拉格广播电台播出了。

告全国人民书宣告:“五国军队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一无所知。”

干涉军“应邀”而来的政治欺骗破产了,但军事和暴力的征服仍然成功地按计划进行。

凌晨3时,一排伞兵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步枪冲进了政府所在地。那里,从党中央大厦赶来的切尔尼克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召开政府部长会议,他要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政府仍在行使权力。政府官员全部被捕,被迫脸朝墙壁站成一排,切尔尼克总理却被押上一辆装甲车带走了。

凌晨4时半,一队装甲车,一队坦克车和几卡车伞兵在苏联大使馆的小轿车带领下,包围了捷共中央大厦,士兵封锁了这座建筑。一些军官和便衣人员冲进去扣押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

一个政权被异国的军队逮捕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并没有在霸权面前表示屈服:从凌晨2时起,电台反复播出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6时,广播了杜布切克的个人声明。杜布切克从凌晨4时半被扣押到11时

被正式宣布被捕,14时押解出党中央大厦,其间不断地用电话或便条与外界保持联系;6时30分,电台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实行消极抵抗”;7时,苏军进攻布拉格电台,几千名群众奋起保卫电台,用电车、汽车筑成街垒;7时15分,女播音员呼吁:“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广场前面的群众正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占领军的车辆……”;7时18分,电台又播出了杜布切克的一封信:“我要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播音员又补充说:“我们

也将这样做。”播音员的语词是平静的;7时30分,在缓慢而悲哀的乐曲声中,女播音员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请不要相信他们的话!”

听到这里,成千上万的听众热泪涔涔而下……之后,收音机沉默了,接着响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歌。

布拉格电台被占领了。但仅仅隔了10多分钟,电台又通过郊区的发射台继续播音——

8时15分,布拉格电台播出了斯沃博达总统的告全国同胞书;8时20分,播出了科学院对入侵的抗议声明。

之后,布拉格电台又一次沉默,但库拉维亚、俄斯特拉发电台接过了这个任务。然后是几十个地方电台继续了这场战斗,这样布拉格电台的技术人员就有时间建立地下播出网。仅布拉格,就有十几处秘密播出点。

占领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却未能割断这个民族的咽喉,不能窒息她的声音。

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闻工作者不愧是人民的喉舌,不论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还是被占领的现在都是如此。他们喊出了人民绝不屈服的意志,又有效地组织号召了对占领军的抵抗,长达两个星期之久。

杜布切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什帕切克在自动步枪的押送下,坐装甲车到机场,再乘运坦克的运输机和没有座位的军用飞机到达莫斯科。已经沦为囚犯的改革家们,面对的是一份早已拟好了的、请求苏联出兵“邀请书”。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当然不签字,他们宁愿选择自杀。然而他们无权为整个民族选择死亡。后来,从国内来的代表提醒他们,说国内尸体堆积如山,说他们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结束这种状态,应该让这个弱小的民族生

存下去,应该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流血、死亡减少到最低限度。

他们问自己,他们相互询问:应该签,还是不应该签?

要是可以选择个人的死亡就好了,要是可以回避这样的选择就好了。然而他们必须选择,必须为整个民族作生死攸关的选择。

他们犹豫了很久,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他们思考了很久,还是无法肯定该不该这样做。一直到1974年,当斯姆尔科夫斯基临近生命终点之际,还在深深的痛苦中继续着这种痛苦的思想:“我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

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被责任心和良心压迫着。1968年8月27日的黎明尚未到来之际,杜布切克和他的战友回到了布拉格。从照片上,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春天的明星们低垂着头。

8月27日下午5时,布拉格电台播放了全部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命运》之后,杜布切克发表了8月21日悲剧以后的第一次广播电视讲话。

他的讲话断断续续,并且常常停顿下来,有时是在痛苦地追忆,有时是极力地克制。他向人民报告,已经有了一个让五国军队分期撤出的协议。他说,为了这个协议,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不得不采取若干临时性的特殊措施来限制我们所取得的民主和自由……”

杜布切克说:“我们将坚决地和始终如一地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政策……”

他突然停顿下来,他无法欺骗人民。他被沉重的现实压垮了。

收音机里的声音沉寂下来……而电视机前的人们看到他们的领袖为强忍眼泪而无法讲话……

1分钟,2分钟,3分钟沉寂之

后,杜布切克继续演说,“亲爱的听众们,在这临时决定的讲话中,如果时而出现停顿,我请求你们原谅我……”

在大街上听广播的人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刻,领袖和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

这次广播电视讲话还没结束,许多电报和信件就寄到电台、电视台。很快就有了有一句口号在当天和以后的日子里流行开来,那是人民对杜布切克的谅解、安慰和支持:“我们跟你在一起,请跟我们站在一起吧!”

“布拉格之春”给政治家留下这个礼物之后,便匆匆从布拉格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格等最激进的改革家被开除出党,许多编辑、作家和电视台评论员被放逐到工厂、农场劳动,有的进步人士甚至被逮捕关押。

对杜布切克的迫害要晚一步,他在“布拉格之春”期间迸发出来的伟大力量尚有余威,新的当权者只敢偷偷摸摸地、一点一点地对他进行剥夺——

1969年4月,他被撤销第一书记职务;9月,被解除中央主席团职务;年底,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实际上是被放逐到异邦;1970年元月,被停止党籍;1970年5月,被召回国;1970年6月26日被开除出党。

这位18岁就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30年的共产党。此时,他年仅48岁,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他带着顽强的沉默离开了布拉格,到斯洛伐克的一家工厂办公室去工作了……

(责任编辑 吴思)

## 家庭保健报

在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统一刊号:CN23—0022  
国内邮发代号:13—3

全年定价:111.00元

报社地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  
邮政编码:150010  
发行部电话:0451—84652433

# 2009年

全家无忧  
一报在手



# 欢迎订阅2009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中国的地震预警史**

**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与前景**

**袁鹰：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难历程**

**舆论监督对防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